







本书分六篇，共计 29 章。

起讫的时间是 1908 年 10 月至 1953 年 3 月，历时 45 年。书中所记述的往事，按时间年份划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从 1908 年 10 月至 1934 年初；第二部分，从 1934 年 2—3 月至 1945 年底；第三部分，从 1946 年初至 1953 年 3 月。



## 自序

1991年4月26日,我在女儿小元的陪同下去看望老首长张爱萍同志。张老和夫人都在家中。张老面容清癯,精神饱满,与我促膝而谈。我带去一张珍存了多年的照片,是张老在苏北解放区工作时为我拍的,那时只有张老有一台照相机。看了照片,张老十分欣喜,立即嘱咐夫人翻拍一张,留作纪念。由此,我们谈起了很多的往事。

张老偶然谈到,1938年4月他曾受党的派遣到浙江金华开展抗日统战工作,约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是同年6月间到的金华,那时张老已经回武汉了,我们两人是后来在苏北解放区才见面的。我在金华做党的地下工作时,曾听说有个“张大哥”,但一直不知道这个“张大哥”就是张爱萍同志,直到这次拜访才“对上号”。时隔53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张老和我都是感慨万分。

这次拜访后,我让女儿根据张老所谈的情况,整理了一篇题为《张爱萍同志谈1938年在浙江工作的情况》的文章,请张老过目后刊登在《浙江党史》1992年第2期上。给张老送去这期杂志时,张老十分高兴,他建议我抽出一部分时间,把在浙江和随后在苏北党领导下参加的抗战活动,写一本往事回忆的书。我很重视张老的嘱咐,有空时就做准备。

1998年间,我基本写完了晚年的专著《马克思论三种经济关系的演变》,方拟定开始《往事回忆》的写作,并请张老为本书题字。原书名曾初定为《往事回忆和今日的感触》,请张老题写时,张老和夫人都认为这不太像书名而且写起来太长,觉得定为《往事回忆》为好。张老的秘书贺茂之同志向我传达了张老的建议,我完全接受。

在书中,我回忆了1908年出生后,走过孩提时期、参加革命直至上海解放初期的往事。

在书中有我对领导我参加北伐大革命的前辈和战友们、浙江陆军监狱一起参加狱中斗争的领导和难友们、浙皖地下工作的领导和同志们、八年抗战期间苏皖鲁豫的有关领导和战友们的回忆。他们有的已为革命事业献出



## 往事回忆

---

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用血肉之躯筑成了党的历史,值得后人崇敬和怀念;  
有的仍在为党的事业继续贡献力量,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书中不当之处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骆耕漠

2003年5月





# 目 录

## 第一篇 我的童年和少年

<b>第一章 我的生父、生母和过继父母</b> .....	(1)
第一节 第一个家庭关系 .....	(1)
第二节 第二个家庭关系 .....	(3)
第三节 有关联的重要回忆 .....	(4)
<b>第二章 我童年和少年时期所受的小学教育</b> .....	(7)
第一节 我的私塾和初小教育 .....	(7)
第二节 我所受的县立高小教育 .....	(9)
第三节 我所受家庭生活教育的影响 .....	(10)
<b>第三章 为求学私奔杭州</b> .....	(12)
第一节 违命私奔杭州 .....	(12)
第二节 力争得到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 .....	(13)
<b>第四章 在省立商业学校</b> .....	(16)
第一节 进省立商校第一学年的概况 .....	(16)
第二节 对无能的会计老师表示不满和因此受到的处分 .....	(17)
第三节 参加杭州学生会募捐援助上海五卅运动 .....	(17)
第四节 1925 年暑假期间得到补学英语的良机 .....	(18)
第五节 1926 年所遇到的一些新问题 .....	(19)
第六节 第一次接触北伐军 .....	(20)



## 第二篇 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第五章 弃学从戎 .....	(22)
第一节 从杭州到丹阳县 .....	(24)
第二节 从丹阳经镇江到扬州 .....	(25)
第三节 重回镇江和准备转往汉口武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 .....	(27)
第六章 流亡武汉转到北伐军总政治部 .....	(28)
第一节 总政治部发生的一些新情况 .....	(29)
第二节 关于总政教导队的一些情况 .....	(30)
第三节 关于东征和南下 .....	(32)
第七章 决心加入共青团努力学习当个好党员 .....	(34)
第一节 加入共青团 .....	(34)
第二节 创立杭州商校第一个共青团支部的经过 .....	(36)
第三节 传达上海团中央的指示 .....	(38)
第四节 杭州商校学生反对校长的风潮 .....	(39)
第五节 党中央派夏曦到浙江省委传达指示 .....	(40)
第六节 1927年10月的杭州政治形势 .....	(41)

## 第三篇 杭州陆军监狱六年三个月的苦难斗争

第八章 一声巨吼——“蒋介石是坐不长江山的！” .....	(45)
第一节 贝介夫同志的英勇就义 .....	(46)
第二节 曹仲兰同志的崇高形象 .....	(46)
第三节 沈乐山、赵济猛等同志英勇就义 .....	(48)
第四节 张秋人同志的被捕和英勇就义 .....	(48)
第五节 徐玮同志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 .....	(50)
第九章 陆军监狱东监特别反省院的苦难斗争 .....	(52)
第一节 1928年5、6月至8月 .....	(53)



第二节	1928年8月至1929年3、4月	(54)
第三节	1929年4、5月至9月	(55)
<b>第十章</b>	<b>返回陆军监狱大监</b>	<b>(59)</b>
第一节	1930年1月至6月	(60)
第二节	1930年7、8月间的苦难和斗争	(64)
第三节	1930年“八·二七”大屠杀及其余震	(66)
第四节	大屠杀余震的转化形式	
	——特别法庭对处理政治犯采用两个新手段	(70)
第五节	特别法庭频繁更换政治犯关押场所的措施	(72)
<b>第十一章</b>	<b>从一种形式的牢房转移到另一种形式的牢房</b>	<b>(77)</b>
第一节	特别法庭传审一批老政治案犯	(77)
第二节	从陆军监狱转到吉祥巷反省院	(78)
第三节	反省院当局规定反省人写反省学习体会	(85)

## 第四篇 出狱后进行反帝、反封建和参加救国会斗争的经过

<b>第十二章</b>	<b>抓住革命奋斗目标和谨慎迈步前进</b>	<b>(90)</b>
第一节	踏上《中华日报》跳板建立中国经济情报社	(90)
第二节	利用中国征信所资料室阵地拓宽工作范围	(96)
<b>第十三章</b>	<b>参加救国会运动的经过和体会</b>	<b>(99)</b>
第一节	除文救会外主要参加职救会的活动	(99)
第二节	关于X团体和更社团体的特殊历史作用	(102)
第三节	撰文反对日寇经济侵略	(106)
第四节	参加上海救国联合会发起的两次大游行	(108)
第五节	“七君子”被捕和另一个小风波	(112)
<b>第十四章</b>	<b>西安事变发生后我所遇到的几件事</b>	<b>(114)</b>
第一节	上海资料供应所的正式成立问题	(114)
第二节	反省院院长来函约我去杭谈话	(115)
第三节	我在上海与施复亮(原名施存统)的初次相见	(116)





第四节	郭沫若经过 10 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上海 .....	(118)
第五节	宋庆龄带头发起自愿入狱签名的抗议 .....	(120)
第十五章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上海的 新武装抗日战斗及其演化 .....	(124)
第一节	张发奎、蔡廷锴部队在上海宝山、闸北和沪西铁路外 大片战场上英勇作战 .....	(124)
第二节	从简补记一下“八·一三淞沪大会战” .....	(125)
第三节	我参加组织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的经过 .....	(127)
第十六章	在浙江丽水参加抗战救亡工作 .....	(130)
第一节	1938 年 2 月至 3 月的斗争 .....	(131)
第二节	1938 年 4 月至 5 月的斗争 .....	(138)
第三节	抓住时机,逐步开展金华文教界的抗日救亡活动 .....	(141)
第十七章	在浙江金华继续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	(146)
第一节	出版《文教通讯论坛》和发起金华文抗会 .....	(146)
第二节	台义队和刘良模歌咏队来到金华 .....	(153)
第三节	新四军将日寇俘虏解往上饶途经金华时的震动 .....	(158)
第四节	周恩来副主席来到浙江抗日前哨 .....	(160)
第五节	1939 年 5 月至 7 月初旬在金华 .....	(171)
第十八章	在皖南屯溪的 17 个月 .....	(177)
第一节	办好皖浙工合训练班 .....	(177)
第二节	完成安徽地方银行总行和皖南战时 物产管理处的新工作 .....	(182)
第三节	1940 年在皖南屯溪 .....	(188)
第十九章	从皖南屯溪转到苏北盐城军部 .....	(194)
第一节	依托郎玉麟设法进湖州 .....	(194)
第二节	绕大圈子辗转到达目的地 .....	(205)

## 第五篇 苏北盐阜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岁月

第二十章	在苏北盐阜区跟随陈毅军长一年半 .....	(216)
------	-----------------------	-------



第二十一章 黄老重视根据地财经建设,关心人民生活 .....	(222)
第一节 抢建海堤工程 .....	(222)
第二节 提前归还公债 .....	(223)
第三节 大力支持“以土制洋”发行盐阜抗币 .....	(224)
第四节 合理负担的一条大杠杠 .....	(227)
第五节 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 .....	(228)
第六节 关怀基层军民的生活 .....	(229)
第二十二章 张爱萍对我的关怀和教导 .....	(231)
第二十三章 1945年2月至10月前往苏浙军区又返回苏北 .....	(235)
第一节 前往苏浙军区 .....	(235)
第二节 日本投降后随队返回苏北淮安县城 .....	(243)

## 第六篇 我军全歼来犯之敌 推翻蒋家王朝

第二十四章 我军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侵犯 .....	(250)
第一节 张爱萍同志率军英勇作战 .....	(250)
第二节 跟随粟裕司令的日子 .....	(251)
第三节 两淮战役及其他 .....	(254)
第四节 涟水战役前后的经历 .....	(256)
第二十五章 创办华东供给学校 .....	(260)
第一节 成立华东供给学校 .....	(260)
第二节 华东供给学校的迁移 .....	(263)
第二十六章 奉命带领后勤部门向河南转移 .....	(266)
第一节 在开封搞接收工作 .....	(266)
第二节 朱仙镇的意外收获 .....	(269)
第二十七章 我军准备过长江 .....	(270)
第一节 和平接管开封 .....	(270)
第二节 准备渡江占领南京 .....	(273)
第二十八章 胜利占领南京 .....	(276)
第一节 进驻南京 .....	(276)



## 往事回忆

---

第二节 群英会丹阳 .....	(278)
第二十九章 解放上海 .....	(281)
第一节 进驻上海 .....	(281)
第二节 繁荣市场 抑制通货膨胀 .....	(285)

## 附 录

张爱萍同志谈 1938 年在浙江工作的情况 .....	骆小元(291)
作者年表 .....	(295)





# 第一篇 我的童年和少年

## 第一章 我的生父、生母和过继父母

### 第一节 第一个家庭关系

我本姓丁,我的祖父是距安徽省安庆市一二百里远的潜山县人,因为当年发生太平天国运动,清王朝的官兵在那一带打仗频繁,因此,潜山县的老百姓有不少都纷纷逃离家乡,往浙江西部的天目山一带逃难。我祖父一直随着潜山的老百姓逃到浙江的於潜县城外三里路的横山头小村庄,和他一同逃难的老百姓有熟识的,也有不相识的,于是,便这样落户下来。当时淤潜县许多乡村的房子都是砖瓦房,由于战乱,死的人很多,还有不少人离乡他走,空下了不少房子,这样,逃难的难民都可住进空房子,同时还可以向政府租用闲置的土地,这种情况在现在是不可思议的,但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

同我祖父一起从潜山来的人中不都是姓丁的,但姓丁的多一点。祖父当时有了三间两层楼上楼下的房子,租种的地有 20 亩左右。祖父当年也就



是 20 多岁,是个成年人,但他不识字,以后也一直没有进过学堂。

由于我祖父在横山头村子里落下了脚,之后,才与一户一同逃难的人家的女儿成了家。祖母的情况,我小的时候对她没有记忆。祖父成家后生了三女一男,男的排行第二,这就是我的父亲。我父亲的小名叫丁大犹。祖父没有读过书,不识字,家自然搞得不是很好,祖父常感到没有文化是一个最大的缺憾。

当时浙江省其他县的老百姓看到淤潜县有空地可耕,有空房子可住,于是有不少人先后移民来到於潜安家,其中有识字的,祖父就让父亲向他们求教,以后,自己省吃俭用,攒下几个钱,送父亲到了省城杭州的法政学堂学了三年。我父亲的大名叫丁步松,号梦周。为了以后回忆和说明问题,我这里顺带讲一下,随我祖父从潜山逃到於潜县横山头的人还有四家同堂亲人:一家是我祖父的大侄儿是丁家大房,第二家是我祖父同辈的第四房奶奶,我祖父是第五房,但是还有一个奶奶因她的丈夫和我的祖父不是同一个曾祖父生的,因为在我祖父朝南房子的南边,相隔一条街,所以叫她南家奶奶。她的儿子逃亡到横山头,成亲后生了一个儿子就死了。所以她和媳妇、孙子三人,靠养蜜蜂为生。之所以在这里讲四家关系,因以后要讲到有关情况。

为了便于回忆说明以后的问题,我根据六七岁到八九岁时听大人说的事情,将我现在还能记得的情况做些回忆,推断我祖父的生日和去世的年份。我记得我祖父是 1919 年做 80 岁(虚岁)大寿以后去世的。另外,我父亲为了怀念我的祖父,他把我祖父的遗体收殓后留在我家客堂后面一间小空屋里约一年。到第二年即 1920 年送到坟地上安葬。我当时已在於潜县高小一年级读书,按此推算,祖父是生于 1840 年。再者我还记得祖父去世的前五六年他曾经对我说,他从潜山逃难到於潜的中途,大概是 16 岁左右,太平天国的一支小部队要他去临时帮助做饭烧火。又说到,他的眼睛双目失明已有七八年了,到夏天很热时,他坐在堂屋里,我父亲为他做了一个长方形的布风扇,他自己拉动,有时我也帮他拉,他很高兴。

父亲丁步松光绪五年(1879 年)五月初九出生,1965 年 1 月 5 日去世,享年 86 岁。父亲在 1908 年到 1911 年之间在杭州法政学堂读书三年,也就是清王朝光绪末年到宣统 3 年之间。

我的父亲和我的生母(名叫周德娣)结婚是在 1896 年,我的大哥生于



1897年,之后是二哥和两个姐姐,我是第五个,是1908年10月18日出生的,所以我的生年和大哥相隔11年。但母亲生我时难产,常要卧床休息。祖父立即打电报给杭州法政学堂,让我父亲马上回来。赶回来时,母亲已经不行了,关于母亲的回忆后面还将说到。

父亲回到家里忙完安葬母亲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他的大姐(即我的大姑母)商量,将我过继给她做儿子,她那时已经在1905年或1906年与李克昌成了家,她在1907年生了一个儿子(大姑父为其儿子取名李承基,1908年死了)。当时,她与李克昌商量后就同意了,将我取名为李可为,于是,我父亲把我抱到大姑父家的佃户家去奶养。

奶妈家姓吴,吴家是浙江绍兴府新昌县的农民,后迁移到淤潜租种大姑父家的地,我同他第五个儿子同吃奶妈的奶水,再加上一点面粉糊糊。后来奶妈告诉我,他总是把奶水先给我多吃些,她自己的儿子少吃些。我长大些时,回到过继母亲家了,每年过春节都去看望奶妈。奶妈还为我现炒花生吃,回来时还要带上一包。我对这位好奶妈是永记不忘的。后来“文革”动乱结束回乡时,我专门到奶妈和奶父合葬的坟上祭祀,还在坟旁留了影。

按我丁家经济情况,我祖父(在前面已说过)是那样的情况,节省开支,把我父亲送到法政学堂读书,希望他能当上县长。父亲虽然读书努力,读了三年之后,因无后台靠山,只能回到横山头老家在淤潜当劝学所所长。我被捕后,他就搬到杭州当律师,也便于就近照料我。我父亲是个自由职业者——律师。

## 第二节 第二个家庭关系

我的过继父亲李克昌是安徽省歙县西边的石埭县人,家中贫寒,13岁时到淤潜他同乡合伙开的豆腐店里当学徒。学徒满后,就帮助管理店务。两三年以后与另一些同乡合伙开了一个小布店,几年后,与我的过继母亲结婚,又筹备开大布店,当时造了大房子,这时大约是1910年。为此,李克昌成为年轻、能干、发展很快的暴发户,当时他常与当地政府来往,还留一顶清朝考生的帽子,他还是个受到欧风美雨影响的人。他是当地商团的负责人,在淤潜可以说很有名气。老百姓传说他造大房子时挖到过银子。实际上是他





会做生意,会赚钱,另外还借债一两千元。由于他内外事物很繁重,大房子还要装修好,便从小布店迁到大布店。他感到疲劳,因此,除了他专门培养了三个学徒成才相助外,于1911年冬就叫他的外甥张正模来帮助统一管理他的店务,他才放心。之后他就带过继母亲去杭州玩玩,同时也治治病,记得他当时患的是伤寒病,身体稍好些后就回家了。但后来他的伤寒病复发,到1912年春夏之间也就是清明节前后的一个晚上,我在布店玩,忽然染坊的伙计跑来,抱我到我继父的病床前。第二天早晨就看到病床前有一个人,脸上盖了土黄纸,身上盖了白布。大概傍晚过继母亲带我到新房子的大客厅,叫我跪在棺材旁边,并说人来你就磕头,还叫我看着棺材下面有没有猫和老鼠跑,如果有就赶掉它。第二天有人抱我跟着过继母亲与送葬的人一起到了三四里外的坟地,把过继父亲灵柩安了葬。当时我才3岁多,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只是隐隐约约地记得这些。以后长大回忆起来,才晓得了过继父亲去世的情景。

下面补记我儿时三点记忆:

1、一个夏天,我一个人坐在住房的堂屋睡床上玩小瓶子。

2、隔年夏天有一次,在堂间睡床上玩时,看到一个人手里拿了黄土纸,并为我脱衣服,在我手臂左右搽了什么东西,接着在我手臂上先后反搭,搭几下之后就走了。以后我才知道已由奶妈家回到过继母亲家了,是为我种牛痘。

3、我回到过继母亲家,就由我的小丫姐姐来照料,小丫姐姐是丁家四房奶奶的孙女儿。有次小丫姐姐在我的小屁股上打了几下,并说:你不听话。从以上所述,我过继父亲家的生活是好的,家里的经济情况,相当于小商人兼小地主。从小在这个家庭生活,对我以后,特别是参加革命后,是有相当深刻影响的。

### 第三节 有关联的重要回忆

据说,生母生我时难产。当时,中国农村的医疗条件相当落后,妇女生孩子很少到医院生,大都是请个接生婆在家里铺上坑席生孩子。丁家奶奶



给接的生。我的生母生我时难产，她不断地呻吟着，豆大的汗珠不时涌出来，忍受着难以形容的煎熬。丁家奶奶想尽了办法，折腾了很长时间，终于生下了我。生母生下我后，又是欣慰，又是生气，竟然一把将我丢在地上，说道：“这个小家伙，几乎让我进了鬼门关。”丁家奶奶连忙把我从地上捡起来，放到生母身边。

生母产后，父亲还在杭州读书，由于家庭条件艰难，父亲也无法赶回来。生母天天想念父亲，就把一副银手镯拿出来放到床头，准备以后给了父亲。不知什么原因，这副银手镯后来却找不到了，生母伤心至极，竟然哭了。

我的生母嫁到横山头后，家务事多，回娘家的机会很少，因此特别想念娘家的人，但又很无奈。有一次，生母知道她的弟弟元德，用船要把木材沿苕溪运往富春江，估计在某个时间船要经过横山头边，要她就在河边等待，谁知因为水势急，船经过溪边时竟然未能停下，只能眼睁睁看着船顺着溪流远去，只好互相打手势，表示思念之情，连一句话都不能说。我长大后一想到这件事就格外难受，生母这次如果能在溪边与弟弟见面谈谈话多好啊！

生了我之后，生母依然病着，但家里琐事又多，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由于不注意喝了没有完全烧开的茶水，影响了病情，竟然不久就离开人世了。

后来，我见到丁家奶奶，她亲口对我说，我把你生母的一些情况告诉你之后，村里有些人责怪我不应该告诉你，这有什么不应该呢？村里许多人都知道你生母嫁到了丁家后对全家照顾得很周到，对儿女管教得很细心，对家里的吃、穿、用很节俭，一个钱当两个钱用，对邻居都和睦相亲。我家的蜂蜜，你生母有时买点给她母亲家，总要多给点钱，因为她知道我家经济困难。这样好的人，怎么不可以告诉她亲生的儿子呢？这时，我才知道我的过继母亲为什么吩咐我称我的祖父为外公，称我的父亲为大娘舅的关系。

在我六七岁时，我到横山头娘舅家走亲戚，我的大哥丁龙泉（我在丁家叫龙孝）带我到了一个开阔的菜园里，他说可为，你跪下给母亲磕头。这时，我对我的生母的身世逐渐了解得多了。

周家的外祖父一家，都是种田的老实农民。关于周家外公、外婆的一些情况，据我表侄周家尧来信相告：我的外公周友发的祖籍是安徽省绩溪县（二都）校头村人，他生于1825年，卒于1904年，享年80岁，太平天国后期来淤潜泗洲殿操竹业，生意繁衍。外婆姓任，1856年生，卒于1927年2月4



日,享年72岁。1873年由其母送来泗洲殿,时年18岁。以后成家,相继养育了三个女儿(我的生母是大女儿),四个儿子。我没有见过外公,因我出生晚,但我过继给李家后(主要是在小学读书期间),见到外公生前亲自制作的手工艺品——一副竹篮担,技艺精良,非常美观,是他送给李家的纪念品。我的过继母亲非常爱惜,妥为保存。只有遇到至亲好友的家中做喜事前来借用,她才肯答应,并嘱咐人家用时要小心,用罢即送还。后来母亲去世后,无法查找到外公这一珍贵的纪念品了,实在可惜。

我的外婆虽然不识字,但为人通情达理,全泗洲殿的人都敬重她。她很喜欢我,我的过继母亲每年都要带我去看望她一两次。我外婆几乎没有对我谈起我生母的事,这不是她心中不疼爱,而是为免引起心头难过。1926年的一天,我的过继母亲对我说,周家外婆近来常卧床,并要我就去看望她,我到后拜了个早年,并告诉她,我再读一年书,即可毕业,做工作,引她高兴。她面露笑容,同时并讲到近来身体乏力,我安慰她说,几个娘舅舅母都轮流照顾,身体会康复的……,以后有机会再来看望。告别出来,觉得外婆虽然身体比以前差一些,但没有想到她两个月后就与世长辞了。我失去了外婆,心里非常难过。我以后工作一两个月,就大有变化,特别是不到一年即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近七年才出狱,回到泗洲殿,特地去外公、外婆的墓前,含泪悼念。

关于我“救命”母亲的附记:

在我出世后的一二年中,丁家一、四房的后辈劝告我的祖父说,你年纪大了,不能又回头管理自己的家务,同时祖父自己也想到在杭州法政学堂读书的儿子,大概只能回家当个劝学所长,没有多大收入的,而且还要有人帮助他,因此我祖父就向北乡(一都)余家老友求亲,我的父亲也表示同意。于是他不久就与余家的大女儿结婚。我的过继母亲对我说,你到横山头去要叫她大舅妈。这位大舅母很喜欢我,我在她跟前常给我好吃的东西,特别是1927年底后,我长期关押在杭州陆军监狱里,如果没有这位大舅妈陪同我的生父来杭当律师,并从各方面照顾我在狱中的生活,我将难以活下来。因此,我总是常在心中把这位大舅妈称为“救命妈妈”。这是后话,我以后再详谈。





## 第二章 我童年和少年时期 所受的小学教育

### 第一节 我的私塾和初小教育

记得在我5岁那年的一个大热天的午后,我的母亲(这是指我的过继母亲而言,下同)对我说:“可为,你已五周岁多了,午饭后你常常在后天井里一个人玩大刀、长枪、小木棍,乱叫乱唱,妈妈不能好好午睡,现在妈妈已经同店对过弄堂里一个私塾老师商量好,从明天起,你到那里听老师教你认认字,读点书,中午回家,你不要再在后天井里玩刀、玩枪,乱叫乱唱。”

接着,妈妈就带我到前面大厅旁边,指着放的小方桌和新木凳子说:“对过那私塾里有近20个学生都比你大两三岁,你可以在带过去的小方桌和新木凳子上读书、写字。妈妈因为你人还矮小,所以做了一个新高凳子,你可以踩这个凳子下面的横档子坐上去,趴在桌子上读书。”<sup>①</sup>

第二天上午,店里的小学徒就带我到对过的私塾里见到老师(他同我的徽州哥哥一样大小,约30岁左右),我的小桌子和板凳另摆在其他同学的旁边,我就踩着凳子的横架子坐上去,老师给了我一本小书,当天只叫我看书上画的图画。第二天起才开始从第一课起教我对着书上的图认字。这本书是新式课本,第一课是人字,第二课是手、足。第三课是山、水、田,第四课是狗、牛、羊……,以后图就少了,而是成句子的字。读到年终时,因我每天都是趴在桌子上读书,把这本书的书角都卷烂了。

第二年这个私塾的地点就移到老师家里的一间屋里(靠街),只有六七个同学。

---

<sup>①</sup> 这年春节后於潜镇里请了一个水路班子来演戏,我看了台上几个武打戏,很有兴趣,随后我就叫店里小学徒用小竹棍和有彩色的硬纸板,做了长枪、大刀等武器,有空就在家玩耍,学做武打戏。



有次教到司马光和几位小朋友玩球,将小皮球踢到水缸里捞不起来,司马光想了一个办法,灌水进去,直到水位升高,皮球拿出来了。讲得有声有色,使我们听得很有兴趣。这时开始认识老师的一个有残疾的跛脚女儿,她比大家认识的字多,有时大家有什么不懂的还去问她。

下半年这个私塾先生就不单独开馆了,而和金家村来的一个私塾先生张百川合起来在淤潜镇大街转到城隍庙的路口一间屋内办馆。年终就结束散了。

后来到金家村一个老先生张子庚自办的私塾读了三年。先教《百家姓》,后教《幼学琼林》(考秀才用的课),我们都不懂其意思,就叫我们死背书。后两年就改由他儿子张百川来办带有初小性质的学校,采用通用国语课本,还设有算术、体操、唱歌等课程。

同学们和我都觉得这个老师自己是不会唱歌的,教唱时声音很低,含糊不清,没有什么调子。教体操也不过叫我们在校门口空地上踢踢毽子,拍拍小皮球,三年间我们也没有受到怎样画画的教育。

对以上童年时期所受的私塾教育,我后来渐渐有以下认识:

前一位先生虽然过去不是从事教育的,他自己的语文程度也不高,但是他能采取那样的白话新教科书,教学的方法也通俗易懂,这是受到新潮流的影响,但是范围狭窄简单,这与时代限制有关,不能厚非。

这位先生大概是从徽州到淤潜来谋生的,本来打算做点小本生意,但是这方面没有什么办法,搞不出什么名堂,因此就想搞私塾教小孩读书,以维持生活。搞了一年半后和金家村先生合办私塾,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

至于后三年的私塾教育,采用《幼学琼林》是难懂和不合适的,至于张先生不善于教唱歌、画画、体操活动,与他的受教育的限制有关,但他对教书还是负责的。他讲不清楚内容意思,还要学生死记硬背,同时对唱歌、体操、画画等课程也不注重,形同虚设,这是一种简陋闭塞的教育。

张子庚老师是从徽州来淤潜的。他的字写得很好,还为城隍庙前的大墙上写了“善恶昭彰”四个大字,还为我取名李政。他自己没有得子,抱来一个十几岁的儿子,这儿子受到他父亲的一点教育,后来他就在金家村附近祠堂教书。他为了初小(民办)的毕业考试做准备,他在讲台上帮大家温习唱歌时,声音唱在喉咙里,证明他也不会唱歌。



在回忆完以上张老父子所办的私塾(初小)情况之后,我还要夹注以下的事情:

大概是1917年(民国6年)的一天上午,张百川先生对我们全校同学说:县立高小校长午前要在校门口大街上开个会,我带你们去参加。我们到时,那里已站满了人。过了一会儿,高小校长就向大家说:(大意)5月9日是全国人民反对袁世凯卖国贼投降日寇,签订21条不平等条约的日子。今天是我们反对21条的三周年纪念日,不让日货来占领市场等,接着就拿出一些日货在会上烧掉,大家叫好。

我当时还是一个9岁的小孩子,听不懂高小校长讲的话,但当时当场烧日货有爱国的意义,多少是懂得一点的。这表明我们的私塾小学先生对我们进行了一点爱国教育。

## 第二节 我所受的县立高小教育

当时於潜县是个很小的县,到我上高小时,据我后来所知,全县人口不过八九万人,全县在行政上只有4个乡,按乡大小分十个自然村庄,西乡,北乡又有一都、三都、六都……

经济文化大都是很落后的。全县只有在县城里有个公立高小。当时各乡自然村并非都有私塾、初小,只要凭私塾介绍就可进高小,我也亦然。我进高小时,校长叫傅晓岩,除国文、算术外,还有专教唱歌、体操、简单的图画老师,全校只有一个小风琴,由音乐老师掌管,高年级学生可以去弹弹,我感到很新鲜。校外有我父亲的一个助手,名叫曹附友(是浙江永康迁来的移民),进行一些劝学所的活动,经过曹俯友的推荐,由校长傅晓岩(全县教育家之一)从永康请来两位师范学校毕业的地理和算术老师。

我在初小所受教育虽很简单,但对高小一年级的课程是能够跟上去的。当时高小同学里有一个习惯,都要给新来的同学取一个绰号,有一个名叫陆江的同学,他问我说:我们给你取一个什么绰号好呢?我觉得难以回答,我怕他们取一个不好听的绰号,由于我初小时常被母亲管教在家里,人忠厚。我想了一阵后,就勉强回答说:随你们的便吧,取个好听些的,于是,对方就说我们为你取个“唐僧和尚”。在高小一年级期间,学校曾组织到孔庙祭孔



夫子。

有一天我上音乐教室去唱歌,正在爬台阶时,我问同行的一个同学,明日上体操课你“体不体”啊!校长在我前面听到,说我说得不对,就说:“李政,上体操怎么说成体不体啊?”

教我们地理课的老师于春节后要去北京考北大,大家不舍得他走,认为他教得好,又留不下他,由高年级同学领头,在他走时,特地组织大家送他到九里桥时才分别。

在我三年级时,有一位本县毕业的学生,后来去杭州师范读书,毕业回来担任我们学校的国文老师,他叫赵百齐,我当时写了一篇国文题为“孔方兄”,即“谈钱”。赵先生看了之后,就写了个批语,大意是:少年得此,难能可贵。

高小期间养成了一个习惯。在课余时间就看些课外小说书,如《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粉妆楼》、《七侠五义》、《太平天国》等,对我有影响的是《七侠五义》,特别是《太平天国》。这些书的字是用很小的油印字印的,对我的眼睛很有害,以后眼睛不好,也是原因之一。

当时於潜是没有一个书店的,只有福建的一个卖旧衣服的商人,到余杭批货时顺便买了一些各种各样的小说。有个同学是贫农,叫傅荣,后来他改名傅玉成(是我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介绍人),他也喜欢看小说,经常借我的书看。

### 第三节 我所受家庭生活教育的影响

在1917—1919年三年间(即我9岁—11岁之间),有一天读书回家,晚饭后和睡觉前,我的母亲(荷妹姐姐也在旁,荷妹姐姐是指我生母的同胞妹妹与陈姓结婚后所生的大女儿,所以她的全名叫陈荷妹,我的过继母亲在我过继父亲去世后3年间,先于徽州府石隶县老家的大伯经过来往通信商量,表示同意接受他的一个小侄儿来於潜李家与荷妹姐姐结婚,虽然同居和好,但他总常常想念石隶李家,最后就借故回老家探亲一去就不再回来,因此荷妹姐姐就在我们家中孤零零地生活。起早摸黑地为全家十多口人,包括店堂和染坊的大小伙计烧火做饭,十分劳苦,我当时虽然还在上小学,但彼此



都知道对方的痛苦,永远难忘)问我,我昨晚打牌后有五十个铜板封一包放在房间桌子上,今天早上不见了,是不是你拿去用了?我回答说,不知道,我没拿一个铜板。母亲不相信,反复追问,我坚决说没有拿,她发怒了,叫站在旁边的荷妹姐姐拿根针在火上烧热了,母亲就拿着发热的针靠在我嘴边,荷妹姐姐在旁就说:可为你就随便说一下是你拿的,我就说了是我拿的。但母亲还向我追问,要我交代钱怎么花了,我就编了一套,说我今天早上去金家村读书时,买了什么什么,母亲才算罢休。这件事使我终生难忘。我的母亲也是爱我的,如我上私塾为我做了很好的新高板凳,但是她个性很强,她不高兴时,就拿我来出气。还有我的表哥,当面对她说我的坏话,说我前额的头发长得很低,不聪明,读书没有成绩,将来不会有出息,等等,母亲都听得进。这种家庭生活教育,我有时能忍耐。以后有一次(我独住一个房间)回想起种种侮辱,使我感到活下去也没意思,曾想到悬梁自尽了。如果这样,觉得对不起我的生母。因为这时我已经知道我的生母的情况,自己不应该这样不争气,痛哭起来。

这以后,有一天清晨,我在打开过继父亲的小书箱翻查其中的东西,发出声音,因此而影响了她的早睡而使她不高兴,她高声说,可为你平常该读书时不好好读书,不争气,你滚吧!我听了又气又哭地也大声说:“你不要以为我什么事都不懂,我不是自己跑到你家里来的,你要我滚,就送我到横山头去吧!”她在房内不吭气了,我就上学去了。

我下午放学回家,看到我横山头的舅母,在劝说流泪的母亲,我就跑到自己的房间。不一会,舅母到我房间里对我说,你早上对你母亲说的话是不对的,下去给母亲赔个不是,我就跟她下楼赔了不是,这以后,母亲对我态度就好些,不随便说侮辱我的话,这使我也渐渐懂得必须努力读书,对长辈讲话要注意分寸。



## 第三章 为求学私奔杭州

### 第一节 违命私奔杭州

1922年冬(我14周岁)在县立高小毕业后,母亲对我说:我已经与你娘舅商量好,过年后就送你去余杭一个大布店学生意,一切都为你准备好了。年前你要到相好的同学家里去玩玩,可以借此离城到乡下去走走,我表示同意,可借此拖延时间,实际上我已早知道母亲的打算,我已经开始设法不去余杭,而私奔杭州。我到相好的四五个同学的乡下玩回来后,即加紧和嫁给北门头钟家的小丫姐及钟家的一个姓刘的娘舅商定。

我的小丫堂姐很不赞成我母亲的安排,主张母亲应该花点钱送我到杭州多读点书,你这次私自去杭州的路费,吃饭的费用,大概要十多块银元,由我给你。

刘家娘舅又详细告诉我说:从於潜到余杭有小毛驴运货的民夫,我已交代他们把你好好地带到余杭。

我为这次私奔杭州的事,还与同学傅荣前后商量几次,他说:你现在有了以上保证,可以一路顺风,我明天一早一定到高小后面的文昌阁来送行。

从於潜城到化龙镇,虽然有了上面所说的准备条件,但是由于我年幼,少年时期基本上都是在家庭内和於潜城内这一小范围的限制下活动,是没有出过远门的,所以这一次从於潜到余杭,再从余杭到杭州的150多里的路程,几乎等于是远门,毫无经验,困难重重,有孩子般的胆怯性。第一天的前20里路(即到藻溪镇),因为是我冬前出访好友同学时已走过的地方,没有什么困难和胆怯,第一天的后20里路,走到化龙要宿夜了,我跟民夫住到一家旅店。这家宿店的老板娘见我年纪小,吃晚饭时,就叫我同他们家一起吃,随便收点饭钱,晚上住进一个小房间,另有一张空铺,我感到很紧张,就想到《七侠五义》小说里干坏事的人的情景,这时我就特别想到我身上带来的十



几块银元，怕有坏人同住一个房间偷我的钱，我就做了对付的办法，把姐姐给我放在袋子的钱绑在大腿上，未脱棉衣裤睡觉。第二天一早跟民夫步行到余杭县，感到很吃力。傍晚到余杭后，我打听找到在我家布店当过小伙计（当时他在杂货店当店员）的人那里，在他那里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送我上从余杭到杭州的班船。

班船到后，我与几个客商上岸到附近小饭店吃午饭的时候，他们见我带着一把大人用的旧雨伞，就对我说：“带着这把旧伞对你行动不便，你在街边雨伞店里买把新的。”我说不必，我能够使用这把旧雨伞。（当时有小雨）我顺便问他们我要到城里省立第一师范找同乡，路途不识，怎样去找？他们看我人小，他们说饭后就带你出去雇黄包车，就可以找到。饭后，他们和车夫讲了几句话，因有小雨车夫叫我等一下，他把车上门布放下，我就坐上去等了一下，觉得自己伸腰向下很不方便，车夫来了，把车杠抬起，我就觉得舒服了，车子拉到省立师范，接着我就通过传达室找到同乡章某某谈了几句之后，同乡就把我送到大马路后面的一家小客栈住下。

当晚一阵大雨停止后，我被大马路上的热闹声和汽车声所吸引，我就跑到大马路旁观看，因为这弄堂里一头通，一头不通的。我是向左手一路走出去的，怕回来时找不着原处，特别注意是先向右拐，再向右拐，然后就看到马路上的情景。

第二天早上，我又走出弄堂向左拐看看靠近的市容，见到一座几层楼的大布店挂着高义泰的牌号，我不敢进去看，回头时顺便问路旁的行人这叫什么地方，他说三元坊。当时我心里就发生了一个大疑问：雨虽然停了，马路上还流着泥水，车子不停地开来开去，路面怎么能变得干净呢？这也表明我是一个开门便遇山弯的小城镇的乡下人。

## 第二节 力争得到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

大概过了两三天之后，我那位章某某同乡又来了，他告诉我说，我已与一师的另一位同乡向校方一年级的主任老师介绍了你的情况，并推荐你到他负责的班级当旁听生，听国文、算术课，得到了他的同意。同时我们已经为你在校外很靠近的一座小桥旁边的木工铺子里解决了临时睡觉和吃饭的





问题,所花的费用很少,你明天一早就可以搬过去。我听了很高兴。

随即,我就动手做预先准备的事,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寄一封家信给我的娘舅和母亲,大意是:向他们报告我已一路平安到了杭州,住在一个很小的客栈;我已开始到一师一年级当旁听生;我随身带的钱很少,只够开支前两个月的旁听等费用,希望母亲再寄点钱给我。

我对旁听学习是很认真努力的,还能听懂。不过,这次来杭我是毫无经验的,很紧张,受了不少折磨,特别是担心我寄出的家信得到如何答复,每日都提心吊胆,心神不定。因此,我在旁听不到一个月的过程中,渐渐感觉到体力有些不支,患了几天感冒。我小时在家,偶尔感冒,大人就到中药铺子买“五时茶”给我吃,一吃就会好起来。当时有个外县的学生,比我大好几岁,为了听一师的旁听课也同我住在一个房里。他很同情我,就为我去买“五时茶”,并煎好送给我喝,我十分感动。木匠铺子的伙计,也为我送了两三次早餐。这些都是我终身难忘的事。

不久,我舅父就专为我来到杭州,按母亲的意思,亲自带我回家,并答应暑假期间再来杭州投考,正式读书。

我回去时跟着舅父按来时的路程,先搭船,后步行回到於潜。路程虽照旧,但我的心情就与来杭时大不相同。

我的小丫姐姐同刘家娘舅以及街上少数亲友也很高兴地说:“年纪虽小,将来是有希望的。”

我回到於潜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努力加紧温习高小的教育课程以及自己认为应补习的文化知识。此外我在高小时就耳闻北城门外五里路的唐公山村私塾小学有名气,抽出约十天时间到唐公山去拜访主办私塾学校的周镇南先生,他年约40多岁,安徽口音,传说他的教学特点是自己带头领着学生共同“耕读合一”。我只略看到:周老先生同大部分学生参加课余劳动,附近村庄家庭经济困难的子弟都愿参加耕种粮食和蔬菜的课余劳动。不收学生学费和免收或很少收点膳宿费。对上述周老师“耕种合一”的精神,我当时虽不深知其中的大道理,但对家庭经济困难而不能适时学点文化的人来说,是大有积极作用的,在於潜当时如有若干个乡村办成周老先生那样的私塾,就有积极作用。

在谈话中周老先生对我说:“你最好再从《古文观止》中选出几篇短文细



读和背诵。”我因为当时就要到杭州赶考，没有按他的教导来补这个课，但是他的这种教导精神更督促我去努力补好其他的课程。

我从唐公山回到於潜城后不久就赶到杭州，因为事先已有联系，就直奔第一师范学生宿舍和同乡同学同住，商量我投考什么学校好。他们说我们已帮助你拟定投考中文中学（六年制）所招的第二年的插班生和浙江省立商校，省立商校从今年起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商量后我决定报考这两个学校，考试后两个学校我都考取了，我很意外。同乡同学都为我祝贺。

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接受中等教育之后，更有能力在银行、邮电、海关、铁路、商业等方面谋到一个中等职员的工作，过自食其力的小家庭生活，不再依靠李家财产过依赖生活，所以我决定到省立商校读书。



## 第四章 在省立商业学校

为便于分清说明逐年的学习情况,我以下有时说某一学年的学习情况,有时说某一学期的情况(一个学年分两个学期,三年半就是七个学期)。

### 第一节 进省立商校第一学年的概况

按我高小的学习基础,我对商校第一学年的课程来说,是应付有余的,不必细说。

我进商校后,看到本市的走读同学,大多是徒步来往;也有少数是骑自行车来往的,我感到很新鲜。另外,我已知城市的闹市区,如西湖两旁的延龄路一带有出租自行车的车行,每小时出租费为一角,对学生租车特别照顾。因此,星期日有空时,我就租车慢慢学会骑车。经过一年,我就成为全校骑自行车熟练能手之一。这对我当时的校外活动很方便,而且对我五年后参加共青团地下党工作也有帮助。

这时我顺便回忆一下杭州市民反对曹锟贿选的露天会议的情景。大概是这学期中的一个星期天,我一个人在西湖旁下湖路第一公园玩耍,偶尔发现公园旁一个小运动场上有近100人先后聚拢来开什么会。于是,我也就走向运动场听开什么会。当时我是凭着好奇心去观看,只注意到一个中年模样的口操宁波音的先生一步步爬上运动场旁边供小孩玩耍的滑梯上,向场上的听众讲话。我只记得他说到什么北洋军阀曹锟用金钱来贿赂参议选举他当大总统……场上的听众很轰动,他讲话的声音也渐渐加大。我虽事前不知道有什么曹锟贿选的事,但偶尔碰上这个场面,听到北洋军阀拿钱来贿赂当总统极臭、极臭的新闻,使我对滑梯上激昂演说的那位中年人留有深刻印象。



## 第二节 对无能的会计老师表示不满和 因此受到的处分

第二年上半年学制照旧,没有变动。下半年我到商校看到传达室外面挂了两块黑板,上面写着通知:原来五年制改为四年半毕业,人数约30人;另一部分约60人,仍为五年毕业。我是分在四年半就可毕业的部分(后来1926年底,以上两班的学生人数逐渐减少,到1927年把两班合起来都是四年半毕业)。

由于我当时政治认识很低,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到来前,只注意学校所定课程的学习,没有跳出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圈圈。

1924年下半年起第一部分的课程就比第二部分多了一些新课程,我记得其中新增的会计课程是读高小时没有的,所以要专心听课,不凑巧的是请来的教课老师,也缺乏应有的基础,我们不易接受,就有一些不满的表示。后来在年终放假前,我们还在黑板上写了请校方更换老师的要求,接着我们受到了学监的训斥。到第二年春上学时,校方特别通知三个学生(丁兆民、李英桥、李政)不准住校,要从校外一间临时宿舍来回走读。我们三人对这个处置很不满意,但只好服从(稍后,大约不到两个月,因为学校老师从中说情,才不用来回走读)。

## 第三节 参加杭州学生会募捐援助上海五卅运动

为响应当年上海“五卅运动”,商校一部分学生也走出校门,进行募捐活动。商校学生一般都只注意学好功课,争取毕业后谋得好的职位,所以对社会政治活动,一般都不积极。我当时的政治觉悟还很低。虽然如此,我与李英桥还是出力协助丁兆民参加杭州市学生会,代表商校学生向社会分头进行募捐活动。当时负责学联合会的人名叫童志沂,是浙江医专学校的学生,人很能干,并讲到募捐工作该如何、如何进行,我们都一律照办。

哪知我们商校的同学当中,曾有一小部分同学凭空说我们小分队拿着



木竹筒募得的捐款没有全部上缴，引起校内纠纷。这时，丁兆民在校内食堂大厅里召集全校同学开会，向大家汇报如何在全市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下，又如何在本校各分队负责人的督促下拿着募捐竹筒向社会募捐，捐款都是由捐款人直接投入竹筒内，然后当面有组织地把竹筒打开，把捐款数目点清汇总上缴。顺利完成支援“五卅运动”的募捐工作。我当时社会政治觉悟很低，在募捐时不能多做，不能多讲宣传鼓动的话，而只能说套话，例如宣讲顾正红（英商纱厂的女工在参加罢工斗争中如何被迫害致死，其规模越来越大等等）时对罢工斗争的意义理解不深刻。

### 第四节 1925 年暑假期间得到补学英语的良机

在上述募捐活动结束后全市的学校就开始放暑假，在放假前的若干日，我的表兄（张正模来杭采购货物，他的一位朋友对他说他家住在杭州市基督教青年会附近）说青年会新设了一个内部的浴室，发了洗浴证，可以凭证每月去洗澡一次，一年大约付五元钱。这位朋友还说：我答应帮助推销一些洗浴证，你是否也代为推销几张。我的表兄想了一下觉得不好完全不帮助，于是就说我有个表弟在商业学校读书，可以为他买一张，我知道这件事之后就对表兄说：“我在商业专校的学习只有英文课差一点，今年暑假不回家，专门到青年会所设的英文补习班，教师很有名的，招生的名额有限，我能设法解决，但不能在青年会附近找到一个临时的住处，是否请你的朋友做点帮助。”我的表兄说先试探一下。

过了两天，表兄对我说：“我那位朋友住在杭州岳王坟纪念馆附近，并为该馆做些服务工作，该馆旁有一间空房子可临时利用，你在今年暑假期间可在那里暂住，对来往青年会补习英文是很方便的。同时早餐可由他们家顺代供应，他这番好意，我们以后再做报答。”

在补习英语期间，我是全力以赴的，任何地方都没去玩，自己觉得收获是很大的。因此下学期我对商校的英文课同其他课程一样都能熟练地应付，而且还有些课余时间学习其他东西，我的好同学丁兆民课余时间喜欢看创造社出版的文艺著作，我也开始看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是看郭沫若、郁达夫的小说，成仿吾等先生的论文。



放寒假前，丁兆民同我说他这次回家，可能有些亲友会关心他的事，设法介绍他到上海找到职业。如能做到这点，他下学期就离开商校，必要时我们互相通信。

1926年春节后，我来到商校报到时，校方对我说，你去年的考试不错，有进步，考分达到期末总考分全班第二名，按商业学校的制度，得到第一名、第二名成绩就可以得到12元的奖励。奖金由考生所在县的有关单位支付。我听了很高兴。

随后我联想到：我的表兄对上述事情是会知道的，因此他也会明白，他在七八年前在我母亲面前说我的一些坏话（详见第一篇第二章），纯属杜撰，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我何必再做什么计较。

## 第五节 1926年所遇到的一些新问题

我违命来杭和最后到省立商业学校攻读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相应的知识，在银行、海关、邮电、铁路等有关部门谋得中等的职业，过自食其力的市民生活。这是一个大难题。原因在于：我在商校的考试成绩已进了一步，再过一年的努力就可能达到上述的相应程度，但是不一定就能谋得上述的职业，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制度培养人才的学校（包括商校）一般都不能负责毕业的学生到工作岗位上去，甚至“毕业就是失业”。虽然如此，我也只有先不管这事，而仍同去年下半年一样，继续努力学习各门功课。课余时间仍充分用来阅读创造社出版的著作，此外还阅读鲁迅写的《呐喊》和他翻译的《苦闷的象征》，另外还买了科学、人生观的文集，其中有胡适、陈独秀等名教授的文章。又买了一本《社会进化史》，作者大概叫蔡和森，对后几本书我只似懂非懂地勉强学了一些。

以上课外学习只不过是增加了多少文化知识，我做以上课外学习常常联想到丁兆民同学已离开商校，否则我们可以互相交流学习。

我因为有12元奖金可自由支配，所以决定暑假不回家，我在靠近青年会的一条大马路边（它东头与惯桥路相接，西头通到清波门）一家大饭馆楼上所设的上下铺租得一个铺位。因为这个夏天特别闷热，难以熬受，影响补习。



杭州有一家小书店名叫民智书店，它的地址在青年会东南方向一条马路上，北通众安桥，南通三元坊。我前面说的《呐喊》、《苦闷的象征》以及科学和人生观文集就是在这家书店买的。这家书店的负责人叫许××，萧山人，30岁左右，下面有几个帮手，我与他们有些认识。有一天，许××问起我：“你在哪个学校读书？哪里人？是不是爱好文学？……”我说：“我是於潜人，在省立商校读书，我到贵店买《呐喊》等书，只是课余时间学点文化知识，水平很低，还不能专学文艺。”同时我顺便对他说：“今夏天气太热，我借住一家小饭店的楼上，难以达到补课的目的……。”他很关心地听着，接着就对我说：“我们这里很闷热，楼上有个空铺位，如你觉得比较通风，我们是愿意帮助你搬到这边来。”我觉得他说话痛快，诚恳。我就问他你们一日三餐是外包还是自做？如果是自做的，一定要我共同参加和分担。他笑着说，你真是商校的好学生。第二天我就搬过去了。

在暑假即将过完时，许先生对我说，听说广州的北伐军已向湖南江西开动，我看你所担心的那个大难题将是容易解决的……。我当时虽不知他有无其他工作关系和不大了解他所说的时事背景，但是我在返校后仍记得他说话的大意。

## 第六节 第一次接触北伐军

民国以来，各省的大事主要都掌握在军政权力的人物手里。拿浙江来说，我到杭州的头一二年（1923—1924年），浙江是把握在北洋军阀卢永祥手里，后两三年他被孙传芳用枪杆子赶走，他也是北洋军阀。至于他们如何争夺以及北洋军的来历，我当时都不知道，但是我清楚北洋军阀是靠欺压百姓发财致富的；同时理解北洋军阀的统治是压在我心头大难题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当时希望北伐军早些从江西来到杭州。

大概到10月前后商校（其他中专学校也一样）师生都知道北伐军已从江西分路向杭州前进，校方按上级规定为保护学生的安全提前放寒假。

大概是11月初我就回到於潜家中。不久，北伐军卢涤平军长部下近两个营的士兵（约600人），从昌化县来到於潜县。镇上办事人员把营的领





领导人安排到南门头一个大会馆内驻扎，其中约有一个排士兵分配在我家中一长条空屋的地板上住宿，其他的士兵分散住在大街两侧老百姓家中。

住了几天后，北伐军就告诉我们，他们明天午饭后就向东前进，我们准备欢送。次日早晨，住在我家的班、排长和少数士兵都很客气地对我说：“这次打扰你家好几天，很对不起。”我除了以礼相还外，还静听他们对我说：我们的长官常教导我们（我只记得一点大意）对老百姓说话要和气，借东西要如数奉还，临走时把住处收拾干净等等。我亲眼看见他们同来时一样，把借来的门板、铺板、一捆捆稻草捆好送回原处，并且把我家那间空屋清扫得很干净……。这使我明白北洋军是骑在老百姓头上的霸道主，北伐军是人民真正的子弟兵。经过前述往事的回忆，我觉得我对北洋军和北伐军的区别开始有点认识。

总体来说，通过今冬提前放寒假的机会（为时不过几个星期），我觉得：我在放寒假后比放寒假前政治水平有些提高。1927年的春节即将来临，我将返回浙江商业学校，我是继续读完最后一个年头的课程，还是就离开校门走向社会另谋其他工作，当时我对这一点是没有主动性，因此我是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中回到杭州商校的。

在我离家的前一天，傅荣老同学送来一封信要我到杭后即送到省议会交给童志沂亲收，我说可以办到。我知道原省议会的地址。



## 第二篇 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 第五章 弃学从戎

浙江省立商校两大排校舍和前面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大排校舍虽然是前后连在一起的，但前五排和后两排校舍是被分开而不相通的，这七排房子是靠杭州市内一条小河边沿，两者中间约3米宽的一条小路，商校的学生（包括市民）可以沿着这条小路前后行走，如果向前走不仅可以走到第一师范学校前的大空地，而且可以通到该空地前的一个大工厂（它名叫丝绸纺织大工厂）和附近广大市民的活动区域。

我记得在我回到商校第二天的早饭后，我觉得有必要去了解，在孙传芳北洋军阀被北伐军（国民革命军）赶走后，杭州市民已在开始过着民主自由的新生活，它有哪些新特点，新情况？于是我就一个人沿着小河边的那条小路向第一师范学校和它前面的丝绸纺织大工厂慢慢走去，目的是先观察一下市内的面貌有何变化。在我经过师范学校前的大空地时，看见该校校门旁的墙壁上贴着一张类似通告式的大字条，有十几位青年男女学生



(前后轮流去看的人大概 30 多人) 在仰头观看，因此我也顺便前去观看。其中所写的大意是：暂时住在该校的国民革命军十七军二师政治部，要招考十几名宣传员，愿投考的即可登记，并提到第二天早上进行口试，下午即公布及格的名单。这样我就立即转回商校准备口试，因为时间关系我只略略看了一下孙中山写的《三民主义》。第二天上午我就前去应考，对我进行口试的人大概比我大八九岁，操着江西老表的口音。下午傍晚前我就看到榜上共有十几名考中的人，内有 2 名女生，特别是又看到我李政这个名字列在前五六名中，我真是喜出望外，当时我年仅 19 岁。由于二师政治部规定：凡录取的人必须于次日上午去报到入伍，并需于再次一日上午随军出发，否则就作为不愿入伍来看待；因此我就即回商校做准备，我除照旧穿着深蓝色的学生装外，还带着一个很小的箱子装点替换的衣服和《三民主义》等几本小书，其他东西都交给同学保管。另外我当晚想来想去的一个问题是：我这次能意外考取入伍做宣传员是很值得纪念的事情，我除了李政这个名字外，有必要另取一个新的名字，因为我读《三民主义》时看到孙中山说后人为了追悼明末的烈士，曾造一亭名“抗风亭”以表彰其革命不屈的精神，因此我拟定“李抗风”为我的新名字，用它来督促自己入伍后应好好努力工作。

第二天早饭后我到二师政治部去报到入伍，正碰上那位操江西老表口音的考试人，他说：“你是今天第一个来报到的，为什么这样快？”我说我是商校学生，就住在师范学校的后面，所以来得较快一点。他点点头，我看他的模样是个比较负责的人，我就顺便问他，我带着这个小木箱装点替换衣服和几本小书可以吗？他说可以，于是我又顺便扼要地向他说了我昨天晚上有如何的想法以及我在入伍后用李抗风这个名字的缘由，不知这是否可以，他听后想了下，微笑说可以。

当天下午，二师政治部就召开全体干部的大会（勤杂人员不参加）。由那位江西老表宣布开会，他首先请政治部主任孙清华讲话，讲话的大意是：二师政治部党代表周邦彩，因为另有公事不能前来同大家见面，政治部有两位科长，一位是组织科科长×××，因为另有公务告假在外，以后再与大家见面。第二个是宣传科科长名字叫吴景新，说时他就介绍昨天主持考试的那位同志与我们相见，接着他又说政治部下面还设有一个总务组



管理全体人员的住宿、饮食等方面的工作，并介绍总务组的组长同大家相见（组长的名字已忘记，以下就称他为总务组长）。最后主任又宣布明天上午政治部全体人员就从杭州出发到城外拱宸桥，然后就从那里上船前往湖州，沿途要在乡、镇临时休息时，宣传员都要向群众作宣传演讲和唱革命歌曲，老宣传员对这次新招的宣传员要做些辅导，大家要团结守纪律，努力工作。

### 第一节 从杭州到丹阳县

次日早饭后，总务组长就按常规让大家把住宿的地方打扫干净，借用的东西都归还，随即组织大家告别和整队上路。这和我于上年底所见到的北伐军的情况差不多，全政治部从城内到城外拱宸桥去的人员大约 100 人上下，由孙主任和吴科长骑在马上带队前进，跟着走的是宣传科宣传员、组织科和总务组的人员。在路旁有前来观看的市民，宣传队员领着全队的人员高声齐唱：“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当时站在路旁观看的市民中也有少数拍手称好的，使我们也感到兴奋。前面说过我是不擅长唱歌的，但因为上面的歌词简单，意思明白，我也大致能跟着唱，以后我就慢慢地熟练起来。

到拱宸桥这个大集镇吃了午饭后，大家就先后登上预先准备好的木船向湖州方向前进。大约经过两天就到了湖州城。前一段是坐船，后一段是步行，其间在经过较大的村镇做临时休息时（包括乘船时所经过的临时休息点）宣传队一般都向老百姓做唱歌宣传和口头演讲，其中新招的宣传员活动的次数较多，因为他们都是杭州口音，老百姓容易懂。老宣传员口音有些杂，老百姓较难懂，因此他们的宣传活动较少一点。我们在湖州城内大约住了两三天，除宣传员照例做以上宣传工作外，我们还分别了解城内的工商业和市民的生活情况，同时我们也得知城内的大工商业家，请十七军和二师的官长们吃饭。

以后我们二师就从湖州开到浙江的长兴县县城大约住了两夜。其间所做的宣传工作不必细说，这里我要讲一下所接触到的新情况：长兴城内的商会在第二天晚上送来一桌酒菜，专门招待二师师长杜起云等官员，杜师



长就对孙主任、吴科长说：“这桌酒菜就由你们分给工作辛苦的人员去享受。”从这件事我认为：杜师长是比较关心部下工作人员的生活状况，是个较好的师长。再者，我记得大概就在这期间，吴科长曾对我讲到一师的政治部工作是为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所把持，他们不像我们是赞成三大政策的。我当时不怎么了解西山会议派的实际活动，而只听说一师政治部活动很少，不与工农一致，我当时进二师而不进一师政治部实为一大幸运，即使我撞进一师也不会为他们所完全同化，但至少会妨碍我的进步。

次日早上，我们就从浙江的长兴县前进到江苏沿铁路的丹阳县，驻扎在城外一家大商人部分空余出来的房屋。其中有个大客厅是作为二师政治部的办公室，这个大客厅前有3间单层房子，居中的空屋和旁边一间的住屋房主让出来供部队临时使用。

我们在丹阳大概驻扎了三天。我们宣传科在这个县城的城内、城外如何多做一些宣传工作，如何向老百姓作歌唱和演讲以及在街道两旁的墙上写宣传的标语，这里都不必细说。我只讲一件事情，大概第二天晚上8点前后，我们五六个宣传员正在那间居中的房屋里讨论和多写一些贴在街头两旁墙上的宣传大标语，忽然总务组组长醉醺醺地送孙主任和吴科长同两位新招的女宣传员进入旁边的空房间里。不过为什么总务组长在政治部还有其他多余空房间的条件下不让他们分开而同住一房呢？这会使老百姓对我们有不好的观感。不过我们仍继续忙于多写几张宣传的标语，以便第二天下午到街上去张贴。

## 第二节 从丹阳经镇江到扬州

我们政治部从丹阳前进到镇江不是乘火车的，而是沿着离铁路约10米的一条通道步行到镇江。傍晚后总务组是租住在一家客店里，组织科、宣传科和两位领导是住在附近的民房里。有一天早饭后我有点事要同总务组商量，同时我也顺便去看望一位来往过的同事（福建人，他的姓名已经记不起）。我进他的住房时，他还躺在床上，他旁边的座椅上坐着一小姑娘，我不认识，他们正在谈话，我一到，谈话就停止，他们有些不安。我觉得那小姑娘可能就是镇江客店里，常有的靠卖身为生的穷苦人，于是我就对



那位同事说：“我是顺便先看你一下，现在我就到总务组去谈一件公事，以免妨碍你们的谈话。”我退出来后，我对这位同事深感意外，觉得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是很复杂的。

另一天的上午 10 点前后，现在已记不起为了办什么事到一家很大的饭店里，偶然看见一位身高体胖的军官从楼梯上走到楼梯中间，正同前去看望他的一位记者谈话。我当时要去办我自己的事情，同时也毫无必要去听他们交谈什么话。我的事很快就办了，我回来就向旅馆的办事人员打听：“你是否知道刚才那位身高体胖的军官姓名啊？”他说：“他就是镇江老百姓都知道的十七军军长曹万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我们的军长，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他。再过了几天，我们二师政治部就过江前往扬州，驻扎在扬州市盐务总署的大楼里，一共住了十余天。我现在还记得的主要事情有三：一是在我见到代表周邦彩之前，吴景新科长曾对我说过，周党代表是湖北人，是黄埔军政学校第四期的毕业生，政治水平相当高，善于作报告，听者无不赞赏和深受教育。我第一次见到周党代表是在他为政治部全体班干部和师以下的团级的军官作政治报告的大会上，在听报告前我已闻知有个团长藐视政治宣传工作，说它是卖“狗皮膏药”。周党代表当时所作的政治报告主要就是为批驳以上错误观念而发出的，当时这位团长虽然心里不高兴，但也不敢不听从，所以会上大多数的听众无不热烈鼓掌，我就深刻体会到吴科长所说的那番话是很有道理和有根据的。二是周党代表到扬州后还对教育界的有名人士和中学的青年学生作鼓励性的讲话，同时周党代表为扩大影响还邀请一位有名的教师上台作报告（据说他是共产党员，我已记不起他的姓名，下面就称他为扬州老师），得到听众的热烈掌声。我这次到扬州曾同一位在杭州考取的宣传员相配合向台下的各界观众作娱乐性的双簧表演，我在前面做无声的宣传表演，虽然表现得不怎么好，但是也得到观众的一些欢笑，因此我同那位扬州老师就彼此成为相知的好朋友了。三是我们在扬州停了五六天后，军长曹万顺带领他的两个师（他们原来都是福建孙传芳的北洋军阀的老部下，是在北伐军从江西攻打福建时作为投机起义而被接受为十七军的）奉命向仙女庙追击孙传芳的残部。但是却遭到孙传芳残部的有力反击而匆忙退回到扬州，不久又仓促地逃回镇江来，我们二师政治部就更加仓促，是跑步式地逃回镇江的。



### 第三节 重回镇江和准备转往汉口武昌 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

我们二师政治部回到镇江后，休息了一大段时间，按我的记忆主要记述以下几件事：1、有一天，吴科长对我说：“现在形势有些变化，组织科科长还未回来，我应兼管两个科的工作，现提拔你为宣传科的科员兼组织科的科员，主要工作是带着证件到镇江市邮局抽查居民的文件，其中如有谈到时局中形势的话，你就摘下来供领导参考。”同时吴科长还顺便对我说，孙主任和他准备到汉口、武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去另行分配工作，并问我是否也有意去，如愿意可以通知总务组多发点路费。我稍稍想了一下，因为汉口、武昌是全国的大城市又是北伐军总政治部的所在地，所以我即表示愿意前去，不过我要回杭州一下，凑点以后的生活费。2、隔了几天，周党代表有事约我前去，到后他对我说：“我有点公事要到上海南市，为了行动方便，我的中山装和你的呢子学生装互相换穿一下。”因为我们两个的身材差不多，我就脱下我的学生装请党代表试一下，正合适，我随即穿上他的中山装回到政治部。大概过了两天，党代表又要我去并对我说：“你到汉口后可到总政治部找我，如果我外出你可向政治部打听我的先生恽代英的住址前去找他。”当时我连恽代英的名字都不知道，虽然如此，对党代表的这个嘱咐还是牢记在心的。

随后几天，孙主任和吴科长先后离开政治部，同时我也得知杭州录取的那两位女宣传员也离开政治部回杭州，她俩为什么不同去汉口呢？是她们自己不愿去吗？即使如此，孙主任和吴科长为什么不尽责对她们进行说服教育的工作呢？对这件事，我当时只不过想想罢了。<sup>①</sup>

---

<sup>①</sup> 以上的变化都是发生在“四·一二事变”的前后，我当时只略闻该事变发生后在上海出现的反对共产党和破坏上海总工会等等的反动行为，而不知其详，因此我这里也不做什么回忆。





## 第六章 流亡武汉转到 北伐军总政治部

随后我为了去汉口、武昌做准备，多凑点生活费特意回杭州一下。不久我就到上海十六浦上船前往汉口。为了节省路费，我不是买正式船票，而是买的“黄鱼”船票<sup>①</sup>（船上的勤杂人员为了赚点私利，把他们船尾的卧铺私下出卖，把客人私藏在他们船尾的卧铺里）前往汉口。船开到镇江码头时我偶尔遇到那位扬州老师和他的一位同行的朋友，经过互相介绍我得知那位同行的朋友名叫洪为发，我常看到他在创造社杂志上发表文章，我即向他表示敬意。他们也是买了“黄鱼”船票上船的，因此我得到他俩的照顾，就更方便地到了汉口。我们上汉口码头时见到马路上来往的市民很有秩序，同时马路上空横挂着一幅醒目的标语，大意是：庆祝打退了夏斗寅叛乱。这些动态证明国民党右派所杜撰的汉口、武昌是共产共妻制度的话全是一片胡言乱语。当天下午他俩为照顾我，还带我到汉口一个学校的宿舍住了一夜。第二天早饭后，那位扬州老师指点我到汉口码头大钟楼旁边的一条居民街道，坐摆渡船到武昌去找总政治部。

---

<sup>①</sup> 在当时华商经营轮船客运业中有以下情况，即旅客一手把钱交给船主，船主一手把船票交给旅客，这占绝大多数；同时也有少数是船客把钱（大概把只占统铺费的一半）交给船上为旅客做各种服务的头头（他手下至少有几名帮工）。而服务头头对旅客则不交给船票，仅仅做以下保证：（1）保证旅客安全，可到他们船尾所住的十多个铺位上休息。（2）服务头头所能掌握的船主不派人来查船票的空隙时间内，上述旅客可到船的甲板上去游览观光。如遇意外，则由服务头头向船主去负责，上述后一种关系同下述的货运关系有类同之处，即服务头头完全代表货主承办他所托运的货物，私交托运的货物由服务头头存放在他所能掌握和利用的船上多余的空间里，因此第二种客运关系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有许多人不知道被称为“黄鱼”，大部分是经济贫穷，而不得不去承担的苦难。故本文在此略做解释。



## 第一节 总政治部发生的一些新情况

我到武昌总政治部后一面登记报到，一面探问原十七军二师周邦彩党代表是否在部内。政治部的人说：他现在因公务到河南信阳讨伐红枪会的叛乱，一时还回不来，你可以先住总政所设的临时招待所里，那是附近居民的空房子。

有一天晚上，临时招待所通知我同其他几个人到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听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作报告。我是第一次见到郭沫若，他讲话的大意是关于如何击退夏斗寅叛乱的一些情况——因为我站得很远，难于听清楚他的话。我前往总政治部询问恽代英的住址，对方告诉我，他住在粮道街某某号。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就去看望恽代英先生（虽然我不认识这位先生）。我进门后，他刚吃完早饭，我看见他眼睛发红，人很疲劳，因此我就不安地向他报告近五六天的情况，问他我该如何前去信阳找到周党代表。他看我年岁不大，就告诉我说，你可以凭你的身份搭乘军用火车到许昌，就可以找到周邦彩同志，于是我就高兴地退出来。

到许昌后，我就见到原来的孙主任和吴科长，当时周党代表已改任总政组织科长兼社会股股长，孙清华改任社会股副股长，吴科长改任社会股股员，我也被任为股员。吴景新同志随即简单地告诉我，每到一个城市，社会股就要先调查一下该城市的各种社会团体的状况，然后去组织和改善各种有关社会团体的机构，来为国民革命服务。

在我们到了下一个更大的城市——郑州后，我就随其他股员（主要是随景新同志）到一个新的大茶楼和一个饮食业商业团体，做景新同志告诉我的那些工作。先后干了七八天，虽然有些成绩，但效果不怎么大，按我个人来说，是同我初干这项新工作有关。

在这期间，我们总政到郑州的全体干部，大概就是由总政主任邓寅达率领到郑州火车站，欢迎西北军冯玉祥将军的到来。我看见冯玉祥下车时穿着一般士兵的军服，手里带着一把大雨伞，欢迎的人热烈鼓掌。他们会谈什么，我们一般干部是不得而知的。有一天早晨，我到一个大院子里的空场外人行道上散步，看见一个中年人上身穿一件白绸布上衣，下身穿一



条短裤，脚穿拖鞋，若有所思地走来走去，随后我知道他是郭沫若副主任。

过了几天，我们就接通知从郑州去武汉，在火车上，股级干部分别传达邓寅达主任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我这次是为了一点公事要到西北大草原去跑一趟，我就会回来，希望大家安心和努力工作。车上有少数同志还低声猜测是否冯玉祥不很赞成目前就过黄河，继续北伐。我当时对时局的形势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判断。但通过火车上的人们行为，总感觉到形势有点不妙。

回到武昌总政治部之后虽然每周照常上下班，但工作的劲头比较松弛。隔不多久总政治部组织科长兼社会股长——即我原先的周（邦彩）党代表才从前线回来。他看到我时即对我说：现在总政治部和一部分下属的政治部要缩小机构；同时要将其中工作成绩较好的干部组成一个军政教导队隶属于武汉黄埔军政学校第五期的建制，吴景新同志和你都去受训，好好学习，为以后的努力工作准备。我听了后就很高兴。不久我们两个就分别编进了教导队。其队员总人数大约近200人。

## 第二节 关于总政教导队的一些情况

军政教导队的负责人是由总政参谋处长季方兼任，校址大概设在武昌码头南边附近的（现已记不清）一大片单层公用的平房，它背后靠着一条长有稀少树木的小斜坡，这个校址的附近都住着一般的居民。

我记得，有一天教导队的一部分队员（我是其中一员）到相距较远的名叫南湖的地方。在那时的居民区中有一个很大的机构就是黄埔第五期的军政学校。我们是从学校的大门进去的，门前就有一个大湖，老百姓称它为南湖，湖水很清，我们前去的目的是为了开开眼界参观一下，自然也还有学习的作用。我当时和另几位队员还不是共青团员，主要是参观学习。我记得我们在有些空闲时就坐在湖边洗洗脚，非常凉快。有一位队员顺便指着湖对面的一幢大楼就对我们说：“曾闻知周恩来常在这个大楼上开会。”我听了就惊叹地说：“我们如有机会看到他是多么好啊！”

我们全体队员过了一阵，向学校后门慢慢走去。看见一座座、一排排



大小不一的学生住房，也有零星的学生在屋外散步和交谈着什么，很有秩序。我是带着上述深刻难忘的印象回到教导队的。在教导队受训期间，我听了一次军事课，那是一位有实践经验的老师讲的，我们的武器常常劣于敌人的武器，而敌人大多是雇佣兵，我们都是志愿兵。所以我们在轮到实战时就要英勇高呼革命口号，迅速逼近敌兵，使劲发挥较劣势的武器的威力，拿着较好武器的敌兵就会被杀伤，大多还会为保命而丢了武器立即败退下去。对这堂课听后我是留有深刻印象的。还有一次是黄埔第五期的学生和我们教导队的队员在武昌野外的一块平地上练习各种队形变化的集体动作：如何分块列队，如何集体向右、向左、向前、向后转等等的动作，达到统一整齐、灵活不乱、战斗力强等等的良好效果。

大概有十天上下，气候已相当热，教导队全体的队员在武昌城外的一片山坡地上练习打野外，其主要内容是练习看清地形端好枪，如何正确地击中预定的目标。不过我们这次是第一次学习，不是实弹的射击，以后还要进行实弹的射击，我们队员还要轮流参加做饭、做菜的劳务，增加打游击的本领。在这次打野外中有一件事队员们（我也同样）终生难忘，那就是：有一天上午或下午，我又第二次看到恽代英特来向我们作当前政治形势的报告。其中最重要的大意之一是他高声指出：“你们可放心打野外，你们可放心努力接受训练；汪精卫这个大投机家忽然倒向南京，他是不敢前来的，我在位就会同大家一起将他们打回去。”我们听了这个报告都热烈鼓掌。我们回武昌后，有一天得到通知，要我们全队学员到武昌外的一个大会场里开会。看见主席台下前面已有许许多多的大小官员，我们就坐在他们的后面，随即去听上级的训话。我们到了会场就看见主席台上有人宣布今天参加训话人的名单，其中我能记得的有汪精卫、唐生智、孙科等等。他们训话的内容大意，我现在还能记得的是：汪精卫和唐生智先后都攻击第三国际和苏俄派来的代表，说他们口头上都声称是前来为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实际上他们是要帮助中国共产党来反对我们。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在帮助共产党扩大军队，我们怎能容忍再容忍呢？最后，坐在主席台旁边的身材矮胖的孙科站起来讲：“先父和几代同人不知费了多少心力才创造出中华民国，我们如果容忍共产党来破坏，我们又怎能对得起我们先辈呢？”随即坐在台下前面的大小官员们有稀稀拉拉的鼓掌声，我们



坐在后面的全体队员几乎是鸦雀无声。

### 第三节 关于东征和南下

在听了所谓上级训话报告会不久（大概1927年7月间），我们总政教导队的全体队员也同其他有关单位一起又到武昌城外那个大空地上（也就是黄埔第五期学生和总政教导队的全体学员上次接受各种队形变化集体动作的场地），去听新编的东征蒋介石的兵团的领导人作报告。郭沫若当时兼任总政副主任，当时大家都称他为兵团的政治部主任。他当天登台讲话的主要大意是：蒋介石违背孙中山总理所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我们必须东征讨伐。他讲话时的情绪很激昂，声音很响亮，我听得很清楚，但是没有看到人。

我们教导队全体队员，事先已经知道所谓东征蒋介石，实际是指我们这个兵团就将同贺龙、叶挺的部队一起回到广州，建立新的革命据点。因此我听了郭沫若主任的报告后就很高兴，更有劲头。于是我就立即做准备，其中的一个小准备就是将我换季下来的多余卧具和服装交给教导队门前的那家老百姓家里代为保管。我认识这家老百姓和成为朋友的经过是：教导队开始训练后，全体队员就要轮流在校门前站岗亭值班，我大多是值夜班。有时最靠近校门的一家老百姓前来问我现在夜间是几点钟，我都一一相告，有时他也间或送点馒头干为我夜间解点饥。这家老百姓相当穷，很老实，我逢节假日也间或到他家中去看看。结为朋友。

大概是7月底的前几天，我们教导队全体队员，其中有我们老大哥吴景新同志，从汉口坐船到九江。在船上，有些队员在看一张传单，我也向他们借来看看。其中的大意是：当时中共书记陈独秀为向汉口工人纠察队交出枪支问题所作的说明，认为这样做对缓和一下武汉局势有利。

我们是在7月2日跨上九江码头，立即看到各条街道旁的墙上贴满了红绿色的标语，庆祝南昌起义的喜讯，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随即，我们就住进划定的民房休息。第二天早饭后，张发奎的副手黄琪翔召集我们去听他的讲话。他叫我们先排队，把枪支架在前面并退一步。然后，他含糊糊说了一些有关形势的话。（我听不清楚）并说，我是奉上级命令暂时



缴下你们的枪，你们等候通知。虽然第二天将枪支发还，吴景新和我们都明显感觉到形势不妙，随即我们又得知郭沫若主任已赶不上南昌起义，在庐山一带徘徊（附注：不久他就流亡到日本）。同时，教导队内传说贺龙、叶挺的部队将向潮阳汕头一带开动，有先到达广州的可能。因此，我决定开小差到杭州筹路费，另行设法到广州找贺龙、叶挺部队。我同时把这一决定告诉了吴景新，得知我的打算，他也准备这样，就自己另行筹足路费单独前往广州。接着，我就按自己的想法行动。我离九江时是先回到武昌教导队大门旁的那家老百姓家里住了一夜，当夜告诉他我要买一张“黄鱼”船票到上海，同时把我存在他家的那只小箱带走。他很关心我，并说，我明天帮你带行李和送你上船，设法使你能买到“黄鱼”船票。同时他还让他的一个小女孩，点了一个小的艾火把，使我能好好安睡。由于我得到以上种种帮助，就顺利地到达了上海再转车到杭州。我对上述这位朋友的盛情是永记不忘的，并使我联想到“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句成语是有一定道理的。



## 第七章 决心加入共青团努力 学习当个好党员

按原定计划，我从武昌返回杭州立即要办的事情，就是为火速回到潜老家筹点路费。因为当时李家母亲经济已很困难，花了三四天时间才勉强凑够，但回到杭州时，报纸上已刊出叶挺部队在潮阳、汕头一带受到阻击，军事不利的消息。这样，形势就起了变化，我原先的打算就成为泡影，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 第一节 加入共青团

在上述意外情况下，我只有在杭州暂时停留下来，但是我必须谋得一个临时职业（包括名义上的职业），一是为膳、宿，二是为便于应付。这时我联想到半年前我是浙江省立商校的高材生，校内我有几位互相深知的好同学，于是我就向他们分别打听校内的情况。从而得知：商校已于秋季迁移到原省立第一中学的校址，今年冬毕业的这一班学生（即我原来所在的一班）也都迁到田家园，两地相差不远。现在商校的校长名叫张璉，北大毕业，与知名人士顾孟馀（我已忘记其中底细）有关系，他有点自由民主的思想，住在校本部。学校现在的教育主任（姓名我现在已记不起）是浙江诸暨人，是从武汉回来的，在唐生智部队内做过政治工作，同校内学生有些来往，他是住在田家园分校。我得知以上情况后就同最相知的同班老同学王德军商量，要他设法介绍我同教育主任有谈话的机会。经过几次谈话，教育主任就对我说：“学校的小图书馆有必要添加一些图书，如果你愿意为母校当一名半义务性的图书管理员，我可以向张校长推荐。”这样我就顺利解决了临时工作的问题，再者该图书馆只有三个书橱放在分校



中间的一个空屋旁边，这空屋后面有两间小房间，其中一间是分校存放各种用品的储藏室。另一小间在图书室后，由分校腾出来给我做卧室。对解决以上两个问题张校长都很关心。

过了几天，我自小就结为知己的好同学傅玉成到商校来看我，他说：他已知道我这次在杭州暂时留下来是迫于不得已，现在已凭母校的关系暂时担任商校图书室管理员的职务，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条件。接着，他又专门低声对我说，他今年一二月间未能赶上投考北伐军做什么政治工作的机会，虽然是个损失，但是在春夏之交他考进了杭州市国民党办的一个短期训练班。其中主办的人员是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内有少数秘密共产党员，从而他是在这期间参加了秘密的共青团(C. Y)的组织，这是很宝贵的良机，最后他又对我说，他这次来看我是凭生死之交的情谊，对我提个想法：那就是我该考虑入团的问题，如果我愿意，他当介绍人，我考虑一下之后立即表示同意。接着，他就约我明天傍晚后到他的住处同另一位同志相见。

第二天傍晚，我就按约到了傅玉成同志的住处，那是运输河下（一个大居民区的总称）一个小弄堂里，一座楼房上的一个独居的房间。我到后傅玉成同志就对我说：“有一位名叫虞绍周的同志，是浦江县人，他是我的一个上级，马上来到，为了慎重，我们俩人要为你举行一个人团宣誓会，他会先讲些话，然后你要站起来举手讲几句誓言，例如严守团的秘密和组织纪律。”

稍过一阵，那个上级就来到。经傅玉成介绍后，他对我说的大意是：一个青年自愿入团后，就必须严守团的秘密，严守组织纪律，为党为革命奋斗终生。然后，我就立正，举起手来做非常慎重的誓言：严守团的秘密，严守组织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努力为党为革命奋斗工作。我当时入团经过这样的宣誓，留下的印象是极深的。

在我宣誓后，虞、傅两位同志问我：“你下一步打算将开始做些什么工作呢？”我说：“我对共青团的工作毫无经验，政治水平也很低，只能先从身旁近处边学边做一些较有把握的初步工作，即在商校与我同班比较深知的少数同学中先细心地考虑一下有无可以培养的对象，然后再向上请示汇报。我希望能在校内创立起一个有三四名新团员组成的第一个团支





部；不过我该如何具体地去进行，必须得到今天领我上路的两位同志给一些指点。”然后虞绍周同志对我说：“你这个想法不错，至于你如何去进行工作的问题，也可同玉成同志交谈交谈。”

## 第二节 创立杭州商校第一个共青团支部的经过

我根据宣誓会上所得到的教育和体会，又对分校中那些与我同班，并结为深交的同学做了反复的考察，如慢慢加深谈话。我认为其中有两位同学，一位就是王德军，嵊县人；另一位叫冯渭水，诸暨人。他们是最可依赖的，政治品质也不错。于是我同傅玉成商量后就向他们两位探询对共产主义青年团有何看法，他们说他们政治水平很低，如果能有机会，愿意加入共青团。这样我就写书面报告请示上级，不久就得到批示接受他们两人入团，并以我为书记创立起商校内的第一个团支部。不久王德军又介绍王某某同学（名字已记不起，诸暨人）加入共青团。团支部建立后不久，商校的分校内出现以下情况：一个海宁口音的学生（姓名我已记不起）1924年分班时，他仍分在五年毕业的一班，两年后才又并为四年半毕业的班，学习成绩不好。但他在“四·一二”事件发生后，却在校内进行国民党右派的活动。团支部为抑制他的活动，自然不去同他扯什么党派问题，而只在同学相互谈话中议论这个人。他品学都很低，而为个人向上爬很使劲，因此他在校内是很孤立的，大多数同学是看不起他的（团支部在上报工作中曾提到这个声东击西的斗争方法）。

大概是1927年9月4日，李宣平<sup>①</sup>同志代表杭州市二区团市委单独约我去谈话。他对我说：“杭州市第二区团委会来同你一起工作，团支部书记由王德军担任，”同时他又告诉我说：“下月初杭州市团委会将召开一个积极分子大会，市委领导人将发表讲话。你也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你要珍视这个大会的教育，更加努力好好工作。”

积极分子大会是一天上午，在浙江省立医专学校的一个大教室内举行的。到会的人数大约30—40人，由市团委书记胡公达（我是第一次见到

<sup>①</sup> 在这之前，我经介绍已认识并知道他是领导我们工作的负责成员之一。



他)主持。他首先请省党委工委会负责人陈之一<sup>①</sup>同志向大会致词,他讲了一长段话。我当时还难以全部听清楚,现在只记得一点点大意:1、到会代表都是以全市中等学校的青年学生和全市工厂里的青年工人,为市共青团做政治教育以及基层组织重要工作的,这是很宝贵的,你们以后要加倍努力工作。2、俄国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即将到来,我们要向他们好好学习……。

接着,胡公达同志向大会报告,我现在还能记得的主要大意有:1、杭州市的政治形势有慢慢紧张起来的趋势,大家要提高警惕,切勿粗心大意。2、市共青团员的工作重点,帮助和督促全市中等以上学校的团支部组织,如何来提高新团员的政治觉悟水平和革命的策略方法,加强扩大积极分子的队伍;同时必须注意到把城市里优秀的党团员的骨干力量,按城乡配合的原则转移到农村,去做新形势下新农村的斗争工作。3、最后他还介绍商校团支部为抑制校内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活动,采用间接的“声东击西”的斗争方法,值得其他团支部参考。

积极分子大会顺利地开完后,下午胡公达同志又在另一个地方约我个别谈话,他说:“我们这次把你调到团市委第二区区委来协助李宣平同志工作,是为了你能多受到一些锻炼,接替他来担任第二区区委书记。第二区区委是领导全市中学的团支部工作的,你一方面要大胆,一方面要虚心谨慎。你工作上有困难,李宣平同志会随时帮助你。为了你能专心工作,组织上每月发给你11元生活费,逐渐培养你成为职业革命家。组织上还打算让你每月能挤出一点时间学习实弹射击,你看如何?”我考虑一下说,我在武汉教导队受过一点军事训练,还没接触到实弹射击,最后他说以后有空可随时交谈。以上紧接着的第二次相见和谈话,使我得到许多鼓励和新的知识。

我回来后立即考虑并加快找到便于我工作的一间小宿舍,以便离开商校的图书室。经过一两天奔走,我在菜市桥一带的贫民——主要是工资低的工人所住的民房,找到一个合适的楼上单人住室。它在一个死弄堂里,房子虽旧但楼房门窗朝南,安静,面积较大,租费较少,这些对我是很适

<sup>①</sup> 写陈之一同志之时,经查得知在全国解放后他在国务院参议室工作。



合的，我就把它租下来，并托故向商校教育主任说：我在亲友协助下即将找到一个社会职业，辞退图书室的工作，谢谢你的关怀，并请代向张校长致谢。

### 第三节 传达上海团中央的指示

隔了几天，李宣平通知我，到板儿巷马路后面的一条名叫大火把弄第四号门牌的楼上开会。这排民房共十几个门，互不相通，这排民房两头各有一条较宽的上行的石板台阶通到板儿巷马路。这排民房的后面就是一条小河道，大火把弄的一排民房的居民是不能到他们的小河岸下去取水和洗衣服。我从四号门牌内一个小木楼梯到楼上房间后就看见胡公达，李宣平坐在横靠窗门的小木桌上谈话。房内横放的木床上坐着一位同志，经介绍他姓郑（名字已忘），20多岁，是团二区区委的联络工作人员。我随即在胡公达右边的门旁边坐下，公达同志就对我说：“前几天我对你所说的练习射击的事，你可不去参加。”接着李宣平叫那位郑同志把团中央的指示信拿出来交给他，他交给我看时还趁便帮助我懂得一个秘密工作方法。他说：这封来信是用一种秘密方法写的，即在正面纸上用墨笔写些一般居民通信的内容；反面是用专门的米饭水写的团中央指示内容。我们用一定的药水往上一涂就可看到它的内容。我当时是第一次知道了这种秘密通信方法<sup>①</sup>。

在我看了团中央的指示信之后，我们就开始讨论团中央的指示信，信是由何伟署名的。讨论时胡公达书记先向我们说，团中央指示信的基本内容是各省、市团委必须更加重视培训一批能力强的干部。深入农村帮助发动广大农民群众为进行农村暴动而斗争，他又说他在积极分子大会上也讲到了以上问题，不过团中央指示信中还有新的精神，新的内容，我们应该细加讨论。我坐在旁边静听他的讲话，一面又忽然看见楼下大门前有个警

---

<sup>①</sup> 我们当时为革命需要而使用的这种简陋的秘密通信方法虽然是很简单，但是我们不忽视它，并在有点滴机会时把不知道的人教成，用来为革命服务，这也是很宝贵的，我们现代科学的通信是比过去大大提高了，但必须设法使之社会主义革命服务，有条件较快地学习现代科技化的通信方法的贫困学生仍应作饮水之源。



察站岗把守，我立即向胡书记轻声相告，他立即站起来看了一下，就叫大家镇静，叫我负责看清门前的警察有何行动变化，及时反应；他自己立即把手上的团中央来信撕得粉碎，用茶水浸得稀烂，揭开床前的马桶盖把它丢到马桶底。与此同时李宣平和那位郑同志也立即把房内的秘密文件撕得粉碎丢进马桶内，将它搞烂。

稍后我就向胡书记报告把守大门的那个警察已经不见了，他听后就立即说：“有可能是找错了门牌，我先下楼出门走上板儿巷，然后你们两个先后分别离开，走上板儿巷，小郑可看情况而如何行动。”以上突然情况使我受到从未受到过的宝贵教育，特别是使我更进一步认清胡公达同志是一位很有胆略和富有革命经验的好领导同志。

### 第四节 杭州商校学生反对校长的风潮

大概又隔了若干日之后，杭州有好几个中学的学生先后发生上街游行，要求当局保证毕业后就有工作做，不要毕业就等于失业，并高呼口号，使当局深感不宁。

在这期间，商校的学生（特别是高年级的学生）发生反对张璉校长的风潮，责怪他不管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分配，要求当局更换校长。以上学潮的发生自然是由于广大学生有这样的迫切要求，同时也因为有各校团支部的积极领导，才能形成那样大的革命声势。

这里我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曾有以下联想，可以提出来谈一下。那就是：我在担任杭州市团委会第二区区委书记的期间，我和商校团支部引导学生提出以下两条：1、指责张璉校长不管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分配，这是对的。2、要求当局更换校长，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张璉是有些新的自由民主思想者，是比国民党右派好得多，而我们提出更换校长的要求，反使当时担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许绍棣有机会派他的手下来代替张璉。这是一个大错误，它反映出我当时在政治上很幼稚。

### 第五节 党中央派夏曦到浙江省委传达指示

大概是9月上旬，胡公达和李宣平同志告诉我，党省委和团市委准备



召开一个重要会议，要共同设法先找好开会的地点，让我和宣平同志负责在团市委第二区委的范围内，拟订一个开会地点的方案供上级选用；宣平同志还说要我多动些脑筋。

这样我就立即找德军同志来共同商量，他就说宗文巷嵊县会馆内的一个小学教室或者可能作为对象来考虑，我就叫他去详细了解一下该会馆有关各方面情况。第二天下午他就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我：会馆有两个大门，正门是常年关闭不用的，只利用边门出入。馆内的房屋小部分是嵊县籍的住户常年使用，人数不多，另一部分是小学用的房屋；其中一大间是管理会馆馆务和兼管小学（包括一部分教务）的负责人居住，临时出入的人很少。小学的教室是在一座大楼房的楼上，设备比较齐全，可容纳30余人开会。这个楼上的教室只有一个楼梯上下，教室外有个小阳台。该教室可以利用的时间只是星期日上午，也有可能设法延长一个多小时。在开会的那天上午他着重说，他已拿定主意，在星期六就与那位管理会馆的同乡到西湖和岳王坟一带游玩，解除了他在会馆内的障碍。

我细听后，又同德军同志再到会馆里去细细了解一番，我俩都觉得楼上教室只有一个楼梯上下是美中不足之处，接着我就另约宣平同志来会馆细看一下。我还提出以下意见：1、会馆内有几个空厕所和几个空卧室，必要时可以用来藏身；2、请你负责布置三四位有经验的同志，在会馆外宗文巷弄堂两头流动侦查，如果发现可疑的闲人在走动，就要他们前来告诉你，我就能够及时带领胡公达和夏曦两位同志到我的宿舍去，同时就由你负责，把留在小学课堂内的人员装作是生意人，在商量如何能多赚些钱的样子。以上两条，都是为了预防万一，请你考虑和向公达同志请示。宣平同志听了以后，表示一定向公达同志汇报和请示，他汇报后告诉我：公达同志同意选定在会馆开大会，时间定在1927年9月25日上午召开（这个时间我当时是牢牢记住的，到我写回忆时已记不清，经查万年历才又记起）。到大会的人数将近40人。同时公达同志还说到开大会时，将会派出3—4个侦查人员在宗文巷弄堂流动侦查，如果发现可疑的人员，他们就会前来告诉我和宣平同志，由我和宣平同志来对付他们。宣平同志将公达同志的指示告诉我以后，我就同德军同志一起去做准备了。

这次会馆的大会开得很顺利，夏曦同志在上午近两个小时讲话的中心



内容是：1、传达瞿秋白同志在中央“八七”会议上的报告，着重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错误。由于他说话较长，口音难懂，特别是我当时的政治水平很低，不能有明确的理解。2、他强调指出，在南昌暴动后工农群众相结合，创立苏维埃政府，他号召我们浙江也应努力跟上去。对这第二条讲话我已开始懂了一些，当时参加大会的近40名党团员听了夏曦报告以后都很兴奋。大会顺利开完后，我就按胡公达的预定首先下楼梯，他和夏曦先后分开走出嵊县会馆，我用较快的步子从宗文巷走到菜市场桥附近的那个小死胡同里楼上的那间卧室里。我们走进卧室后，夏曦一看就顺便说你真有意思，墙上还贴着孙夫人为人的品德。接着，我就把预先准备好的干粮和茶水供他俩解饥、解渴。我说你俩随便谈话，我到弄堂口外吃点东西并走动、走动，我会随时到房间里来听候吩咐，大概近1小时我就回到房内，再谈了一些话之后，他俩就回去了。

我收拾一下东西之后，就躺着回想这两位领导同志都是第一次到我这个小房间里来，这是很值得纪念的。他俩会继续教育我，我觉得夏曦同志年纪大一些，革命经验当然丰富；比较起来胡公达同志也是有丰富革命经验的，活动能力可能更大一些，教育后辈的方法可能更多、更灵活一些。总之，我以后要紧紧跟着他俩和其他同志努力多干革命工作。

### 第六节 1927年10月的杭州政治形势

10月初，胡公达同志在一个相当大的小学里<sup>①</sup>，同预先约定的几位同志先后谈话。该小学的校长都在校内值班，同他先谈话的那位同志好像我在嵊县会馆的大会上见过，谈话的内容大致是关于杭州铁路站在江干的装修厂以及杭州的火柴厂（女工较多），如何发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的斗争。我前去交谈，他着重交待我，要注意把西大街女子中学校内纪念俄国十月革命10周年的纪念会开好等等，同时我问刚才先谈话的那位同志好像前几天也出席嵊县会馆的大会，公达同志说：“他是个好党员，

<sup>①</sup> 上述小学处在清波门附近一带，居民称它为运输河小学，该小学校长约30岁左右；共产党员，我已记不起他的姓名。



名叫沈干城，你将要同他有往来……。”最后公达同志对我们说：“十月革命纪念节即将来到，斗争会很复杂，你们必须提高警惕把工作做好。”

在10月间，全国各大城市为了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的到来，社会进步人士和国民党左派都在报刊上发表庆祝的文章。杭州市也有报刊发表一些庆祝的文章，还有医专、工专和西大街女中等学校的学生在校内进行庆祝活动，还有由于杭州市商业公会的头头（我已忘记姓名）多方设法扩大店主的暴利欺压小职工，引起社会不满。有一天他坐在黄包车上奔走到城外时受到专门的枪手射击，因为略低了一点，只打中车背的上沿而没打中他的脑袋，这件事引起全市的轰动。总之十月革命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使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大受惊慌，他们就更到处侦查盯梢和捉拿共产党人。



## 第三篇 杭州陆军监狱六年 三个月的苦难斗争



开头语——在前面第二篇第七章末尾所指出的在杭州全市紧急的政治斗争情况下，哪知突然来了一个晴天霹雳，即：李宣平同志于1927年11月7日傍晚来告诉我，党的省委的军委机关被破坏。次日上午又告诉我：不要惊慌，克服困难继续维持工作，并同时说：“你在杭州露面比我多，必要时我会介绍你到江苏宜兴县当小学教员继续隐蔽，为党工作。”最后，他还嘱咐我要注意行动安全。在与李宣平第一次谈话后，我就把我的住处应销毁的东西全部销毁，准备第二天吃完早饭后就去那几个支部。由于第二天一早他又有新指示，我就先到商校支部黄德均那里交谈。又到西大街女中指点应该注意的事项。直到当日晚，我才到前两天为采购货物来杭而住在环湖旅馆的表兄那里吃饭和暂住一宿。当我走上楼梯靠天井的栏杆边，有个认识我的吴××（青年学生，是杭州市国民党党校补习班的地下团支部的成员之一）就跟上来问我该注意什么，我说：“你要注意安全，好好工作。”他就下楼。我就转弯到我表兄房里。他就立即对我说：“你娘舅（指我生父）昨天来杭州已办好律师登记，正在找律师事务所的房子……”这时有个身体高大的人走过来对我说：“省党部有事要你去。”随即用手拉我下楼。我立即明白吴××已是叛徒。于是我被押到国民党省党部的警卫室。当时室内有五六个被捕的学生。

当晚我父亲就立即到警卫室来看我，并低声问我原住的地点，我告诉他，他说：“我会把你的房间弄干净，你放心，什么也不要招认。”第二天（九日





上午)有个审问的人讯问我姓名、年龄、籍贯、住址。同时受这样简单审问的前后有好几个学生,当晚十点钟就由三名警察把我押送进法院路小车桥附近。这时碰巧在快到陆军监狱前,我父亲在小车桥旁寻找律师事务所和家庭的住址,忽然看见我被三个警察押往陆军监狱。他就对警察说:“我是他的父亲,可以让我说句话吗?”警察看了一眼说:“老先生,可以。”我父亲就对我说:“我在附近找到律师事务所和住址就会来看你。”

由于我被捕前根本不知道杭州陆军监狱是怎样一个监狱,同时在我参加负责杭州第二区共青团委工作后,也不曾去了解过杭州国民党反动派在浙江、上海一带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有哪些我党团员同志被捕在狱的情况。所以,我当时也无从准备该如何来对付坐牢的特别事情。当我被押进陆军监狱第一道大铁门,看见两旁有几间房屋,内有几个看守人员把我接过去,带过一幢高楼和一个铁门,然后又过一个铁门才到一个小看守厅,一个看守员来抄我的身上衣服,他叫我解开棉大衣,摸摸我的棉口袋,因为我当时穿的棉裤子是学生装的裤子,他只知摸摸我左右两手边的口袋,他觉得没有什么违禁的东西,就放我过关。从这一点里我就知道当时陆军监狱管牢房的人是没有文化知识的,还不知道学生装裤子后面还有一个小口袋,而我这口袋内却装有几张钞票,使我知道了这一经验。

看守员随即把我带进甲监的大铁门,关在左手甲监第十二号笼子。这算是我今后六年三个月牢房生活的开始。



## 第八章 一声巨吼——“蒋介石是坐不长江山的！”

下面我回忆张秋人、徐玮等革命前辈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英勇献身的事迹。

我进牢房后，就住在笼门旁地板上的一个墙角边，笼内约有四五个犯人（过了好几天后，我渐渐得知，当时的陆军监狱几乎都是关的军事犯，如逃兵、土匪和刑事犯，大都没有文化）。每个笼子里，稍能干一点的人，都要同笼子的人拜他为笼头。我第一晚进牢房包括后来的一段时间，这个牢房的笼头看出我不是军事犯而是政治犯，他没有对我说三道四，我也对他做一点工作。

我第一天晚上进牢房最大的一个困难是没有被子，只好靠着墙角缩着身体，冷睡到天明太阳出来。幸亏第二天上午我生父到杭州亲友家借一条棉被，送到狱中来，缓和了晚上睡眠的苦难。

后来，我在甲监换了三次笼子：第一次从第十二号笼转到第一号笼，第二次是从第一号笼转到第三号笼，第三次是从第三号笼转到第九号笼。同笼的人都是政治犯，没有变动，他们都是嘉兴同案的人，他们都是国民党偏左的人士，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他们觉得我是一个诚实的学生，常常照顾我。以后我就没有再换笼子。在上述换笼期间我是没有遇见在外面就相识的同志。所以都处在全陌生的环境中。在这一段时间内我日日夜夜焦念的一件大事，就是胡公达等四位同志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危急环境中，受着什么样的严刑、重罚，深深苦于没有通一点信息的机会。下面我按以后几个月所经历的几件重要事情分五节记述如下：



## 第一节 贝介夫同志的英勇就义

我记得我转到三笼后不久,监狱又把一个案犯关进第三笼,他名叫贝介夫,比我大好几岁。同笼期间,有一些谈话,他问我:“你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啊?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名叫李政,是浙江省商校学生。”他又问我:“你是怎么被捕的?”我说:“我不知道,他们乱抓人”。

稍后,他对我提到:“我转押到这里来,估计十分之九是因为我的案情重,犯了什么革命大罪,我准备为革命而牺牲。”我不便多问(因为笼内还有别的人),心里已明白他一定就是省委军委的案件,我很钦佩他的革命精神,隔了一段时间,我就被转关到第九笼。

我转到九笼后不久,就没有在放风时看见过贝介夫在三笼进出的情景,稍后我在三笼难友那里得知,贝介夫同志是在被关到三笼后若干日就被看守员带出去而再没有回来,这使我明白国民党反动派把他转押到陆军监狱,就是为了看做第一个大案犯来执行枪决。这是何等残暴哦!至于他英勇就义的准确日期我当时是难以弄清楚的,至于他生前的经历我也不知道,实在遗憾!我是到很多年以后才从《杭州党史人物》关于贝介夫的传记中,知道他是1927年11月6日被捕,同年12月18日光荣牺牲在杭州陆军监狱的刑场上。关于“红色恐怖团”如何掩护张秋人同志加强浙江省委工作的经过,留到第四小节再做介绍。

## 第二节 曹仲兰同志的崇高形象

在贝介夫同志英勇就义后,大概是1927年底前几天,胡公达和另三位同志一起转解到陆军监狱甲监,一位关进第五笼,另两位关进第六笼,其中有一位有点面熟,胡公达关进第八笼。由于我得知我们的团委书记关到我隔壁的笼子,我在放风时,向他请示的机会就比较多些。不过当时甲监(乙、丙两监也一样)的放风,是指把关在笼子里的人放到笼外空地上的一口大井边去洗洗衣服,抹抹身子,带点水回来清洗一下笼子里的马桶。每个礼拜放一次,三个笼子一起放,每次只放一两个小时。这样,比如甲监七、八、九三个



笼子在一个礼拜,只有一两个小时,两个礼拜里,也不过四个小时,在以上放风的时间里才有互相谈话的机会。所以我同胡公达谈话的时间是很少的,而且要防备别人听见。因此,我在两个礼拜里,先后只谈了以下内容:

我向胡公达同志汇报,我听了李宣平告诉我团委机关被牵连破坏的不幸消息,我如何按照他的指示负责维持工作。但不到两天,我就被一个密探(一个叛徒带路)跟踪到环湖宾馆而被捕,关进陆军监狱。入狱一个多月后,由一个老法官名叫杨公忽(?)到设在狱内的临时法庭简单地审问了一下(当天有好多人先后这样简单审问),我什么都没有招认,以后就没有再审问。胡公达对我讲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他低声说:“住在五号笼子的那位同志名叫曹仲兰,团委机关被牵连破坏时,他被捕时是市团委秘书长,但他挺身而出承认他是市团委书记,并说胡公达是外地人,出来谋生的,被我雇来刻刻蜡板。”曹是浙江医专毕业生,我第一次认识,我想在医专学校开积极分子大会,恐怕就是他负责安排的。最后胡公达又对我说:“你要牢牢记住曹仲兰同志。”第二,我们八笼都是相知的人,其中有两位,我明白告诉你,一位叫石天柱,是我前任的团市委书记,被关押已五六个月,另一位名叫谢芬,浙江省立农业学校学生。

大概是1928年1月10日前后,关在甲监大笼子里的难友从笼门小窗口望,我们也可以从笼门小窗口感觉到。甲监大铁门外小看守厅里,有好几个看守员忙忙碌碌地活动,显得人很紧张,其中有一个看守员走向甲监来开大铁门,把关在第五笼的曹仲兰带出去交给了另一看守。接着他回头到九号笼子前,把笼门开开,叫:“李政出来!”这时我大大意外,随即拔下棉鞋跟,当时我只想到赴刑场不过只吃一颗子弹,当在这紧急时刻,这个看守又把九号牢门锁上,转身到第六笼,把那个我有点面熟的同志带出去。这时甲监鸦雀无声,这时与我同笼的人拍拍我的肩膀,照顾我坐下来休息,方知他弄错了对象。

曹仲兰被枪毙了。而六号笼子被带走的同志,只是带到法庭上去重新审问了一番,然后又回六笼。事后胡公达对我说:“那时我听到看守那样呼叫你,都十分意外,这对你也算是个锻炼。”

曹仲兰同志英勇走向刑场时高呼口号。一位善良的老看守是杭州口音,感叹地说:“他生前在放风时,还给我看过病,为什么要杀害这样的好人



呢？”他还说：“我年近半百，只有一个好女儿，如果我有门路一定设法营救这个好人，把我的女儿嫁给他。”

### 第三节 沈乐山、赵济猛等同志英勇就义

我记得大概是1928年1月22日前几天，从宁波转押来一批政治案犯，其中省委负责成员一共有四位，是因为留在浙江省党的军委组织受到破坏而被捕，押解到杭州陆军监狱；我当时对上述情况和那四位省委负责成员的姓名都不知道，不过随即得知他们叫：沈乐山、赵济猛、项志成、曹阿堂。其中沈乐山、赵济猛关在甲监七笼（以后从老难友徐雪寒同志那里得知：他和其他两位难友鲍悲国、庄启东也是随从由宁波转押到杭州，关在丙监，对那四位省委负责成员只认识：沈乐山、赵济猛，不是同案关系）。

甲监各笼在一天的中午正准备吃年夜饭的时候，有看守员突然来到七笼门前把沈乐山、赵济猛两位同志带出去。他们就昂首走出甲监大铁门，向刑场英勇前进，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我们在笼子里听见刑场里的枪声，都立即放下碗筷，心里非常难过，哪里还吃得下年夜饭！

这里我顺便说明一个问题：中国档案出版社的内部刊物《杭州党史人物》中邬连平编辑《徐玮》的文章中所写的是徐玮在吃年夜饭之后写的“为无产阶级而牺牲”八个大字。我认为这可能是由于被引用的党史资料的作者，没有把年夜饭后的时间和张秋人就义后的时间划分清楚的关系。

### 第四节 张秋人同志的被捕和英勇就义

国民党反动派头头蒋介石在浙江、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浙江党团组织屡遭破坏。到1927年10月4日——按农历说是九月六日前后，党中央决定张秋人同志到杭州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按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加强城市和农村的工作。秋人同志到杭州后不久，即拟定在西湖白堤附近召开特别会议。哪知先后有好几个反共的黄埔学生盯梢。他看形势不利就纵身跳入西湖准备逃身，但白堤的湖水不够深，终于逃脱不了而被捕。上述张秋人



同志的被捕情况是从胡公达那里得知的,我当时也只知道这一点,我在这里就按这一点加以记述。但多年以后,即1999年我开始写本书时才知道它是极不完全的。

我记得大概是1928年2月初,他转押陆军监狱第五笼,他同胡公达是亲密老友。我对他是完全陌生的,由于这时甲、乙、丙三监内放风范围稍微放宽一些。以甲监为例:一、二、三、十、十一、十二六个笼子第一礼拜在上午有一个多小时同时放风,在甲监的走廊上活动活动。而四、五、六、七、八、九六个笼子每个礼拜在下午有一个多小时的放风时间。因此,胡公达就有机会到五笼同张秋人交谈一下。有一次,胡公达带我于放风时至五笼与他相见。他同胡公达谈话时讲到:你们在狱内最好从上海私下买进“INPRECO”第三国际通讯,这样就可以知道共产国际大事,接着他还问我在武汉总政教导团学习的情况。我因时间关系只扼要地讲了一下,遗憾的是我没有直接听到过邓寅达的报告。有一次在武昌城外野山里打实枪无实弹的野外演习,恽代英副主任以豪爽的声音说:“你们不要害怕,只要我恽代英在,陈公博就不敢进总政的门。”他听了很高兴。

我记得张秋人同志住在五笼期间,薛雨霖(另名薛暮桥)同志曾与秋人同志谈话。他们谈什么还有什么人在一起我都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同雨霖同志未来往过。雨霖同志比我大几岁,先我几个月被捕,我原先同他无往来,也不认识,入狱后他或者还关在狱外的看守所,或者关在乙监未曾见过面,我大概是换了几次笼子之后才见到他,到四五月间,我才时常得到他的帮助。

1928年2月8日,秋人同志被押赴刑场前,执行官要“验明正身”,他厉声大喝“老子叫张秋人”。他被传出牢房时不许看守的狱卒碰他一根毫毛,他一边阔步前进,一边振臂昂着头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万万岁!”这位巨人的英勇高大的形象是永远值得我们深深学习和纪念的(关于张秋人同志英勇就义的事迹请参阅杭州市民政局编:《杭州革命烈士英名录》一书,第14页中的说明)。

在这之后不久,天上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早上,又正是放风,洗衣服的时候,胡公达在井旁的瞭望楼下和乙监的牢房前面的一块大雪地上,拾起一块细长石头代笔,写了“为无产阶级而牺牲”的八个大字。甲监朝北的一



排笼子和乙监朝东的一排笼子里的难友们都很沉默地望着那八个大字。我当时正在大井旁洗衣服,也看见那八个大字,内心十分难过,意识到在近一个月内国民党反动派连续三次极其残酷地杀害了我们狱内可敬可爱的老领导们的宝贵性命,这对公达同志来说是比我们更加难以承受的,所以他写完这八个字后就立即回到他的笼子里,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地铺上,闷声不响。

## 第五节 徐玮同志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

大概是1928年3月初,监狱当局叫若干名政治犯到看守厅外空地上去拍照,其中也有胡公达。他拍完照后,在有机会时曾低声对我说:“今天,叫我们拍照自然会有作用。我十分警惕。我是尽可能不正对镜头。使被拿去要别人识别时,不能认出是我的照片。因为上海有许许多多的人熟悉我的脸型。”这件事又使我想起1927年开团的积极分子大会后的下午,他专门要个别与我谈话时,曾顺便问我说:“你听我说话的声音像哪里人啊!”我说:“是崇明人吧!”我当时还不怎么理解他这个问话的意思。现在我完全明白。他是随时都注意对敌斗争的,蒙蔽敌人,使他们不知他是海门人。

这次照相之后,虽然没有反应出什么麻烦,大概是四月初的一天,钱西樵在狱内法庭上大声说“你不叫胡公达,你不要再隐瞒了,老实认罪!”他听见以后就知道党内出了叛徒,他说:“你们大兴冤狱,蒋介石是坐不长江山的!”并高声提出三大问题:“孙中山先生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你们现在反共、镇压革命,是实行谁的政策?要建设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实现中国世界大同的理想有什么罪?国民党为什么要背叛革命?”钱西樵狼狈不堪答不出话来。公达同志就高声说:“你既答不出话来,我就只好共产党员当到底了。”说罢,他就昂首回到甲监,向狱内的一部分同志转告:钱西樵如何依仗我党内叛徒的告密自得其辱的审问,在如何遭到大义凛然的三条反驳之后的狼狈丑态。

胡公达回到笼子以后,深知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于是利用各种机会,拼着最后的时间,向难友们宣传“八七”会议精神,宣传外面的革命形势,勉励难友们紧密团结,坚定信念,战胜困难,继续革命。



我记得在大概四月间胡公达同志写了一首诗：

生死何计迟与早，灰色马在门外叫。  
出门横跨马归去，蹄声响处人已遥。

过了若干日，有一天，看守员传他出八号笼子。他知道这是去见马克思的时候，就从容走到九号笼门口。我已守在九号笼门口。他抑制着感情，伸手朝笼门口紧紧握着我的手，对我说：“你不要难过，你要好好学习，为前辈报仇。”我听了立刻哭出声来，并说：“我一定做到。”然后他就一面阔步向甲监大铁门走去，一面向全狱的同志高声大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万万岁！”一直喊到狱内的刑场。与此同时全狱的党团员无不万分悲痛地唱起《国际歌》。

当时我同甲监少数有家庭资助的同志，用一个银元的高价买一份《申报》或《新闻日报》，让可靠的看守员，于深夜丢到笼子门窗里来，我们是通过公达同志就义后上海新闻日报的消息报道才知道公达同志的原名是徐玮。





## 第九章 陆军监狱东监特别 反省院的苦难斗争

在徐玮同志英勇就义后，甲监党内一个主要任务之一，是要查清出卖徐玮同志原来身份的叛徒是谁，这虽然是一个不能立即就办到的事情，但是必须设法努力去进行。

在五六月间陆军监狱大监又陆续关进了新的政治犯。笼子里的人数更是显得拥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当时在杭州是以沈定一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为主）又采取设立“反省院”的措施来对待关在狱内的政治犯。反省院是国民党反动派用来对付政治犯的一种方式，企图通过反省院来瓦解政治犯的斗志。它分设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吉祥巷反省院，我们称它为普通反省院；一个是陆军监狱东监的特别反省院。后者是把关在陆军监狱大监内的一些主要政治犯转押过去。我当时记得有我比较熟悉的：石天柱、谢芬、薛雨霖、徐天仁（后名徐洁生）、范船僧、苏中常（后名苏渊雷）、朱深（后改名朱楚辛）和我，还有我初识的难友杨成。

东监有一个总的大铁门。在监狱长办公大楼和大监大铁门之间的通道的距离大约 20 米。我们被押进东监大铁门后看到：靠右有一个为全狱犯人做饭的大厨房。大铁门内有三间平房是看守所长和看守员办公的地方，另外有三座小平房即东、中、西三个牢房是关押政治犯的牢笼。我们被分别关进三座牢房后。得知石天柱、范船僧、朱深、杨成和我被关到中牢房；薛雨霖、谢芬、徐天仁、徐雪寒被关进西牢房；鲍悲国、庄启东关在东牢房。过了两三天，我们才知道特别反省院和大监在生活上有以下差别：一是有铺位可住。二是每日三餐可轮流到东、中、西三监外的食堂几张长餐桌用餐。按规定一次可容十几人。特别反省院同普通反省院还有以下区别：就是它每周不用举行总理纪念会，暂不进行强迫的反省教育。因此，我们东、中、西三监的难友相互沟通机会和办法就很多很方便了。过了十多天我们就知道，



中牢房6个笼共关了18个人,东、西两牢房共8个笼子关了16个人,挤得很满;并且知道,其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原先关在东牢房的政治犯,是杭州“四·一二”事变发生后被关进来的难友:徐白民、唐公宪、童志沂(我对童还有点认识)等。

我在东监特别反省院呆了一年半(即1928年5、6月间—1929年年底前),下面分四小节来回忆新的苦难斗争。

## 第一节 1928年5、6月至8月

到特别反省院后,不久由于薛雨霖同志已在大监学习世界语(ESPRI-NTO),所以他编到西监后就教自愿的难友学习世界语。我记得雨霖辅导梅君世界语时一幅老大哥、小弟弟的情景,这个我的印象是很深的。因为自愿学习的难友渐渐多了(我也在内),有时就在饭堂里集体教课。还在饭堂的墙壁上出墙报,后来还把比较有内容、有趣味的短文贴在墙壁上供大家欣赏,有些世界语短文还在文后附上中文的意思。短文的内容大多数是一些民间故事、诗集,其中还略微带一点反帝、反封建的短文。这样国民党当局也只好同意我们这样的自学。而且有些看守员还前来观看墙报。这样就为我们把陆军监狱东监特别反省院改造成为铁窗下的自修大学奠定了基础。

院内还有一些难友自学英语和日语。例如:徐梅君自学日语时是用的上海澄中中学的教科书。自学有成绩,发音很准。我是自修补习英语,是一面翻字典,一面把国外出版的一本论社会进化的小册子(书名已忘)翻译成中文约数千字。因为杨成同志的英语程度比我高得多,给了我不少帮助。同时我也知道,他在上海党的领导下,做半公开的互济会工作。即对被捕的党团员和民主进步人士的家属进行慰问和营救,他是由党派到杭州做互济工作而被捕的。

大概是1929年4、5月间,杨成同志的爱人特地从上海来看望他。我偶尔得知,她是四川人,在上海有名的大学攻读西方文学,将留法深造,为表达她的爱情,特单身前来探狱。看守员为了加以照顾,不是要他们俩人在监狱高楼下的大铁门内相见,而是安排他们俩人在通道旁边的一个单层休息室内相见。约两小时后,杨成同志回来后对我说:“她要留法学习,五年后才能



回国,她还难过得发誓永远保持着她的青春,记挂着他。并说她单身住在一个旅馆里还要再来探监一次。”特别是老家也在杭州的一位难友(姓名已忘,是象棋老师)对杨成同志说:“我可以请你爱人住到我夫人家中,加以帮助,请放心。”这也反映出我们狱中老难友随时都友爱相亲的心情!当时东牢房有一位原先的老难友(姓名已忘)是湖南人。擅常用各式刺绣线在专门的十字布上刺绣出各种画面。也很想刺绣出一张表达相应内容的画面,送给杨成安慰他的爱人。但是身边没有钱。恰巧我的表兄来杭州,请他代我买了一本英文《韦博大辞典》(价格20多元)便于学好英文翻译,我就想把这大辞典交给我父亲,到商务印书馆换购另一本英汉字典(价格约10元)和一本百梅大画册(价格10余元),我就把百梅画册送给杨成,请他转送给他的爱人。

大概是八九月间,监狱当局要求我们每天有这个机会到看守所平房后的空地上做点体操活动锻炼身体,对方同意派个中年体育老师来到空地上教八段锦和小跑步。从而得知那个大厨房旁边的半高墙南面的空地是大厨房储藏粮食蔬菜燃料的地方,再往南大概就是狱内的刑场。

我记得大概是年底前特别反省院被监管人员有以下变动:一:唐公宪同志已经离开东监,还有一些年轻的难友转到普通反省院,同时也有几位是从大监转过来的,其中有一位名叫张启阁,是同鲍悲国原来就认识的,关进东牢房。“四·一二”事变后抓来一批难友,从事教育、指导工厂工人、店员、铁路职员的教育分子都被指为跨党分子和共产党员。当时关在看守所里的徐白民、唐公宪等等,就是有相当社会地位的。在看守所被改为特别“反省院”后的一年多后,他们先后出狱。大概看守员看到徐白民等三人同挤一笼就把徐调到东牢房去住。以后不久,中牢房的邹子侃关在五笼,朱深关在四笼,我则关在第三笼,和朱深是对面笼子。

## 第二节 1928年8月至1929年3、4月

我记得我们东牢房内的自修大学也是很注意文化、娱乐活动的,除了下象棋外还有擅长下围棋的,谢芬曾在大监教过我下围棋的初步知识。我关到特别反省院东监后,因为徐白民同志爱好下围棋,但是没有对手,我就再向他学习下围棋的常识。之后,开始他先让我四个子的方法,但我仍屡屡败



退。后来，他为鼓励我前进就平手对下，开始从多输变为少输，后来只有一次由于他偶然的疏忽，赢他几个子。我觉得这是个很有意义的文娱活动。

再者，我记得1928年过春节的时候，东、中、西三牢房的难友在饭堂里演出了短小的文艺节目，前来观看节目的还有看守员和大厨房里的员工，其中院内老难友有好几个是永康、蓝溪、严州教学人员。他们善于演唱富春江一带的民间戏曲，还擅长各种拳术。其中：一是京胡、二胡的表演；二是唱歌、唱戏的表演；三是在饭堂空地上各种拳术的表演，都前后赢得了阵阵掌声。最后演出了富春江流行的好几个民间戏曲，引起了场内外全体观众的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春节过后，中牢房就由徐白民、石天柱、杨成自发带头，西牢房就由薛雨霖、谢芬自发带头，东牢房就由鲍悲国等同志自发带头，在各笼里分别交谈有关反帝反封建的知识和如何过好眼前的苦难生活。

### 第三节 1929年4、5月至9月

4、5月间有些难友患上痢疾传染病，我们中牢房四号笼子里有一位难友名叫鲍照光，受毒蚊的传染生了很重的痢疾，难以承受，狱医无法治疗。我们一再向监狱长要求准许临时保出到杭州市医院去抢救，但是不加理睬，终于在一个早晨死在四号笼病床上。我们一面护理好遗体，不让监狱当局把遗体随便拉出去；一面设法把这个消息传到狱外报馆去。因为这时国民党省党部有两派，一派是当权的西山会议派，一派是C. C派。于是杭州市各报刊发表消息，而且C. C派还派大员许绍棣（教育厅长）和几个助手前来特别反省院询问。于是中牢房铁门前，我们就同石天柱、徐白民、杨成等全笼的难友站在铁门内，监狱长站在铁门外旁边互相问答。我们三位代表高声说：“我们一再要求保出医院立即抢救为什么不理睬？”这时，许绍棣说：“以后如何改善狱内的治疗，监狱当局会考虑。公开宣判司法官会负责，不过，要有个步骤。”说完他就退出，接着监狱长说：“狱内以后治疗可以考虑，现在天气炎热，应该开门及时安葬遗体。”三位代表理解到斗争应当有理有节。一面让遗体得到安葬，一面仍坚持向监狱当局提出宣布我们有何罪状、刑期多长的要求。对方还仍不回答，于是我们宣布绝食斗争。



到傍晚传我出去与我父亲见面,他劝我不要绝食。我说:“难友病死大家都悲痛绝食,我怎能不参加呢?”这时,看守把我的行李抱来强迫我到丙监去住。我就打开我的行李,看到杨成同志写的一句话(DownFarrK. M. T. !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到开饭时我坚决不用餐。第二天一早,看守员就送我回东监,国民党监狱当局已答复:“你们的刑期问题我们已经向司法当局提出了。”

经过以上绝食斗争,特别反省院内有以下变化:一、医疗条件改得较好一些,即狱内医师不能治的病请狱外医院的医生来院内治疗。二、一日三餐不到食堂里去吃,而在东、中、西三监笼房里吃。三、调换了一个新监狱长名叫骆某某(名字已记不清),因为他说话同唱滩簧差不多,我们就戏称他骆滩簧,他不属于西山会议派,他对我们说话不得不客气一点。

我们难友经过上述绝食斗争变得更加团结、更有组织性。工作的重点之一是争取恢复到食堂里去吃饭,重点之二争取保持我们自修大学的活动,重点之三是渐渐进行马列主义的自学和个别交流的活动(以后不久杨成、石天柱等十几位难友调到普通反省院去学习,大概九月底又调回来,他们在那边的学习情况我以后再做回忆)。在进行前述的政治斗争之后,院内有一部分党团员渐渐形成半小组织关系。例如:西牢房以谢芬、徐天仁等所形成的西牢房党小组,东牢房由鲍悲国等同志所形成的党小组,中牢房由后来的年轻的邹子侃、朱深和我所组成的中牢房党小组。我记得,大概“四·一二”事变后原先住在东牢房的难友先后出狱,而中牢房的单间内的徐白民同志可能因为有不便就让他转过去住。这样我们中牢房党小组中的朱深就住到了第三笼。

在东、中、西三牢房有了党小组的组织活动之后,对开展各种“自修大学”的活动和进行学习马列主义就更加便于进行了。

大概到九月间,邹子侃同朱深和我商议如何再掀起一次绝食斗争。我们第一次商议决定找一点碎玻璃片将它敲成粉碎的玻璃屑然后分成三包,以便将它混进大米饭桶里去;决定后我们就秘密地进行了准备工作,隔了几天,就决定我们三人次日上午,各拿一包碎玻璃屑,混进饭桶里大米饭中间去。我们照这个安排先后抢先拿碗到饭桶边去盛饭,随即惊呼:“为什么大米饭桶里有碎玻璃屑?”随即来盛饭的难友也跟着立即大声呼叫起来:“是谁



干的这种陷害我们的勾当！”于是全牢笼都震动起来。东、中、西三个党小组也立即准备做若干天的大绝食斗争。

新来不久的监狱长骆滩簧惊慌得手忙脚乱，先到中牢房查看饭桶里的米饭和玻璃屑，觉得难以有可疑之处，就用唱滩簧的调子对我们说：“你们先安定下来，我再到大厨房里去看观测询问。”骆滩簧又到大厨房里去，我们间接得知他细问厨房师傅中午饭是哪几个人烧的，是哪几个人送的，厨房里还有哪些杂工等问题，厨房师傅都一一回答。然后，骆滩簧就回到办公室，请狱外的医院的医生来替中牢房吃过饭的案犯下药清洗肠子。接着，晚饭后就到中牢房外饭厅里为我们三人大概还有另外两个人下药灌肠。我们立即大吐大拉，味道是很不好受的，我们都咬紧牙关对付过去。

当天晚上，我们为了施加压力，一面对监狱当局要求保障我们的生命安全，一面就宣布绝食。

过了两天骆滩簧前来东、中、西三牢房外的饭厅向大家说：“对于案情我会接着负责去查明，不过要有段时间。对厨房烧饭、送饭，我会派人加以管理，你们也必须听命自爱，立即恢复饮食。”于是我们就对骆滩簧说：“你说话必须算数。”我们也就认为适可而止，随即于当晚恢复进餐。

第二次绝食结束后，骆滩簧安排看守员注意中牢房的活动。一面将中牢房的大铁门打开，一面将六个笼子的笼门都关上。便于看守员随意进出中笼的过道。同时规定各笼互相传递东西，要经过看守员的手来传递，我们自然提高警惕随时加以对付。我们中牢房的个别同志利用两个相对笼门口做一些手式语的联系。我记得有一次，我要送一条短裤借给对笼的朱深同志，中间夹着几个鸟毛，交给一位严格检查的看守转过去，他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转给朱深，弄得他啼笑皆非。东、西两监也受到一些影响。从此我们沟通信息的机会减少，东、中、西三牢房只有分别利用做体操放风的机会来进行，所以这第二次绝食斗争是有副作用的。

这以后，特别反省院常有一些案犯从外面和大监调进来，我记得其中曾有一位案犯关进中监，是於潜人。同我认识，他们名叫赵效平、章炎和何笑山，都是从事区乡教育的，赵是受了我的入团介绍人傅玉成的影响，于入团后不久就被捕。他为对付敌人的笔供就说：“何、章两位普通国民党员也是共青团员。他们三人在1927年年底就保释出狱（我到以后随粟裕部队开



辟苏浙军区敌后抗日根据地时将要提到与章某的关系)。”

与此同时扬成、石天柱等同志也从普通反省院回到特别反省院,杨成可能关在东牢笼,石天柱可能是关在西牢笼。

大概到 1929 年年底,甲监牢笼的案犯(约 20 人上下)由看守员把先传的人先带走,后传的人后带走。时间大都在晚上,次序零乱,我们觉得有点晕头转向。我只记得我们十几个人被转到大监。我是被转到甲监五笼,邹子侃四笼,朱深大概三笼,还有石天柱、谢芬、徐天仁关在八笼,还有徐白民和苏中常有可能在甲监大笼。杨成是关在八笼呢?还是六笼呢?现在已记不清了。

还有一些老难友如薛雨霖、徐梅君、鲍悲国等同志是被关到大监的大铁门外小车桥旁南边一条小胡同内的看守所内,我不知道有这个看守所。我以后一年内不能同他们有什么往来,所以我只按我在甲监以后一年中的接触来回忆狱内的苦难斗争。

我曾听人说那天晚上从东监搬到大监来时,曾单独提出来并询问他们……。



## 第十章 返回陆军监狱大监

我们这次搬回大监来的难友都是两年前关在甲监的老政治犯，甲监还有以前就认识的老难友。所以经过两三个星期的串联后，我们就得知以下情况：一是甲、丙监所关押的都是政治犯（乙监是军事犯）；二是在甲、丙两监政治犯的带领下每周一次放风，六个笼子一起放到大水井旁洗衣服的时间已放长了一些；三是甲、丙两监的难友大多吃狱内的黄米饭，不过它的质量都有些改进，不像以前那样难吃。以上生活的改变自然是我们政治犯难友共同斗争的结果。

另外过了一个礼拜，我们还了解到：在甲、丙两监的难友们中有一部分是留俄回国后而被捕的文化人士和在国内担任党、政、军重要工作的干部，甲、丙两监各笼难友自学马列主义理论的各种活动比一年半前有发展。

再者，陆军监狱大监除甲、乙、丙三监外，还有一个在总大铁门外南面靠近小弄堂内的看守所，也是关政治犯的。九月底晚上因东监转关到甲监大监政治犯人数多，其中若干名政治犯如：薛雨霖（后改名薛暮桥）、徐梅君（后改名徐雪寒）和鲍悲国等难友就由看守员关进那南面的看守所。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大牢南总大铁门外的这个看守所，不知道他们是被关到南面的那个看守所，没有任何来往，不知道他们在那边的情况。同时，本章与下面第十一章的回忆也只需按自己的经历来进行。——附注：我1934年1月出狱后，能很快到上海开始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爱国工作，如为《中国农村》月刊勉力写些文章等等，这是有赖于暮桥同志先出狱做了牵线搭桥的工作，为了以后能简明地写出上述往事，我这里顺带介绍一下：《薛暮桥回忆录》道：“暮桥同志于1930年12月刑满保释出狱，在杭州向钟鼎祥同志询问党组织的情况，被告知已破坏，因而回家……。1933年2月，由陈翰笙同志推荐到杨东莼任校长的桂林广西师范专科学校任教，改名为薛暮桥……。1934年4





月,和其他几名师专教师一起,随同杨东莼被白崇禧‘礼送’出广西,到广州陈翰笙同志处继续做农村调查工作……”(详见《薛暮桥回忆录》第493—495页)。

## 第一节 1930年1月至6月

有一天放风时,杨成同志告诉我:“他们(人数已记不清)那一次到普通反省院去学习,除了一同去的石天柱以外,还有留苏回国后而被捕的留学生,是该学习班中年岁较大的主要政治犯。杨成说,他当时注意到这个学习班有些特别,例如:有时偶尔参加旁听普通反省院的总理纪念周的报告,并要大家回班后讨论讨论。有时那些留俄回国的学生,又各自谈谈回国前的国外经济形势。例如:有些西方国家市场萧条,商品卖不出去,工人失业和罢工斗争的现象渐渐增加,等等。还有几个回国的学生对石天柱、杨成等同伴难友表态说:“在我们眼前的强迫措施是为地主买办效劳,我们应该设法抵制并指出国外经济萧条,商品卖不出去引起工人失业和罢工这些情况……。”杨成对我说:“他在这个临时的学习班上保持高度警惕,不随便发言。”

大概是2月间,邹子侃同志以我们原先在中牢房的党小组成员为基础,在甲监成立了一个新的支部,他为支部书记,另两个支部委员名叫:何觉人(浙江宣武县人,被捕前是在杭州公共交通汽车当售票员);另一个名叫:叶樟树(兰溪人,贫农,在乡下参加过农民暴动活动)。他当时对我和朱深说,党支部有个秘密安排,即在四、五、三笼,于晚上睡觉后秘密撬开一块地板,然后沿地板下曲身下到牢房的泥地上挖土,慢慢开出一条通道准备越狱,但要互相商议一下,互相合力去做。

我们五笼有八个老难友都是生死与共的,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年岁较大的农民,大概是上虞百官人,领导过浙江钱塘江边农民暴动,他坚决赞成,其他的同志表示赞成,一面觉得对上述具体计划有怀疑。杨成也有同样的看法,但不能不跟着干。至于如何撬开睡铺地板,慢慢挖开泥土我们都可以轮流去做。这里有个小困难我们有办法去克服,那就是各笼用一块小玻璃片子把它的一面涂上黑胶墨斜放在笼门口旁,照着甲监大铁门外的看守小厅,



就可以同大笼子甲监内的难友一样可以看见甲监大铁门外的看守员的动作。因此,我们在深夜去挖笼底下的通道时,我们就一面用高枕头和被子虚放在墙角边好像有个人睡在里边,以此来对付夜晚查夜的看守员,使他无所察觉,来掩护挖地道的工作。

对安全进行挖地道的工作有以下三关:1、要选好一块较宽的铺板。把所钉上的长铁钉慢慢设法将它转动,使它能照样复原,便于白天加以掩护。2、下去挖通道时要带够干粮和饮水。3、要注意分清通道的方向(即要按西大北小通到松木场方向,尚能微微听到一些行车的声音)。4、挖通道主要靠四笼和五笼的难友,三笼的难友只要挖好通道的开端就可以了(我曾两次从五笼下去参加挖通道的工作,通道内的空气很难受,但只盼望一步一步地慢慢进行)。

邹子侃同志对开通道的安排经常嘱咐,要极端注意保密,对开通道的进度对我也不常提到。这是必要的,另外他还注意对乙监的少数军事犯,趁放风时做些政治工作,并对其中少数同情分子在看守厅里做点事情,共同参加改善生活的斗争。其中,有一位军事犯(我已忘记了他的名字)是江北口音,善于理发。看守员就要他在看守厅里当临时理发员和杂工职务,邹子侃在放风时和他常有来往。我曾对子侃说:“对一些同情我们的、可以信赖的军事犯多做些联络工作是必要的,不过要时时警惕,你看如何?”他点点头。

大概到三月下旬的一天,骆滩簧要邹子侃到他的办公室去谈话,到后,他就发问说:“你要老实招供,在军事犯中搞什么越狱斗争,否则我要加重处分你。”邹子侃见势不妙,立即上前用大力把骆滩簧推倒在地板上,用大力掐紧他的喉咙,打算把他掐死。正当骆滩簧喘不过气来时,留下的保卫人员,快步奔到骆滩簧跟前解围,并将邹子侃反手捆住,快步押回第四号笼子。他随即对两个指挥说:“一定是那个江北理发犯,说了一些什么告密的话,必须好好对付。”

过了两三天,邹子侃同志就被提出去严刑审问。当时傍晚就被绑赴监狱刑场,他就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万万岁!”英勇就义。

这以后杨成就转关到丙监大笼子里。我是四月间从甲监五号笼转关到丙监二号笼子。我大致记得过了几天即四月初,听说甲监一号笼又关来了一名新案犯,于是我就于放风时去了解一下情况,哪知竟是我的人团介绍人



傅玉成，心中便十分难过起来。经过先后两次放风谈话的机会，我就知道以下情况：我的人团介绍人傅玉成同志于两年前被捕后，从金华转押到杭州陆军监狱，被关在甲监一号笼子。他告诉我说：“自两年前分手后，他在杭州城内外和於潜老家参加党团的农村工作。以后他按中央‘八七’会议精神调到浙江兰溪去参加农民活动，并参加了农民暴动，为时不过一年。1929年关在金华监牢里。”他说：“这次转解到这里来自然凶多吉少，危险性很大。”在有一次谈话中还对我讲到：“现在专管政治犯案件的庭长何炳达，有一个胞弟名叫何××。在北伐初期有些进步表现，同他有过往来。”他并问：“我在目前的处境下，是否可以写个信给何××？”我想了一下之后说：“你不妨去个信，但要注意措辞适当，不要抱过大的希望。”接着我还对他说：“现在浙江省党部内有两派。一派是以沈定一为首的西山会议派，这一派主管案犯审问的事。另一派是C.C派。它们有统一的一面，又有互相矛盾的一面。你同时要注意到上述之间的斗争关系……。”

过了一段时间，傅玉成同志曾被传审一次回来后，他于放风时对我说：“我有英勇就义的准备。希望你以后如有出狱的可能，照顾一下我的家庭。”我心里感到难过！以后不久，他就英勇就义。

大概是4、5月间杨成关在丙监的大笼子，我5月中旬也从甲监三笼关到丙监大笼子，与杨成同志一起关在该大笼子的门旁，他趁放风之便告诉我说：“睡在他旁边的那位难友是军事犯，是四川人，素不相识。不过经过一个多月相处后，知道他已经三十多岁，有社会经验，特别是他参加‘红帮’帮会，是个有义气的人。不像参加‘青帮’帮会的人，大多是投靠社会上封建势力。他这次吃官司大概是得罪了‘青帮’的人。我们对这样的难友要多做工作。”还说，“我被捕前替党组织了一个互济会工作，有时也注意同红帮联系。”我当时也略知道一点“红帮”、“青帮”的一些区分，但当时比杨成同志差远了，我受到很大的教育。以后我就注意他们的谈话。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我已记不起他的姓名，我以后就称他为四川难友，记得有一次他对杨成讲道：“他的‘红帮’朋友中有的人同情共产党人，有的愿意为共产党人做点互济工作。”我觉得他是很讲义气的，杨成对他也做了一番工作。

这位四川难友几乎每周都有把兄弟来看他，给他买够几个人吃的四川



菜,这可能含有他对我们的好意。由于他有门路,有办法,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刑满出狱。临别前他还买了一些汗背心和短裤送给杨成做纪念,他说:“我在杭州西湖边交你们这两位朋友是很难得的,希望有机会我们外面再见面。”我们握手分别。

杨成特别是我留在丙监的时间都不长,我开始认识少数难友,我留到本章第二节再做回忆。下面我只说一下徐梅坤老前辈。徐梅坤是浙江萧山县人,与该县的大地主沈定一是同乡,他家境一般,沈则为献出家中田地而闹革命,不过后来跟了国民党反动派之一西山会议派,而徐老则一直跟着党直到被捕。我们都尊敬他。他对青年同志也尽先辈责任,常常鼓励我好好学习。

大概是6、7月间,我随杨成同志调回到甲监时,他关进三笼,我关进九笼。两年前,同住的嘉兴难友已经出狱,现在只记得苏中常同志已经从甲监大笼子关到九笼。在那时直接同笼约半年上下,他是浙江温州人,当地的有名才子书画家。他是1928年转押到陆军监狱来的,他以后改名苏渊雷。徐白民同志已经住在我的斜对过即五笼。同时我还记得有一位新难友名叫徐建三(狱中难友叫他阿三),出狱后改名徐迈进,上海、苏州一带口音,年龄比我大一点。

我记得当时我们大笼内的医疗条件有所改善,有个朝鲜籍的医生,年约四十多岁,汉语一般,由一个十二三岁小孩带着有限的西药,那是受监狱当局限制的,他只有到笼门前来看病和尽可能多同监狱当局多要一点最必要的药,有时他是带着病来为我们看病,我们是很感谢他的。有一位难友名叫王屏周,温州人,他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还在家乡为党接着奋斗,为党做了不少工作。不过,不久他就被捕入狱。由于他擅长中医,也懂西医,有时就为难友看病。朝鲜大夫很钦佩他的医术,很想让他出来帮一点忙,于是朝鲜大夫就向监狱长提出,王屏周同志认为如能出来帮忙加点班,在甲、乙、丙三监为难友看病也可使朝鲜大夫不会因体力不支而影响他的职业,而在可能的范围内防止骆滩簧克扣囚笼的医药费,主要是可借机沟通甲、丙各笼之间一些特别情报和工作。因此,我们有两个大夫,一个是朝鲜大夫,一个是温州大夫。

由于天气渐渐转热,觉得闷在笼里学“自修大学”头昏脑涨。各个笼就



分别向看守员提出：天气闷热，我们都觉得身体虚弱，头昏脑涨，是否能向监狱当局提出，我们三监在上锁的大铁门，开放各个笼门轮流到丙监走廊上走动；在各笼都打开的条件下，10 个小笼子的铁窗可以对流通一下风，经过几次要求骆滩簧才勉强答应。因此，秋老虎期间我们在乙监大铁门内过道上走动的机会也就多起来，学习和交谈的机会就多起来。我记起了在当时的的一件事情：

我当时已与上海一个公开的流通图书馆取得了通信关系，按它的规定，我存若干元钱在它那里，它代我购寄我喜欢学习的小册子，如果我指不出具体的书名也可请他帮助我代为购寄类似的书。有一天中午前后我正在甲监大铁门内走道上坐着看书，一个看守忽然在大铁门外叫：“李政你有三本书寄来，你来领取。”我接书后看守就转身离去。我一看书名，高兴得喜出望外，立即回到九笼就对苏中常等同志说：“这是三本宝书。第一本《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写的，不过是列宁的另一个名字：伊理奇。看守人员看到书名认为是讲国家主义的书。第二本书《小儿幼稚病》是关于左派幼稚病的书，但是看守员却认为这是治小儿病的医书，这两本是宝书。第三本书《经济与地理》，看守员认为是讲一般地理的书，其实是分析地中海和东西方地理的书，也是本好书。所以就送了进来，使我意外得到这三本好书。”在狱内我们读了又读，学了又学。一直在我们狱内传读。凡是预感到监狱当局要来查书时无论在哪个笼子里传读都会想方设法把它稳妥地隐藏下来。同时这也说明上海流通图书服务馆，是由进步人士组成的，有我们自己的人在巧妙工作，以后我就通过它来购寄一些有用的书。

## 第二节 1930 年 7、8 月间的苦难和斗争

在 6、7 月间，陆续关进来的难友是很多的，我们注意了解和去联络。下面我做如下回忆。杨成同志从甲监一笼的老难友那里得知：裘古怀老难友是从宁波监狱转押到杭州陆军监狱，就关在甲监一笼，并又相继了解到他的一些底细，杨成认为又多了一个依靠。于是，他就利用放风机会向我单独介绍，他对我说：“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义暴动后，裘就随叶挺部队向广州开进并任参谋长，在经潮汕一带时受到阻击，未能汇合。”杨成还对我说：“几个



月前在宁波被捕后解到杭州来的，他知道现在湘、鄂、赣一些地区工农红军的情形。他心境坦然，不计个人生死。”杨成最后还告诉我说，他已经把我1927年在武汉总政教导团受军训以及在九江如何跟不上贺龙、叶挺的部队，于是直返杭州加入共青团及被捕入狱和受到徐玮的莫大帮助都告诉了裘古怀，并说：“裘有意同你谈谈。”这时，杨成还告诉我丙监来了一个新难友名叫徐英，是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我党五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裘古怀也认识他。

以后我趁放风的机会与裘古怀同志见过几次面，他以大哥哥对小弟弟的方式来对我。他对我谈了一些事情：他说：“我也知道一些徐玮烈士的英勇事迹，你不要忘记了他的临终遗言——为先辈报仇。我到甲监后听说邹子侃同志曾设想争取一些好的军事犯难友搞越狱斗争，虽然他有不死的精神，但是按陆军监狱现在的情况，是不够。我看你们目前现实，斗争目标应该是再改善一下医疗和饭菜的标准，改善自学的环境，特别是秋老虎来到，能够争取每个礼拜早饭后甲、丙两监的难友轮流到瞭望台前跑半个小时的步，以免坐牢坐久了身体越坐越坏。这是顺理成章的，我听说去年东监特别反省院一位难友病逝，而进行相应的绝食斗争，提出合理的要求，其中就有一条要求到东监内的空地上去做体操和跑步，就曾得到监狱当局的一些采纳，这里的空间更好，为什么不可以呢？……。”

以上谈话情况我都记得并随时向杨成汇报，他听后都说谈得好。于是杨成设法与甲监、丙监有组织关系的同志商量，来实现做体操跑步的计划。

经过上述一段时间，我们甲、丙两监是各自分开，向看守员提出天气闷热，身体虚弱。大家都想早饭后分两次轮流到两个瞭望高台下做半个小时体操和跑步，请看守员向监狱长提出，经过几天，上面就批准同意。甲监一、三、五；丙监二、四、六列队分四次到两监北的石子路上跑步，每次约100人上下跑半个小时，开始是吃力的，后来就有了余力，因为我们是很认真锻炼的。看守员在旁也很称道。

我们大监做体操跑步的地方比特别反省院大得多。在甲、丙两监朝北的空地上有两个方形的瞭望高台；台南有个小铁门，来到开小铁门上三层台阶上的瞭望台顶，可望见西湖的游艇和西湖东北面的居民住户。在瞭望台南有一块大空地，可供近50人做八段锦的人做体操锻炼，同时，朝东西瞭望



台乙监体操锻炼同时,朝东西瞭望台的乙监东西牢房的铁门下各有一条石子铺起来的人行道可供跑步锻炼。甲、丙两监朝北各笼铁窗下也有一条人行道。因此,甲、丙两监的政治犯能在早饭后出笼,就各按规定时间到东瞭望台大水井旁的空地上集中。有的先在空地上做八段锦,有的先在铁窗下的石子路上,分两个纵队并排跑步锻炼,很有秩序。看守员在旁看着我们这样认真跑步锻炼身体,也就放心,暗中称好。有时我们暗中偶尔利用这个机会通知信息。我记得有一次,曾利用这个机会,来丙监朝北的铁窗前,为杨成向赵仰陀转告几句话。

有一天,我老家於潜县潜阳镇,一个姓徐的同乡(三四十岁),为弥补生活有时在镇内与别人一起私下代销一点鸦片,后被告发关到杭州陆军监狱。在这刑期间看守员认为他比较守法,并让他在看守厅和有时轮流到东西瞭望台朝南的笼门口打扫瞭望台三层楼房的清洁。有一次,他先告诉我:“你明天早上可抽出跑步的时间,我带你到东瞭望台三层楼上透透气,看望一下西湖。”因此,我有这个难得的机会向西北望见西湖的水面和偏北附近的空地上的一些居民房屋,他又对我说:“这西北较远的空地上就是杭徽公路松木场的发车地点。看后我回到笼子里又想起两年前我们的挖地道越狱的打算是多么不现实的幻想。”

### 第三节 1930年“八·二七”大屠杀及其余震

#### 一、“八·二七”大屠杀

大概到八月中旬末,有突然的变化。第一是甲、丙两监案情比较重的案犯都连连传审。虽然时间有长短,一般都不很长,甲、丙两监一共传审了有23人,狱内空气紧张。传审开始一二日后,就通知停止早上的跑步体操,我们当时虽然信息不灵通,但也能感觉到可能是狱外的大局势,比如蒋介石反对共军又遭挫折,要拿全国各地的政治犯来出气,我们狱内可敬可爱的老难友们就有这样的看法,但都非常镇定。

哪知来得那么快。第二天,即27号,我们狱外附近造币大工厂按惯例为呼醒厂内外的职工按时上班而大鸣笛声。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我们就被



看守厅里看守员的忙碌声而惊醒,我们知道将有大祸来临,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突然不安起来,不知是否今天上午就会发生事情。大概在8点钟后,我就望见看守员到甲、丙两监来提案犯交给军警绑赴刑场。我现在还能记得的情景是:丙监徐英同志,当看守员来提时他就纵身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万万岁!”甲监裘古怀同志走出一号笼门就向看守挥手,自己走向大铁门并高声大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万万岁!”这时甲、丙两监各笼里都齐声不断高喊以上口号,并唱起国际歌。看守厅里的看守员和军警都十分惊慌。大概到九十点时太阳已东升很高,看守员进到丙监,可能是三笼叫杨成出来。我望见他已经在笼门口英勇等待,并从容将上外衣和外裤脱下来交给同笼的难友,身上只穿着旧汗背心和旧短裤,连脚上穿的一双旧单鞋都留给同笼的难友,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万万岁!”光脚走出三笼,向九笼回头看一下,就昂首向甲监大铁门走去,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万万岁!”直向刑场走去。关在甲监的王屏周同志(我已记不清他关在哪个笼子),我已记不清他和杨成同志哪个先哪个后,但是他也早有英勇就义的准备,他为党光荣献身后,乙监各笼的军事犯难友都为失去这样一位好大夫而万分哀悼。

这场“八·二七”大屠杀当天夜晚和第二天拂晓,甲监和丙监各笼的全体难友们都在惊梦中发出震动的笼啸声,吓得全狱的看守及军警都惊慌起来。

我在本书前面第八章曾经提到,那位杭州口音的老看守员,对这次的大屠杀有以下感叹(我是从同他有来往的难友那里得知的):这次大屠杀人数这么多,刑场里的呼叫声和枪声这么长,小车桥附近一带的居民,因此而被引到监狱南边街道两旁来观看。他们看到运尸体的小木棺材,不断流出的点滴滴滴的鲜血,从车上流下来,除了有害怕的,还有气愤的话:“为什么要枪毙这许多人呢?”也有人说到:“他们之中有为保家卫国而被捕入狱的……。”我们狱内所蒙受的这一次大屠杀,经过小车桥附近居民一传十、十传百,杭州市不少居民都受到震惊。

对当年在这场大屠杀中而牺牲的同志我只记得有:杨成、裘古怀、徐英、王屏周等同志。

“八·二七”大屠杀夺走了我们一大批有宝贵革命经验和英勇胆量的老





大哥,我们幸存的一大群小弟弟失了依靠。我们以后,必须努力学习,以他们为榜样,更好地团结起来,谨慎地来进行狱内苦难斗争的活动。

### 二、大屠杀的余震

下面我在作大屠杀后4个月的回忆,大概是9月初的一天,看守员就将我和另一位难友袁人奎(浙江褚暨人,年纪比我大一二岁,也是甲监自发党小组的成员之一)一起从甲监各自的牢笼里提出来,并在看守厅铐上轻刑脚镣,关进乙监朝东的笼子,我们两笼都觉得很突然。我们关进乙监后所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不能把已经穿脏了的单薄裤子,脱到脚镣外来和换上干净的裤子。要脱下或换上单裤子就更难(要换上棉裤就只有把棉裤档全部拆开),幸亏乙监的军事犯都有熟练的办法把单的裤子换下来。同我们两个笼的一位难友,有点知道我们的困难,用他的办法,教会我们把脏了的裤子越过镣铐的阻碍把裤子脱下。我们教狱内的军事犯认字,我们成了朋友。这时我的救命母亲来监狱探监,看到我带着镣铐十分难过地对我说:“坐牢就要耐心点。”我说:“妈妈,我是这样做的,我相信不久我会好的,请家人宽心。”稍后骆滩簧得知我们两个都与同笼的军事犯交上朋友的情形,觉察到把甲、丙两监的政治犯关到乙监是害多利少。稍后,就有看守员把我们从乙监带去摘掉镣铐,又把我们关回到各自的笼子里,我仍就关回到甲监九笼。

回到九笼后,那个同情两年多前曹仲兰英勇就义的杭州口音的老看守,私下对另一个笼子里的政治犯说:传说‘八·二七’大屠杀前传审的政治犯,原不止二十多人而有四十多人,现在又听说再传审一些政治犯,并提到原先的名单中有我的名字。他要对方不要告诉我,这个传说同我和袁人奎同时关到乙监不无关系。不过我现已经拆掉镣铐,回到九笼。因此,我现在做了双重准备。一是做一些后事准备,二是上述传说也可能是监狱中放出一点风,防止政治犯再搞什么乱子,所以我在年底前一面在九笼里花时间多读点书;一面把一些难友们不常看的书交给我的四弟丁士进带回去学习,另外我又写了几封有联系的秘密的信,叫狱中每周为案犯买东西的工友带出,我一面真诚地送他一点钱,他也不定期对我帮忙。我记得在信中对四弟曾讲道:我在狱中已经三年多没有宣判刑期,何时是否出狱都是难以确定的。因此我是在思想上有两种想法,一是做后事的对待,二是监狱把上述传说作为一



种机动的手段来压制政治犯搞什么所谓“不轨”的行动。我希望他要好好孝敬父母,同时我又先后写了几封前后有联系的长信,叫他懂得一些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其中举例讲到:父亲早年在杭州法政学堂毕业后,不能考中县长,只好回家当个劝学所长,收入很有限。丁家四房奶奶抱了一个孙子名叫小狗,怕我生父要分他的家财,所以他常放出谣言,说他要在半路上打我的父亲,父亲就很防备他的小狗侄儿不讲理……。我用以上事例帮助四弟懂得家产和薪水的收入多少的经济基础,是决定社会上层建筑关系的作用等道理。但是1934年我出狱后我曾问过我的四弟有没有把我的这封长信保留下来,他说:“我先是把它珍藏起来做纪念,后又怕久藏有不便就把它毁掉了。”我这封信自然是写得很浅薄的,但如能留下总不失为一个纪念。

在上述后几个月内,我们除一方面做英勇就义的精神准备和有空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外,同时也尽可能争取多保留一点狱内原先放风、治病的条件,暂不再提到东西瞭望台去跑步的要求。

这期间,由于我们不易私下买进外面的报纸,不了解外面政治形势,我们很难推猜上述余震将有什么变化。

大概过了几天,即1931年1月初,甲监一笼关进一个新案犯名叫“王×”(后来我知道他原名叫张崇文,以下我就用原名相称)。我利用放风的机会从该笼老难友那里得知他是浙江临海人,留俄回国的,因叛徒告密而被捕。以后我从老难友那里得知他有个习惯即:盘腿坐在地板上与难友谈谈话。在我已与张崇文成为相熟悉的常来往的难友时,我曾向他表示,狱内有些老难友常学习进步书刊,并非就是“明日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听后就向我说:“你向同笼难友随便谈话时曾讲到关在铁窗下,多学习一点进步书刊是很好的,不过同时也应该注意争取改善狱中生活条件……。否则,就有不顾目前实际的片面性。”我接着就说:“我可能有误解之处,我现在明白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后来,他同我们谈到,有些难友学习笔记,是否也可试编一个不定期的、短小的刊物,互相交流一下心得和难题……。后来,就在他的指引下以一笼为集稿点。出版了时间不定、数量不定的刊物,取名《洋铁碗》。大概出了近十几期,当时我读了觉得很有益。

我把他作为杨成看待,大概到2、3月间他就转关到东监去了,这时的东



监已有另造的一个新东监与老东监的区分,我一直不知道,所以,也不知道崇文同志是关到老东监或新东监。在我的这本书中是无须做以上区分的。

#### 第四节 大屠杀余震的转化形式 ——特别法庭对处理政治犯采用两个新手段

我前面所说的两个问题,随着钱西樵派他的两个部下前来陆军监狱做表现,我们渐渐明白其中的疑难。下面我来说明。

1931年春,一天的上午,大监看守厅突然来了一位海盐口音的法官,带着七八位手持长枪的军警向甲、丙两监训话。我记得的大致情况如下:

有七八位持枪的军警守在看守厅里,看守员从甲、丙两监提出20多名案犯。看守员退出后,法官就走进看守厅的一张大方桌子旁朝北坐下,这20多名案犯分前后两排面朝法官站着(这种场面是甲、丙两监大笼子里的政治犯从笼门的小窗口望见的)。我是其中之一,同时我发现徐梅君、鲍悲国老难友在内。我当时弄不清他们是关在大监的哪个牢笼。

然后站在两旁的军警就把守着甲、丙两监的大铁门,看守员打开大铁门走进甲、丙两笼的过道上,要各笼的政治犯都分列站在各自的笼门前,通知他们静默恭听法官的训话,然后就退出铁门。

这样安排好之后,那位法官口操海盐口音,说话的调子类似骆驼簧。他先吩咐持枪的军警,让前排的案犯立即下跪。下面是那位海盐法官所讲的,我现在还有印象:1、从去年八月你们这种对中华民国犯了大罪的案犯受到应有的严刑处分之后,你们受到教训,有些人略知应该遵守监狱法规,不过有些人执迷不改,特别是近两个月来又常常胡说过年时节的饭菜比平时差,克扣囚粮而改善伙食。2、他又胡说:你们现在又借口放风时间缩短了没有做操跑步来锻炼身体的机会,而在搞各自的勾当,而无视蔑视去年8月所皆遇的教训。明白说,特别法庭和监狱当局是要严格执行他们的责任,所以,今天我特地前来向你们做个警告。接着他大声说罢后,就向等在旁边的看守员和军警示意,上前一步勒令跪在前排的人脱开上衣的一个衫袖,并轮流用皮鞭打他们的肩膀,有的轻些打出一条又一条的红伤痕,打重的就流出点点血迹。这时我看见徐梅君、鲍悲国他们的身上打出了点点血迹,虽然如



此,他们都跪着不动。我们站在后排的难友无不心中痛恨和难受。这时那个海盐法官大声说:“你们站在后排的犯人如不下跪为他们求情,我就下令军警把他们其中的几个拉出去绑赴刑场枪毙。”我们当时明知不可能这样下令,但是如果我们当时不下跪对方就有难以收场之难,以后就会有其他形式的报复,所以我们后排就不约而同地为前排下跪,站在甲乙两监的难友自然心里非常难过。当看守员让他们回到自己的笼子时。他们就用响亮的脚步声,回到各自的笼子。于是,当天上午海盐法官就这样结束了他所演的这场闹剧。

然后,甲、丙两监的难友虽然没有出声,但心中都是很愤恨,都用脚步声来发泄。

大概过了两个月即五月间,甲监过道上七八个看守员带着好几包小册子陪着一位官员,先到甲监向各笼子里的政治犯大声宣布:“我今天到这里来,是为了向你们分送一本《剧中人语》,希望你们能好好阅读这位剧中人,原来是受了朱、毛的思想毒害干了不少反革命勾当,后来经过管教得到改邪归正的效果,并写了一本小册子。今将他题为《剧中人语》,供给受害人学习。”以上是我还时常记得的甲监九笼的记忆。

当时传话人大声说完后,看守员就向甲监各个笼子发五本书,就冷冰冰地退出。

然后,他们又到丙监去表演了一番。

稍后几天,我通过放风的机会得悉甲、丙两监各笼的难友都看了一下就搁在一边,有的还把小册子撕碎丢进马桶里。

我接触特别法庭派员前来大监做两次特别表演之后,才有一些根据来分析前面第四节提到的“八·二七”大屠杀余震问题。下面我分三点来分析:

1、我在本章前面第三节中,曾讲到“八·二七”大屠杀枪决了21个案犯,另还暂时留下一部分人,做第二次大屠杀的对象,以备国民党反动派必要时做报复之用。那么这个大屠杀余震为什么又拖拖延延呢,这是我在这里要顺带先补充分析一下的问题。

我在第三节曾提到陆军监狱的那位操杭州口音的老看守员曾在“八·二七”大屠杀的第二天,我们曾间接了解到:小车桥附近的一些观看从狱中



刑场运出尸体的惨状居民说了：“为什么要杀害这许多人呢？他们之中还有的人曾经保家卫国。”这些话自然是一传十，十传百，影响了附近的居民（详见本章第四节）。

特别是1931年1月前后，日寇强占东北的黑龙江和吉林为他们的殖民地，蒋介石毫无抵抗的表示。这是全国各大省市居民都有所闻的事情。

在以上实际情况面前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准备再用大屠杀的罪恶手段来对付监狱内坚强不屈革命的政治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有所迟疑，弯弯曲曲地来进行。这是上述“八·二七”大屠杀的余震拖到1931年3月，又专派一位法官到看守厅里来做那场危险性的训话形势的原因。

2、到1931年5月间，特别法庭又派一位官员到陆军监狱给甲、丙两监各笼在押的政治犯分发一本由一个叛徒所写的《剧中人语》的文章，希望大家阅读，即劝告大家也以他为榜样。

特别法庭的这各种做法很明显地反映出，除了运用威逼和屠杀的手段来管教和处理在押的政治犯外，同时还要运用利诱和劝降的手段来对付我们。这使我又记起一年半前，杨成同志对我个人所讲的那段话（见本章第一节），实际上也已涉及到这个新手段问题。因此，我认为特别法庭为推行这个新手段，还有可能另外派特工人员冒充政治犯到狱内做内应，这是我们日后应最注意的事。

3、另外“八·二七”大屠杀后，对于我们狱内幸存的少数互相深知的同志之间，还有狱内自发党小组关系（我是其中成员之一），我们鉴于上述新情况，都同意取消上述党小组关系，以免多生枝节，如果有什么大问题，我们以个人名义串通联系。

## 第五节 特别法庭频繁更换政治犯关押场所的措施

监狱当局为什么要采取上述措施，它们自然是保密的，但是我们也能推知一些内情。例如：（一）对某些老政治犯的牢笼调换，使他们不能自由保持联络方法。（二）便于特别法庭暗派坏人冒充新被捕的政治案犯。下面我按自己被随同调换的过程和所接触到的情况，分两段来做回忆。



## 第一段回顾

我记得,我先是关在丙监朝南的第四号笼子,一个年岁相近,名字大概叫潘阿四的宁波口音的知识分子,这是我在乙监印象较深的第一个新难友。家有财产,在上海求学时受革命影响,为争取参加共青团,为便于劳共解放工作(潘阿四是他的化名)在上海租界里当黄包车夫。我听了他这段身世,我觉得他是个纯洁的青年学生,有革命精神,可以交朋友,我很敬佩他的革命精神。

隔了一段时间,丙监另一个笼子里的难友来看潘阿四,我是经潘的介绍才相互认识知道他叫陈庆亨,他说:“阿四对我说,你在甲监时一有时间就学习政治经济学,我也喜欢,你现在关在丙监我要向你请教。”我说:“不敢当,我主要只学了一下日本河上肇先生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译文,还有许多不懂的地方。”接着他又说:“阿四也欢喜学,特别是资本家剥削理论的问题。”

他还着重讲到:“丙监某笼有一个叫邵林书的难友,是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文化人士。他讲到我国反帝反封建,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我觉得很不好懂。”他的这句话引起了我很大的重视。我说:“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听来别扭,如有方便,请你为我向他介绍,以后使我能多向他请教几次。”

再者,我前面从陈庆亨难友那里得知好些疑难的问题。所以,我第一次利用放风机会,到印象较深的第三位难友邵林书笼子里去访问,预先做了一些准备。例如,开始请教问题外还能大致了解他的为人态度,我以小弟弟的态度(因为他比我大好几岁)向他说:“新难友陈庆亨说,你留学归来在杭州同人合股开一个名叫我们的书店小店铺,所卖的书绝大多数都是别的书店都经营的书,据说,你是因此而被捕的,是否出售的书中还另有违禁的政治书集……。”他听后就告诉我说:“没有什么违禁的书,即使有几本也是一般书店的常事,通知我们,以后不卖就是了。”有的难友说:“我们的店铺取名我们的书店,书店股东里你是从苏联回国的,这应该容易引起误会。这真是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听后就以小弟弟的态度向他表示:“我们对眼前的环境都得暂时忍耐把日子度过去。”



我又问到：“你所说的，我国反帝反封建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我觉得听来别扭，我今天主要是请你先开始做一个概括的容易懂一些的解释，以后我再边学边请教。”我下面就把当时得到的启蒙知识叙述如下：

1、他向我指出，我国当前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资产阶级性的，是按这两方面的革命斗争所进行的，按社会发展阶段来说的，而不是指以上两大斗争的革命领导权必须掌握在什么社会阶级手中。对上述区分，我们必须划分清楚，按广大工、农、商、学、兵真正得到解放利益来说，上述革命领导权都必须掌握在上述阶级真正进步的人士手中，而绝不能流入大资产阶级和投靠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同封建大中地主阶级势力同流合污的人手中。

2、我当时听了邵林书难友以上分析的要点，虽然觉得容易理解一些，但限于自己的认识水平，还要以后有空时再向他请教一些有关的具体问题（附注：对上述问题我是到出狱后，于1935年接触到“统一战线，是我党的一个大法宝”的指示精神，和1941年看到毛主席所写《新民主主义论》之后，我方有较进一步的认识）。

以后在杭州陆军监狱牢笼里，邵林书同志又向我讲道：“他在留俄期间看到波格达诺夫分析从古代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的经济演变及其社会上层建筑关系的书，觉得比较通俗易懂。”他并告诉我，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注意到这本书，他说，它可以当做教科书来使用，虽然它含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影响（当时邵是讲清楚这个人名字的，我现在已记不起并难以查明）。邵对我说：“波格达诺夫这本书大概在杭州不难买到。”随后，我们设法买到了他的一本近200页（可能是节译本）的书，进行了反复学习（附注：以后我同邵林书先后出狱，他改名崔晓立，有值得怀念的事情留到本书后面再做回忆）。

## 第二段回顾

大概是1931年11月间，看守员又把我从丙监关回到甲监。先是关在朝南的三笼或四笼（现已记不清了），这期间我接触到了以下情况：

一、在一次放风的时候，我望见一个身穿黄呢军大衣的军官，与另一个牢笼的在押案犯谈话。我不知他们谈什么。过了若干天，我了解到这个军官，



是不久前被关进丙监的新案犯,名叫李友邦,他是台湾(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居民,爱国而到广东,是黄埔军政学校的第四期毕业生(他被捕入狱后,从同笼难友那里得知“八·二七”大屠杀的情况之后,有非常同情的表现)。我当时不知他是因何而被捕的,大概过了一段时间,他就被保释出狱。我也不知其经过。我当时觉得他是一位可交的有爱国热情的人士。

二、这次调回甲监后,我才会见到徐梅君、鲍悲国两位老难友。由于当时与过去的环境不同,我们不易多交谈,不能常往来,我只能简要表示问候,可能有坏人在暗中注意我们的行动。

三、现在狱内的小环境是相当平静的,可借机学习;同时,我认为应调整一些学习的方法。例如:学习的对象仍是进步书刊,对其中如《国家与革命》、《小儿幼稚病》等书刊做更严格秘密的阅读;对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大纲》仍进行学习,但都不采取特别反省院时期那种有组织和作报告的形式。总的说,我们这个期间的学习时间是较多的,得到的学习成果也是多的。

另外,从这时起,我们个人又自动地有以下文化活动,如:范船僧老难友能写很漂亮的毛笔字,他原先就已经为少数看守员写有关年节的小对联。一面为消磨时间,一面也顺带做点工作,起点疏通作用;又如苏中常老难友,精通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有时向难友谈这方面的知识;又如,有一个永康县教书先生(现在已记不起他的姓名),他很喜欢学习天文知识,就在笼子里铁窗下的那块窗板上,依据日、月光度的变化,利用一个两根细木条架起一个有固定角度的斜十字架。在早、中、晚大致固定的时间,细心地观测经过那个斜十字架反映在木板上的十字影子的变化角度,凭他的经验把它一一记录下来,并根据这个记录和天文学的有关原理来推断晴、雨、风力、气温的变化。当时我们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

四、1932年3月间,徐梅君、鲍悲国、徐天仁等老难友,分批由看守从他们各自的牢笼里提出来转押到东监。这时,我已关押在五笼,看见他们先后去了东监,感到越来越感到孤单,心中很难过。

五、和我关在一直起的阿三老难友的三件事:(一)我家每周都送点咸鱼或咸鲞为我改善生活。我们当时都实行“共产主义”。大家一起吃,因为笼内生活非常艰苦,嘴馋。他因为咸鱼已吃完,饭还有大半碗,于是,他又把小





## 往事回忆

---

桌上的咸鱼骨头放进口里静静再啃，把饭吃光。我们都有这样的习惯。

(二)由阿三设计出的一种保密办法：在押的案犯要写什么书信，都要到看守厅里去写，所以笼子里是不准有笔墨的。阿三设计出一种秘密保存墨水的方法：先让一个难友用小长方形单面涂黑玻璃镜，从甲监小窗口望见看守员要走进甲监大铁门来，就打个招呼，轻轻咳嗽一声。另外要一个难友坐在一个小板凳上靠在左墙。他在左墙角下，拿着一小瓶蓝墨水，踩上难友的肩膀上就能举手把蓝墨水瓶放在墙上连接房顶的小方木旁边(必要时我们也可用这个方法传递秘密书刊，抛进隔壁的笼子)。(三)记得1932年5月间，特别法庭和监狱当局调动一批在押政治犯，解往苏州和南京监狱。阿三老友探知他是其中之一(当时他完全不知道将被转到东监去关押)，于是，我们就在笼内再次交心谈话。提到我们以后如果出狱，互相打听消息取得联系，接着为革命工作(附记：这次从杭州解到苏州监狱的老难友中，有一位在囚车快要开到苏州站前，他就不顾生死跳车逃跑，这件事我是40年后得悉的)。



## 第十一章 从一种形式的牢房转移到另一种形式的牢房

大概是1932年5月下旬,我从甲监五号笼子转移到六号笼子。大概在6月初,看守把我从五笼转到六笼,全笼连我有七八个人。其中,有三位互相深知的老难友,一位叫老孙子(姓孙,以邮递员为掩护为党做重要工作,我们在狱中就称他为老孙子),另外两位是童桂芳、江天宁。利用放风机会我向三位老友说明我受审问时的情况,他们也向我说明另几位同笼人的情况,其中没有可疑的人。以后,我们在六笼都各自努力做相应的学习,有时也交谈交谈。

### 第一节 特别法庭传审一批老政治案犯

特别法庭把20多名政治犯陆续分批传审,老政治案犯到狱外常设的法庭里传审。我是第三天被传去审问的。我已先从被传审的老难友那里得知:这次被传审的案犯是由两名军警带领,乘坐运货小汽车到不远的法庭,审问的时间不很长,传审的内容都是法庭已知的主要案犯的案件。这次审问与“八·二七”大屠杀前的传审的形式大不相同。

同时,我也注意思考:例如,如果法官审问我,他已经知道而又属于一般性的问题,我也可以做些应付,如果是有害于党和其他同志,我就坚决否定……。

我被审问的那一天,就同几位难友同乘运货小汽车,到常设的法庭,审问的时间不很长。他问:“你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吗?”我答:“担任过。”“你是杭州市二区区委委员吗?”我说:“是。”“你知道秦明是谁的代号吗?”我答:“他是杭州市团委机关的代称,我一直没有使用过。”“你在特别反省院参加过什么斗争?”我说:“我参加过鲍照光在狱中去世后,请求法院宣叛刑期的



绝食斗争。”随后,法官要我在审问记录上签名。我要求让我先看一下记录,法官同意,我就签了名。

我退出法庭,回到庭外那个候审室外的小屋子里坐下休息时,我觉得我对法官那四个提问所做的极简明的答复,对组织和老难友不会造成危害。

我和被审问的其他难友,乘运货的小汽车回到牢房后,我就将传审的情况告诉了三位互相深知的老难友。以后,我就一面安心努力学习,一面等特别法庭对我的处理。

## 第二节 从陆军监狱转到吉祥巷反省院

大概是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看守员来告诉我把卧具和不穿的衣服都捆扎在一起,随其他政治犯转到别处去,第二天一早交给他。我第二天一早就准备好,不过我加进了一本英文辞典和英语语法书。次日早饭后,看守员就把我带到大监、东监之间的一块空地上坐下听候传唤。我是从甲监被传出的,我看见:徐梅君、鲍悲国、苏中常、范船僧、袁人奎等老难友,共约20多人。

略等片刻,就有一个特别法庭工作人员对我们说:“今天,我们就派几名军警带领你们徒步到吉祥巷反省院去报到,你们要遵守纪律。”于是,我们明白这次转移的目的地。我被排在队伍的前面。我们同行的20多位难友,极大多数都已坐牢3年以上或近5年,特别是两腿的活动力已很下降,只能慢慢地向东偏南的方向走。同时,也很想趁这次步行的机会,沿路顺便看看狱外的新面貌。我边走边想时,曾向前面的一位军警透露我的心意。他说:“我了解,你们要遵守秩序。”

我知道我们今天要经过几个闹市区和商业区,它们前后交叉,大概要慢慢走很长的时间。我们首先要步行经过热闹的商业区(现名解放路),我细细观察、比较,虽有几幢新建较高的大楼和有一批刷新的店屋,但是占极大多数的中、小商店还是老样子。

随后,我们沿着东南方向,交替经过一些闹市区和居民住宅的小街道。在经过居民住宿和小街道时的印象也同以上相差不多,有些还变差了一点。至于,我们经过的居民区的街道也有比较宽的,来往的黄包车不很多。我们



因为不断步行,就向军警请求,暂时休息一会儿,他也同意在路旁休息一会儿。我就注意观察,觉得居民的房屋同四五年前差不多,除了新建几幢高楼外,其他的房屋就更旧了。

最后,走了一阵之后,带路的军警在一个朝南的大石门前停下来。对我们说:“目的地到了,你们站着等一下,我进去联络。”下面我分两个时期来记述院内的学习活动。

#### 一、第一时期的学习(1932年8月—12月)

那位带队的军警不久就从反省院内出来,到大石门外对他的同行说:“我先带李政、袁人奎、徐梅君进去,稍后,你们再带其他的案犯分批进入大石门。”说完他们就行动。当那个带队的军警把我们带进朝南的大石门内,我就看见一条水泥制的通道,长约5丈,宽约2丈。两旁都有居民住屋式的旧木房子。我没有工夫去猜测它们是做什么用的,但我知道不是牢房。这条通道的尽头是个铁门。我们被带进铁门后,就看见有一块空地。它的北面是一座民房式的楼房,共分三间。我们三个就被带进楼上,与等在那里的管理员相见。徐梅君分配在一号房间,我们两人分配到第二号房间(这号房间比一、三两号房间大一些)。送我们上楼的那位军警交代说:“你们的行李已经放在房间里。”说完他就下楼去了。接着,管理员就把门锁上,又告诉我们说:“房内有间小马桶,你们吃饭的地方就在楼下教室外旁边的小长方形餐桌上,到时会有人来照顾你们一下,我住在三号房间对过的小屋内,有事同我联系。”(以下我就简称这栋楼房为第一栋楼房)

随后,我们就各自打开行李安置铺位,我的铺位在二号房间的左手方面,袁人奎的铺位在二号房间的右手方面。徐梅君的铺位安在一号房间的右手方面。我和徐梅君的铺位只相隔一层木板,必要时,可以隔着一层木板低声讲话。

按反省院的规定,每逢星期一一般要开一个总理纪念周例会,有事开会时间就长一点,事少开会时间就短一点,如另外有特别事情就暂时停一次。我们三人是到了反省院若干天后,连着两、三次参加纪念周例会,通过这两次纪念周例会得知以下情况:我们开例会必须要穿过一间平房的小过道到大礼堂,我们看见主席台很庄严、很高大(朝南),大概可容七八十人开会。



我注意到苏中常是从朝北的小铁门内出来的,从他那里得知,院内常称它为“花园房子”(我以下称它为第三栋房子)。另外我注意到范船僧是从南面的小铁门内出来的。我从他那里得知:门内有一栋楼房,也是关政治犯的(以下称为第二栋楼房)。

此外我还知道,我到会场所通过的那座平房的通道,它的一端是个临时的专门工作室,另一端靠着我们的住屋,是专门供两三个办事员工作用(以下称之为第四栋房屋)。另外那个临时专门工作室对过有个临时棚子,里面摆着一张长方形桌子,是供反省人外面的亲朋前来,探望反省人和相互谈话之用。

这里我顺带说一下:我到反省院后,曾写信给我的父亲和救命妈妈,告诉他们这里的住宿和伙食都比特别法庭好,这里离法院路远,要花很多时间,家中绝不要再送什么吃的东西给我;我会自己管好身体,如果万一有事我会写信给四弟。

在这之后,是我五年多来最平静的日子。虽然我没有在大水井旁洗洗衣服,抹抹澡,在旁边的空地上做操锻炼的机会,但是,我可在比较宽敞的房间学习和锻炼身体。当然,我们三人被转关到现在的两个房间里,不是含有被优待而是含有被特别注意的意思,不过我们暂时把它放在一边。

在最初的一个月,就我个人来说,是温习英语语法,打打八段锦。同时,我还打听反省院内有无小图书室。反省院内的学习有两类,一是反省院规定的学习课程,二是反省人有空时,可自己增添自学课程。

大概9月份,反省院通知要在楼下教室里接着进行国语教育课程。国文老师,杭州人,40岁上下,据说是很有学问的,对《古文观止》这本名著有研究,他讲的都是《古文观止》之中的内容,根据他的研究而讲。他每周只上四个上午课,每次一两个小时,中间休息一会儿。他在讲课时,偶尔也问学生对他所讲的内容有何感想。所以,我在听课时都十分聚精会神。为此,我还请家中四弟买了一本《古文观止》以便对他所讲的古文来进行阅读。

国文老师在课程中也间或有时自己出题目(如无时间也可不写),有时要学生自己出题。我记得,有一天(大概是10月间)国文老师出了一个题目——《观潮记》,由于我没有到钱塘江边海盐观潮台上欣赏过潮水如何涨落的经历,就单凭一般的传说写了一篇短文描写之江潮:一步步提高直到之



江潮高潮来到时如何汹涌澎湃的奇景。老师还在课堂上做了一些表扬。

国文课程当然接着进行,因为情况差不多,我就不再做记述。我记得,这以后不久,袁人奎老难友就调离第二号房间,有可能是调到第三栋房屋里去。

我们楼下教室所宣布的课程,除上述已开课的国文课程外,另一个课程是国民党党课。大概在10月开课,在我记述和回忆这项课程之前要先说一下,我已知的反省院的两个领导人员的情况:一个名陈膺,是总务主任(即秘书长的意思),是西山会议派,有点中国现代文化知识,经常住在院内。在出席星期一总理纪念周大会上时常要讲到仁义理智信的伦理;另一个名叫赵见微,是初任的副院长兼代理院长,不常来院,我没有见到过,据说是C. C派的,他在参加纪念周例会时常大骂共产党;至于担任党史课的老师,在他来上课前我们只听说他叫牟震西,有学问,北京发生五四运动时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是浙江临海县人,同赵见微有同乡关系。

11月初旬,牟震西前来楼下教室开始教党史课程。他说:有别的事务在身,临时拖延了一点时间,今天才来讲课。每周只能前来讲二三次课,我觉得他讲得相当简单明了,态度比较温和,有师长态度。经过一个多月的讲课,我觉得他的教学风格是比较民主的,他对他所教的内容是经过考虑的,讲得简单而有条理。

在12月份内,牟震西先生教课的内容,都是关于《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部分。做了一些讲解之后,就把重点转到(何时我已记不清这个具体时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陈立夫所提出的“唯神论”观点上来(附记:当时社会上已知他是陈果夫的胞弟,其兄为支持胞弟在国内政界早露头角,也表示赞成“唯神论”的说法,能对“三民主义”起补充宣传的作用。这以后不久,陈果夫和陈立夫成为国民党内的“二陈”派——即C. C派)。他的“唯神论”观点基本参照《民生主义》,同时,也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提出对“唯神论”几点意见,主要是提出他不相同的看法,至于当时他怎样说的,我现在已记不清了。

在上述几堂讲课快结束前,牟震西先生提出一个接着学习的方法,即假定同意“唯神论”的人(不是代表他的观点)在班上发言,另外,假定另一位同学(不是代表他的观点)不赞成“唯神论”的人,在班上发言,然后全班同学



在听了以上两位假定发言人的说法，认为哪一方的假定发言的理由比较充分，哪一方的比较不充分。牟震西先生采用上述的方法。接着，以本课堂的学习为理由，问大家是否赞成，他得到的答复是，课堂上有不少同学说可以试一试。于是他就指定苏中常作为前一种假定观点的代表；徐梅君为后一种假定观点的代表。各用几天时间，做各自的假定发言准备。然后于下一个星期来做各自的假定发言，并问他们两位有何意见，他们两位都表示可按牟震西先生指示做可能的准备。然后，他说：“你们要仔细听，听完后，我要先请赞成第一个观点的同学举手，后请赞成第二观点的同学举手。”于是，大家就等待这个发言。

那天的上午8：30时，楼下就坐满了人，两位假设发言人先后发言。苏中常先发言，发言和休息共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接着由徐梅君发言，也用了大约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由牟震西先生统计，结果赞成第一个观点的占少数，赞成第二个观点的占多数。全场都热烈鼓掌。最后，牟震西先生对大家说：“今天这样的教学方法，我们在今后的党课教学过程中，有必要时，也可接着使用。”

我记得在进行上述党课教育期间，袁人奎难友从楼上第二号房间调到第三栋房屋去了，不过他仍继续前来听党课，以后，我关到第二栋楼房时就没有和他在大会堂见过面。他有可能是第一期反省后就被保释出院。

## 二、第二时期的学习(1933年1月—8月)

大概是1933年1月初，一天早餐后，住在对面的屋里的管理员对我和徐梅君说：“你们整理一下被服，我带你们到南面屋子里去住。”没费多少时间，我们就到第二栋房间里。我们两个关进后，共计有10人被关。当时我很熟悉的，有范船僧老难友，另一位难友名叫汤剑豪，江苏南通人。大概是在1930年上半年在陆军监狱大监认识的。随后，我就得知老难友朱深是关在我们的楼上，关在我们这栋楼里面的难友，每日的三餐是到外面大厅去吃。

按我所接触到的学习来说，有了相当大的变化。除了每周一的总理纪念周例会活动不重复再说外，每周国文课的时间有时减少，另增加了会计补习课程和农村信贷等课程，教课水平比国文课程低，每天上课的时间比较少。党课因教师有事，暂时停了一阵。这些课程的教室都相继改到大会议



室外来进行。这期间我记得其中有一人名叫赵元任，他是北京大学的一个有名的教授，专门研究汉语（当时，常被称为国语，以北京话为代表），他对汉语和拼音法有很专门的研究，被反省院重金请来。因为，当时各大城市的上层社会为便于对外来往，渐渐需要雇佣能讲官话的人员来工作，所以反省院在1933年2、3月间临时重金请他来讲几天课。我对这一个课程是专心、认真听到底的。

与此同时，我注意到与我同房间一位新难友，大概名叫陈春林（因年久我记不清），也在注意听上述课程。我们回到住屋后（他的床位正在房门旁边）我就顺便问他：“你很喜欢这个课程吗？”他说：“我很注意听，我现在正在开始自学杨炳勋速记法。当然不是因为拼音法才开始学速记的。”

我听了他这段话之后，就顺便向他借阅杨炳勋速记法的书，我仔细看完后就立即交还给他。

我经过仔细考虑后，觉得杨炳勋的速记法是不难学会的；基本学会后，即在目前的自学中也有些用途，我随即写信给我四弟，要他赶紧买一本来，学习这个速记法所必须专用的分上、中、下三小行的速记本子（大、小与练习本子相同）十本，价钱都不贵。收到四弟送来的东西之后，每日除了生活上的必须时间外，就单注意学习速记达2个月。总起来说，我用速记符号在速记本上每分钟记下100到120个字。比我同室的学友还快一点。

这里，我大力学习速记法，是因为它是一种新的学习手段，如果自己能有出狱的机会，可以多有一点自力谋生的手段。现在学到这种程度，自然要注意练习，不要把它忘掉，以便以后利用，可在以后再进一步学习。所以我这时又想到那被耽搁下来的自学课题（古希腊哲学通俗的小册子）。这以后，我又回头向院内小图书室去借来希腊三哲小册子作为自学的一个重点。

在这期间，我记得，我们的大房间里那个睡在我床位旁边姓钱（名字我记不清了，因为他一只眼睛瞎了，所以大家都叫他独眼龙）的难友，已批准保释出院。随后，隔了一两天，还关在东监的徐天仁就转过来，住在独眼龙的位置上。我就又多了一位知心的难友。

大概是三四月间，反省院当局安排下一堂大课程，那就是请来一位留俄的和知道集体农庄建设等情况的专家，来系统地专讲上述课题。反省院要求大家都来听课。我第一次去听讲后，大致了解：这位老师是一位大麻子，





河南口音, 年约 30 多岁(因为我已记不起他的姓名, 以下就称他为大麻子教师), 他是很受院方重视的人物。其原因是这位大麻子教师坚决反对斯大林, 因为他在第一天的登台演讲中, 就连连批评斯大林在 30 年代初的集体农庄改革中, 遭到农民大批杀牛和毁农具等等的反对, 说托洛斯基的看法是对的……。他以后连续在课堂演说, 大多是围绕上述说法而展开的。

大麻子教师大概是被反省院当局优待, 每次登台演说, 院方都专门派一个人帮他做记录, 不久, 院方因我和陈春林学习速记, 已能勉强记述, 要我们轮流速记, 陈春林就代表我们两人说: “我们的速记术刚学会。只能供参考, 要院内的记录加以统一。”我记得这位难友是在六七月就保释出狱。

大概是五六月间, 反省院当局又请一位名叫易飞的专家, 前来反省院做一次课堂演说。反省院当局对这一次的演讲的招待非常非常隆重, 在他来做演讲的早餐后, 反省院大会厅已清扫得一干二净, 听讲的座位已临时增加了两排。在开始演讲前的半小时, 全院反省人都会被指定坐在前两排之后的位子上等候着。然后, 有一批被邀请的外单位工作人员来到主席台下的前两排就座。接着有三四位被邀请的贵宾坐在主席台的两旁。最后, 由院内一位负责人(大概就是总务主任)陪同易飞专家上主席台。这时那三四位贵宾还起立表示相迎。这时, 我立即看清这位前来演讲的专家, 年约二十七八岁, 人有机灵的架势。经宣布演讲会开始, 他就立即站起来用相当爽朗的声音开门见山说: “当年上海‘五卅’运动开始时, 我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的检字工人, 参加工会和革命工作。因为同情纺织女工顾正红在请愿游行中被乱枪伤命, 我就立即参加更大的游行队伍, 起了积极作用, 随即就被上海 C. Y 组织提拔和使用。以后又为党团组织不断努力奔走。但是我以后, 一步步看清中国共产党内部派系很多。对什么江西苏维埃革命的目标又各有不同说法和主张。弄得党团内部乱七八糟。工作无能无效, 大失民心。我是这样一步步地走过来。先是觉悟到自己过去走上歪门邪道, 随即知道必须大力反对中国共产党, 走上以蒋委员长为首的革命大道。因此, 我今天特地应反省院领导的邀请, 做专题演讲。奉劝各位, 必须按反省院的领导指点, 快点好好学习, 迷途必须速返, 正道在眼前等你们!”(以上是凭当年听后, 所略记得的大意中的大意。)

在演说专家讲完时主席台上和主席台前两排来宾无不热烈鼓掌。全体



反省人只能慎重地静听到底,为时约2个小时。

在当天下午反省院当局遵主讲人的意见,在第四栋平房前一端的临时办公室里为他安排了一个座位,并通知管理员带鲍悲国前去谈话,大约1个小时。鲍在当天晚餐前后和徐梅君谈了话。第二天早餐前后,私下并低声告诉我谈话的情况,我现在根据回忆,大致情况如下:那个大叛徒问鲍悲国对他的报告有何想法;还随便地讲到对上海工业团体、商业团体和目前时局的认识还不够清楚,是有分歧的。鲍知道这是大叛徒要他表态,于是,采取了简单对付的办法。鲍对大叛徒说:“你的全部演讲我是细听的,但你讲话太快,演说的内容又大又广。而我被捕入狱已多年,有不少还要靠反省院以后的指点。现在难以奉答。至于你刚才新讲到的各种社会团体中的状况虽然是重要的,但我现在已无意去注意或学习;因为,我现在注意学习的,一个方面是反省院所安排下来的会计补习、农业信贷和国文等课程。如果我能反省出院,这些课程能使我有较多的条件,在工、商业里找到安身的工作,成立一个家庭,奉养年岁越来越大的父母……。”这时对方表示还有人等他谈话。

最后,鲍说:“我这样应付是抓不到把柄的,而且多少使他碰上了软钉子。”并问我:“这样对付是否合适?”我说:“很好、很好。”

### 第三节 反省院当局规定反省人写反省学习体会

大概是8月间,我从管理员那里得知,总务主任陈膺明天上午到第四栋房屋的前侧的临时办公室约我谈话,我觉得有点突然,就把手头上常在看的那本有关古希腊哲学的小书放下来。猜想他为什么要这样约我去谈话和谈什么话。因此,我想到以下三点:1、每个反省员有入院一期内(6个月)就保释出院的,也有两期内就保释出院的,也有三期的……按我个人来说,已进入第三期开始;2、陈膺是目前反省院的常务主任,一年多来他对我没有什么谈话,这次来约谈,一定是有些什么特别事情;3、我已知道他是西山会议派,同那位不常来院的赵见微副院长(C. C)有相当大的矛盾,我就连夜考虑明天相见时,如何见机应付。

第二天上午,他先问我:“你进院一年来学了哪些课程,觉得吃力不吃



力,有无兴趣……。”我为了避免他的话头太多,我就略带喜色说:“我来反省院后,因为学习条件比过去几年好一些,学了一些东西,除了院里安排的国文和牟先生教的党课、会计、农贷等等课程,我都注意听;另外,我还抽出空余时间学习了杨炳勋的速记法。最近,还在看古希腊哲学常识书籍,不过还要再学习。”接着他说:“多学习一点知识对你会有帮助的,你要好好学;还要注意听政治方面的课程。”

接着,他又把话头转了一个向,他要我分出较多的时间,多回想近几年来的一些往事和现在的思想活动,有什么想法应该主动向上汇报。同时,他又说:“以后还会再找你谈话。”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后,陈膺要管理员通知我去谈话,到后他就发问说:“你参加北伐前,在社会上有过什么关系?”我说:“没有什么特别关系,我还在商校读书,不过有一年夏季放假后,得了12元的奖励金,通过民智书屋经理的帮助,又得到在民智书屋的楼上租了一间小屋,参加夏季补习班。”哪知,我这样一说,对方就随便问我说:“那位经理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只知道他姓许,萧山口音。”接着他又问道:“你是如何加入共青团的?”我说:“去年特别法庭已经查问清楚了,我并签了名,有必要可向特别法院查阅档案资料。”接着他又说:“你出院后打算做什么?”我说:“根据这几年的经验,如能出院,凭自己的一点点知识做点报刊校对工作,如有机会就利用速记的技术找个工作。”

我是到1934年1月才得到院方通知而保释出院的,这就是我6年零3个月生活的经过。



## 第四篇 出狱后进行反帝、反封建 和参加救国会斗争的经过

本书第三篇末讲到我是1934年1月才得到院方通知而保释出院的。但是院方规定,要找到殷实的铺保,由于我父亲不能立即办到,我又多等候了几天。在1934年的一天晚上,管理员通知我:“今晚你做些准备,明天上午你家中有人前来接你出院。”于是我当晚就与徐天仁 难友谈心约定,出狱后可到我父亲的住处去探听我的下落。次日上午,管理员带我到办事员工作室时,一位办事员检查了一下我的行李,另一位办事员(我记得他名叫汤豪)给了我一张可以出院的条子。这时,我的四弟也到了办事室帮我拿着行李走出大石门,坐上他已雇好的两辆黄包车,顺利地回到了我父亲和救命妈妈的律师事务所的家中。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地共进午餐,同进午餐的还有一位老世伯,他是见我从小长大的,名叫王虎臣。他对我说:“下午(按农历大概是民国22年11月14日前后)我带你到附近的一个洗澡堂去洗澡、理发、消消晦气。”这是我六年多来身体清洁自由的第一次获得。这是如何值得纪念喔!隔了四五天,我即回到於潜看大姑母(我叫母亲的),她头发有些花白,身体还好,但家产已大大衰落了。不过我也无法照顾。我在老家只住了近一个月。在这期间,我到横山头看望了丁家的长辈、兄嫂。他们两位冒着寒冷溪水,背我过河到山上朝东的墓前,含着泪水向生母下跪叩头请安。接着,到塘坞奶妈、奶伯的坟上去悼念。次日,又到东城内东山岭下小丫姐姐的坟上去悼念。此外我的大哥陪我到泗洲殿娘舅家做专门拜访,并在三娘舅家住了若干日,同几位表兄到暂时葬在附近空地上的外婆的坟前进行悼



念。住了十多天,谈谈离别六年来的家中困难情形和我准备过年后找个职业,先能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然后能多赚点钱也能略向於、杭两家尽一点孝心。

在上述十多天内,我经常思索的一个总问题是:1、我现在虽然出狱了但不是为出狱而出狱,我是记住徐玮英勇就义时,给我的教导(你不要为我难过,好好学习,为革命献身,为前辈报仇)。2、目前,周围的政治环境也像一片汪洋大海和高山低郭相连的险境,甚至会有少数敌人会直接或间接对我设圈套和盯梢,我不得不多加提防;3、我不能因为难而停步不动,同时,我思考再三,认为是可以放慢点步子,多做一点相应的、必要的准备工作。吃年夜饭后,我就向大姑妈告别而回到杭州。

到杭后,过了几日恰有浙江省电话局招考报务员。广告上说训练期3个月供膳宿,并且给津贴12元,三个月后分配工作,待遇为24至40元。我去应考了,打算是:如能考取,混一下再说,比闲着要父亲负担总好些,学会电讯将来也可变为一种革命斗争的技术。我虽不愿以此为职业,但趁机学会一种技术也是值得的,投考的结果我被录取为第一名。在初、高中程度的投考群中我得此成果也是应该的,我当时觉得这电话局的主考者还能以才取人,很讲理,不像一般的腐败机关。

我开始学习一个多月就被浙江省党部内我的三位同乡知道了。一位叫罗霞天,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常委之一,坐第三把交椅,不是C. C派嫡亲;另一位叫金越光,为当时省党部秘书长;另还有一位名叫江筱峰,是科级干部,是罗的部下。他们知道我来杭州并愿进电话局受报务员训练,或许感到意外,认为有机可乘。遂派江筱峰来找我谈话,提到罗、金二位关心我,说我不必学报务员。我知其来意,就委婉地对他说:“我对政治已无兴趣,宁愿在技术方面多学点东西,来得实在。所以我这次暂先投考报务员。”他听完就悻悻地闷声回去了,这是第一次。

受训不到一个月吧,徐雪寒同志(他先我出狱)自上海来信,说他在上海经薛暮桥介绍认识了钱俊瑞,说钱能讲数国语言,思想进步,理论高,将承编《中华日报》的中国经济副刊,要找人帮助做校对等工作,我如愿意去上海,可以得每月20—30元的生活费。我得到此信真是高兴之至,不管能力与否,我都要去试一试。父亲不同意我去,我说服下来了,就准备前去。接着江筱



#### 第四篇 出狱后进行反帝、反封建和参加救国会斗争的经过

---

峰得知以上情况又来找我谈话,劝我不要去上海,一为不便照顾家,二为上海环境复杂,并积极转告我,罗因为同乡中人才少,非常关念我,约我一同去与罗谈谈。我即如约前去,向罗表示我很感谢对我的关怀,并委婉地说我年已25岁,过去又受了这样大的曲折,上海环境即使复杂,我也会正确对待,我又说我这次到上海,是暂时为《中华日报》当校对,目的在重学英文,投考海关。这是第二次,以后他们和我没有再来往接触。



## 第十二章 抓住革命奋斗目标 和谨慎迈步前进

### 第一节 踏上《中华日报》跳板 建立中国经济情报社

大概是1934年3~4月间,我按徐雪寒同志来信的约定,是在上海市铁路的南站下车的。我到上海法租界马浪路的一个弄堂里,做中式衣服的裁缝店楼上的一间小住屋。内有3个折叠帆布床,一张小木桌。雪寒同志和俊瑞的哥哥兆熊各住一个铺,另一个空铺就是为我准备的,这个小房间的月租大概只要几块钱,它惟一的好处就是店主装的一部电话,我们可随时借用。

随后,经雪寒同志的介绍认识钱俊瑞、姜君辰两位同志。并到他们俩家去拜访了一下,知道他们的住房也不大,全家生活也不宽裕,但工作却很繁重。钱在苏联塔斯社上海社(设在英租界)把新闻稿翻译并刻成蜡版;姜君辰是在汪精卫出钱主办的中华日报馆国际新闻版任主编,并任该报每周七个副刊之一——《国际经济情报》的负责人。同时又经他介绍,钱俊瑞又承包主编周六《中国经济情报》的副刊。中华日报馆设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汉口路口,它是由南京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筹款创办的,报纸为时不过几个月,由汪委派他的亲信林伯生为馆长。至于报馆业务和大部分编辑人员都依靠老部下来对付。《中华日报》出版不久,每日不过四大版(只是《申报》的1/4),但销路很好。这是因为它每周都有七期副刊,其中最有名的是星期一的《动向》副刊。外界都知道鲁迅先生常为《动向》写不署名短文,上述情况是我到上海后渐渐得知的。

下面,我再接着说一件与我以后工作很有关的事情:俊瑞新战友每天从塔斯社办公回来时,都要带一大捆全国的报纸交给徐雪寒老友。徐只能每天抽空翻阅一二十份报纸,用红笔将有用的东西圈出来,把资料分类并记下



号码,然后由钱兆熊送给姜的小外甥女蔡素娥剪贴在白纸上。积累的张数越多对写经济文章的帮助就越大。可惜的是目前带回来的极大部分全国报纸还只好暂时耽搁着。我越来越觉得我应该同雪寒同志一起做。因此,除了星期六外我每天都去报馆做校对工作。做完后,我们就圈阅更多报纸上有价值的东西。

随后,我因已知情报社月收入150元(主要为支付稿费)。其中有15元是付兆熊的生活费(因为他还难以写稿),于是,我就与雪寒商定:最近少约外稿,由你我来安排最低的生活费外,另留下若干元作为情报社的房租。另外,我告诉雪寒:“以后由我为报纸的副刊多写点稿子,还要由你多跑腿,每周送情报约稿,到印刷室去校对的工作都由我来包。为便于对外活动,我就以中华日报馆校对的名义,请你向钱、姜两位打个招呼。”

我在马浪路小裁缝店里,从雪寒同志那里得知,老难友庄启东,他住在马浪路附近。因此,我也抽空前去看望他,他大概比我早出狱二三期。我就问他:“反省院对出院的人都规定每月表述填报住址、职业、工资、收入和生活等栏目,你现在是否还填报?”他说:“我开始是每月报一次,以后就2~3个月报一次,再以后就不填了。因为先后填报的内容都差不多的,以后不报对方也从未查询过,就不了而了。你也可以这样对付。”我因为有公开职业,即在汪精卫出钱办的中华日报馆当校对,我就更拖延和停止填报,接着启东又把老难友骆子正的一些情况告诉我。我从而知道骆在南市的一个美亚工厂里,有几个男、女乡下朋友在该厂当工人,常有来往,知道该厂的一些经济情况;因此,我就记住这个关系,常与子正同志保持联系。

隔了几日,老难友朱楚辛得知,我已到上海参加中国经济情报社的编校工作。就从他家乡蒲江赶来看我,非常高兴。我除把眼前的情况相告外,希望他也能渐渐为中国经济情报社写点文章。老难友说,他需要把在南洋印钞公司的工作交接好。

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南市美亚工厂工人陆续开始罢工。钱俊瑞要我赶快收集实际资料及时写出一篇文章,过了若干天我就将《美亚丝厂工潮始末》一文送给——中国经济情报编辑室。得到同意,立即安排发表。

这里,我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中华日报》的一个特别情况。前面说过该报是南京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出钱创办的,使他自己也有一个机关报,《中





《中国经济情报》也是其中之一。上海南市政府同汪精卫有矛盾，所以要派专门的报刊审查官员轮番审查《中华日报》每日所出的清样。互相约定：一方以每日晚上 12 时之前交出送审的清样，另一方必须于次日凌晨 1 时之前交还审好的校样。如果对送审的清样某字某句不能同意，只能将该处用红笔圈掉，报馆则遵照执行，于付印前将圈掉的字和句抽掉而成为空白。买报的读者习惯地称之为“开天窗”。这样使读者更加抢着购买猜测。《中华日报》印发我所写的《美亚工潮始末》全文后，于某日清晨报童在街头叫卖时读者就看到全文开了好几处“天窗”，所以很快就被抢购一空（附注：当时，美亚丝厂职工曾向中华报馆排字间相识的工友探听那被开天窗的字句，还有美亚工潮的工友向骆子正老难友询问那被开天窗的字句，上述《美亚工潮始末》一文收集在拙著《早年文录》，198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13 页中）。

在以后的 5、6 月间，我们中国经济情报社除了紧紧站稳每月总体收入 150 元的阵地外（在我来说，就是利用好中华日报校对员的社会职业关系），同时，还要不辞劳苦地把剪贴资料的工作渐渐加强起来。前面说过钱俊瑞每天上午到苏联塔斯社，该社的任务是把译成中文的消息免费寄给全国各地的报社，各地的报社第二天就要免费寄一份报纸给塔斯社。该社只把该日收到的消息剪掉后就把剩下的作为福利品，由该社几个工友所有而出售。因此，钱俊瑞就有机会用少数钱预购下来，于中午下班时捆成一大捆带回家中。在君辰和钱俊瑞接上《中国经济情报》之后，上述报纸都堆在姜君辰较大的住屋内，放在床下和墙角边。只有报纸上每日的一二十份消息由徐雪寒用红笔圈出再由姜的小外甥女抽空把它剪贴在一张白的小纸上，分类记下号码放在五屉柜内。因此，我对雪寒说：“我们不要小看这点家底，我们要想方设法把堆在姜君臣家里的全国报纸圈、剪、贴起来。”正在这时，雪寒的母亲要从宁波市姚县家乡前来上海照顾他。不久，雪寒告诉我，他的母亲已在法租界对过的一个大中药铺子里的三楼内一间空屋子内住下，屋内能摆三张床一张小桌子，并说他母亲也同意我去同住。为改进情报社工作，我们退掉原来的房屋，在马浪路附近找了一栋较宽敞的房屋，报纸的圈、剪、贴设在这里，让朱楚辛和兆熊都搬过来住，把五屉立柜也搬进来，蔡素娥上午或下午有空时就来新屋里帮助剪贴工作。钱则暂时与我住在三层楼上，来回奔走于马浪路和中华日报馆之间。



大概6月间,雪寒老友调动住处不久,我也搬到那个大药房的新房子里。第一次见到雪寒的母亲,感谢她对我的照顾,前后时间大概有好几个月。

在这期间,我的居住条件好了一些,主要工作仍然是协助管理好情报社资料室和各种剪报事务和与中华日报馆每周一次的来往事务。不过,我有可能多争取一点空余时间,到设在英租界河南路的一家华商商会附设的一个小图书馆去借阅书刊(因为上海各租界都没有),或者到四马路一家小书店(它专门出售加了新标点符号的如《西游记》、《聊斋志异》等旧小说。店名我已记不清),坐在柜台旁的空凳上装作想买的顾客临时翻阅某一本小说,因为我没有余钱买,而这在当时是可以的。我记得有一天,我在这个小书店附近偶尔碰见了老难友徐建三。我当时不知他是从杭州新东监反省院后我出院(不是从杭州陆军监狱出院而是从苏州南京监狱),他就带我到这家小书店对过弄堂里的一间屋子里即该店的小库房。我们谈了一点短话,知道他也还没有接上组织,他又告诉我如有机会他打算到武汉去寻找党组织关系,互约以后通信保持联系。

相隔不久,有一位狱中难友庄启国同他的夫人前来药房楼上看我和雪寒。他说,他是从朱楚辛那里得知我住在这里。并问我现在的工作情况怎样。我说:“有机会前来上海为中华日报馆做校对工作,等于是重新读书能增长知识,我很满意,希望以后多加指教。”我觉得当我谈到狱中往事时,他就把话头转到别处去,我当时只以为她夫人在旁而不希望她多知道他过去的事(其实不仅如此,这要到以后方能说明)。我就把谈话缩短,并向他说:“我以后有空会同朱楚辛一起前来拜访贵校。”于是就握手告别。

我住在三层楼期间,一般都在楼下附近的小饭馆内吃便宜的豆汤饭。有一天中午饭时偶尔碰见9年前商校的一位同学丁兆民也来吃饭,虽然阔别多年我们还能互相认识,我只觉得他变得过老一些,政治上看去已无上进的样子,互相不便深问。我只告诉他我在中华日报馆做点校对工作,名叫李百蒙,以后就没有再相见。我从他身上体会到一个已开始接触到较进步的社会环境的青年,如果不继续前进就有后退下去的可能,这是必须警惕的。另外,由于我到沪后不过2个月,情报社所掌握的总稿费收入不过120元,给写稿的人只有6—70元,我当时还无机会为外面的报刊写稿,所以有时连伙食都无法应付。因此有一天把较好的几件衣服拿到大楼后的一个当铺里去当



了3—4元钱,暂时应付一下。这使我体会到了当铺的高利贷残酷剥削味道。

大概是到7月间,钱俊瑞按塔斯社的规定每年可休一个月的例假,不过要由他负责请一个人员来代替他工作,工资由塔斯社支付,俊瑞为照顾我的生活困难并认为我的英文翻译程度,个别字只要查一下字典就可以对付过去。于是我在每天上午(星期日休息)的时间到塔斯社代替工作一个月,有350元额外工资。特别是到8、9月间,老难友薛暮桥已派筹备人来到上海蒲柏路耕余里17号看房子,拟订在这里设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址,并从10月起创刊发行《中国农村》月刊,这样中国经济情报社就有了一个老大哥,主要是因为我们每月又多了一个对外写稿和多增加一个收入的机会。由于我们情报社白天又必须多几个工作人员,所以我同雪寒商定:情报社就搬到吕班路,垂直向东越过马浪路在蒲柏路旁,向一个较有钱的二房东租了三间楼房,这也是雪寒母亲租下来的,她家主要承租一间大前屋,钱俊瑞租一个房间,我和朱楚辛、石西民(刚从北京朝阳大学退学,愿意参加中国经济情报社会工作)在另一个房间,这样我们又多了一个不怕苦的新战友。

这以后不久,我从钱俊瑞那里得知我们又多了一年青的新战友,名叫马宾,从北平来到上海,人很能干,随后就热情参加上海救国会活动,成为一个积极的活动分子,他还利用空余时间自修俄语,作为能多参加工作的有利条件(附记:我和朱楚辛也住在里面,这个楼屋子的二房东在楼内装了一个电话,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二房东是苏州人,他靠以下特殊职业为生:即他和他的家小每年冬季用大瓷缸做雪花膏,然后用小瓶、盒子包装,贴上招牌纸,冒充上海某公司的产品运到苏州乡下去批发出售,得到厚利,在上海租界居民家里搞这类“小工厂”为生的是相当多的)。

大概是1935年1、2月间,中国经济情报社,接受了中山文化教育馆委托编写一个小册子,题名《1934年中国经济年报》,钱俊瑞对我说这个小册子是承蒙王昆仑先生的协助推动中山文化教育馆,拿出较优厚的稿酬,并保证要我们按约写出文稿。所以,俊瑞规定情报社资料室要把去年全国的经济动态资料整理好。要我写成一个草稿,他自己只能从旁协助一下,发表时用一个总笔名——秦百俊。稍后,我得知王昆仑先生是无锡人,通常住在南京与陈翰笙、孙晓村等一起发起组织中国农村研究会,同时也很关心城乡人们生活。同时,他在上海买了一座房子,以便照顾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工作,使它



能对纪念孙总理做出一些贡献；到1935年5月马相伯、沈钧儒等老人发起上海救国会时，他们也在南京推动组织救国会。

大概是1935年3月间，《中国经济情报》社扩大它的社会影响，在上海大世界附近一个大饭店内租用一个可容20~30人的空餐桌，开一个2小时的记者招待会。其中有两个同我们有些来往的日本记者，在发言中有好几位记者对《中国经济情报》所发表的经济消息和简要的评论文章相继表示赞许，会是开得很成功的。法租界巡捕房得知以上招待会情况后，就派两个人到法租界吕班路旁边的一个弄堂里，一间单门出入的楼上的一间大前屋来向我们查询：情报社成立的经过，成员的人数，总负责人的姓名等一般情况。我就用早已定好的调子相答复，这是毫不困难的（我当时能洞察他们此来的目的）。接着他们表示要检查一下我们的书橱和几个小箱子，这就使人宽了心，我们哪里会私藏什么小武器呢！于是我就请他们顺便看看，他们分别看了一下之后，对我说：“你们应到巡捕房补办登记手续，对你们的工作就可以更方便。”因此，情报社以后的工作更便利了一些。

在3月下旬，从杭州陆军监狱特别反省院刚出院不久的范船僧老难友，从江西南昌来到上海，暂住在澄中中学。我得知后，就去看望他。经他相告，我得知他出狱后就回到宁波象山老家；因身体衰弱，就在家中暂时休息。他的一位同乡老友在北伐开始时是国民党左派，是赞成国共合作的，对他有所敬佩，他在家中经济困难没钱治病，愿意帮助他到南昌地方部队有个文职职务。虽然不像以前那样，但对蒋介石在华北退让内心是不满的，所以他到南昌后就被照顾在一个同乡会馆里无偿居住。同时，他有些机会并擅长书法谋点收入，所以眼前的膳宿，养病是不成问题的。所以这次前来上海购买助听器，使身体渐渐好起来，能和老难友多做点工作。我觉得他身体衰弱，特别是耳朵不灵，安慰他不要着急，以后我们总会有机会的。他告诉我他这次借住在澄中中学是靠过去的关系——潘念之隐蔽起来，我听到这句话意外高兴。我告诉他：“我可能还认识潘念之，请他放心，过两天我再看望他们两位。”我从此就得到了念之大哥的帮助，老友范船僧买到助听器后觉得有点帮助，比较高兴。问题仍在体力不足，需要回南昌慢慢调理，我们就握手告别，以后就很少联系。后来我就很难打听到他的消息。这可能是狱中生活的折磨，出狱后回来又没有良好的医治，又不能在外医治，而早离开了我



们。如今,我一想到他心中就十分难过!

## 第二节 利用中国征信所资料室阵地拓宽工作范围

杭州陆军监狱的一位老难友,名叫何绍章,先我几年出狱。直到10月前,先在征信社总务科内谋得一个科员工作。分工管理所内所设的一个小排字房,他依靠往日老友章秋阳(章乃器的胞弟)介绍认识了总务科长,老友闻我也在情报社工作,他就联想到如果能在征信所资料室和情报社之间架起一座桥会对我们有利。于是他就按老难友的关系与我通气。我说:“我对中国征信所是一点也不知道,连名字也不知道,希望你以后多做些联络的工作。”

相隔一二十天,何绍章就高兴地来对我说,经过他同杨家林、章秋阳商量后,并向负责征信所第一秘书长兼该所资料室主任葛师良,提出如何加强资料室工作的意见。杨表示他管理的事太多,如可能请李百蒙先生管理则更合适;他就随即上报征信所董事长章乃器。随后,我征得钱俊瑞、姜君辰的同意,认为这样挂起钩来,更便于掩护情报社的工作,所以我大概在5月间到征信所资料室工作。

中国征信所的地址是紧紧靠近苏州河流入黄浦江的外百渡桥。因此,它也靠近外百渡桥测那个外滩公园。这个公园门口还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余味。过去一年,我常在法租界。现在午休时则有机会替自己来上反帝课了。

征信所是由上海各租界内的华商银行来开办的。他们各派一个代表组成一个董事会,并轮流推荐一位为董事长(现任董事长是由浙江实业银行的襄理章乃器担任)负责主持征信工作。其主要内容是:(1)哪家华商银行贷款给某家,要知道对方的信用如何。都可委托征信所派专业资深的调查人员写成书面报告资料,供委托人参考。(2)各华商银行还要了解华商工商业者,也可委托作调查研究,以上两者委托人都要对征信所支付规定的劳务费。依靠这样的互相配合和合作,使华商的贷款能用到稳当的地方,使有关的民族工商业得到发展,共同对付外界的压迫和侵犯。

对上述工商户主的调查是由征信所内的调查员(他们占所内工作人员



的多数)去负责完成;所内资料室外的近10名工作人员,把他们调查回来的资料,用后分类归档保存,这是我主管的事情,我特别加以注意。另外,董事会规定资料室每一周或两周利用调查所得的主要动态,写个简要的反映供内部查考。对这件事我也加以注意,指定室内几个人于资料分类归档时顺手办一下;同时,我还指定专人把我认为要参考的少数资料都印一份转给中国经济情报社,情报社将有价值的资料都剪贴一份送给征信所资料室。因此日积月累,在今后近两年中,从征信所资料室得到的资料也是不少的。这里我附记一下:大概是1935年5月间,由于中国经济情报社月刊和一些专门资料的发表,以及因中国经济情报社渐渐需办一个小的出版印刷机构,我们就利用一个易于办到的形式——即以10元1股为单位(对特别的情况还实行5元半股为单位),来进行谋借资金,于是,我们在1935年10月成立了“新知书店”,徐雪寒为总编辑,朱楚辛为经理。

我记得当年5、6月间,有一天我偶尔在上海大公报上看见吴景新的启事,他说他只是暂代尔漳中学的校长,外边说他如何压制学生自由,以致引起学潮,他声明与事实不符等等。我就好奇地探问他是否就是我十年前的老友,结果他来征信所看我了,一见真有今昔之感。他说,他1927年以后,到过冯玉祥那里,又到过新加坡,又被逐英国,他大概仍干国民党左派(第二党)活动,以后就脱离政治生活。一方面对现状不满发牢骚,一方面自己也自由放任享乐,在尔漳教教书,混混日子,看去他已不打算再如何振作了。吴说,1927年以后,他也不知道周邦彩的下落,孙清华据说发神经病自杀了,但都不确切。自那次和吴会谈以后,因生活、思想、工作皆有距离,以后也就不再联系了。

大概是5、6月间,徐天仁老难友从杭州吉祥巷反省院保释出狱,随即来到上海。他在上海先去看了徐梅坤老头子,得知他没有找到组织关系,问我如何,我说:“我虽一直关心这个事,但按我所接触到的环境和条件说不如先同狱内出来的可信赖的老同志保持来往,为革命多做一点实际工作,以免万一有疏忽而出差错。现在你也出来了,以后,你在杭,我在沪可以互相设法联系互相帮助。”然后,我又告诉老难友说:“我最近又同老难友何绍章一起工作,他的想法与我相同;他现在该所总务科负责管理该科下面的小印室等。有五六个工友,如有事可同他们谈谈。”以后不久,何绍章就告诉我把天



## 往事回忆

---

仁的一个小弟弟安排在印刷室当学徒。这以后,我们要印点什么东西就更加方便起来。



## 第十三章 参加救国会运动的经过和体会

由于前章第二节所述,我被介绍参加上海华商合办的中国征信所工作,担任该所资料室主任的职务。这不但可以有助于原先在中华日报馆的工作和《中华经济情报社》的编辑、校对和全国日报上的经济的汇集工作,而且有了向社会更多的学习机会。特别是正当这个时机,日寇步步在华北地区扩大经济侵略的活动,更加引起上海文化界人士和北平广大学生群众爱国救国的热情,我自然也受到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从1935年5月首先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在一个大会场里所举行的成立大会,签了名,听到了沈钧儒、马相柏、邹韬奋等老前辈的重要发言。随后,我除接着跟随参加一些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活动外,主要是于上班之余,跟随参加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的一些活动。下面我分三节来回忆。

### 第一节 除文救会外主要参加职救会的活动

大概是6月间,我结识了一个参加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工作的会员周绍基。他是小工商职员出身,后与他的同行合办了一个擦皮鞋的小铁盒油厂,他另外与救国会的几个成员出版了一个不定期的小刊物名叫《斗生》,因他认识章乃器。希望章能介绍一个文救会的会员,同他交个朋友,有空时对他办的《斗生》做点帮助。于是章就同意介绍他到征信所来看我。稍后,他知道我是他爱看的《水旱灾“交响曲”》的作者,他就问我是否可以在有空时帮助一下他所办的《斗生》杂志。我说:“投稿到《中国经济情报》(周刊)来的,如有适合《斗生》使用的文稿,我可以转给你选择。”因此,我们以后就来往较多一些。

大概是8、9月间,有一位职救会的理事名叫王纪华(原名叫王文清),他





从周绍基那得知我有空时如何关心《斗生》杂志之后,有一天就在周的临街的小业务工作室里相约与我见面。互相谈了一会儿话后,他就对我说,他是上海职救会理事,是上海海关俱乐部图书室的管理人之一,同时还表示希望我也参加职救会和有空时也参加职救会理事会;大家一起为职救会做点工作。我考虑后,表示同意,不过只能做点协助性的工作。现在只记得另一个职救会理事李少辅,我一般只与王、李两位较多来往,有一次我问纪华说:“我们在开临时碰头会时,你用笔在小本子上记点什么,这方便吗?”他对我说:“我是用英文字母、拼音记几个汉字做自己的备忘,别人看不懂……”。我说:“我什么也不记,主要凭脑记,免得操心……”。他也表示理解,以后,我得知上海南京路新新、永安、先施和大陆商场,四大百货公司的职救会会员,晚上在特殊小组会活动(大陆商场的特殊小组会又称蚂蚁社),都是纪华告诉我的。因为他有时要我前去,对他们讲讲时事,使我有接触职救会群众的机会,我得益不少。

大概是1936年春、夏间,王纪华有一位知己名叫王翰,想同我见面。王纪华就约我们到海关俱乐部见面,他自己不参加,他在海关图书室照顾,我表示同意。我记得一天下午,我与王翰在那间实际是一个清静的小会客室里相见,他年纪比我大一点,穿着一件长布大衫,坐在床铺一头,手旁还放着一顶薄呢旧帽子,在等着我,然后纪华就退出门外,对方对我说:“今天麻烦你前来,只想通过你了解一些事情。”他一是想知道,现在我在征信所资料室内做资料员工作的姚士彦(经王翰相告,我才知姚在前几年因爱好演戏与田汉有些来往)平时的政治情况如何;二是他是否了解北大学生季斯英。三是他主要问我是否能设法了解到以下一件事——即一个女生宿舍门旁一把扫帚的手把内,被相知的学生约定为互通消息的场所,不知季世英是否知道。从上述约会的过程,谈话地点的状况,特别是王翰这位新朋友的穿戴和他说话慢吞吞的情况,我能意识到他自然是一位较老的同志(不知其更深的情况),所以我对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十分注意听,表明我是很诚恳的。紧接着我答复说:姚是在我去征信所之前就已经在资料室做资料员工作,还不知道他过去有何活动,但我已经注意到有时在他的办公桌上随便摆着闲时阅读的进步书刊;午餐空余时间常与我顺便谈谈所订阅的《香港时报》有时刊出的红军长征转移的零星消息。这在当时征信所内虽然也有人爱看、爱谈,



但我是在暗中对他加以注意并保持警惕。姚和我一起参加了6月间职业界上海救国会纪念“9·18”运动的大游行。我们征信所的职救会员,大概也有10余人参加。

谈话至此,王翰就问我资料室的电话号码。这次谈话就此结束。

隔不多久,王翰就在一天午餐后,直接打电话到我征信所办公室,约我到苏州河外摆渡桥旁边的外滩公园里碰头。他大体上还是那个穿戴,使我想起8年前英勇就义的徐玮。我向他汇报说:“对姚的前几年爱好戏剧的活动,我不易探问,待以后有机会时顺便再说。目前我只讲他在征信所做的职救会活动,觉得他表现很积极的样子。对北大女生宿舍里的季斯英,我已通过我所熟悉的妇救会的几个朋友了解到北大学生当中确实有一些进步的学生,女生宿舍门口确实有一把扫帚,不过不知它的作用。我从季那里闻知陈波儿名演员来观看了一下看守所,我们在公园里,特别是在白天不易长谈。”我向王翰表示,经纪华介绍得到你的教育不少。希望有机会对我多帮助。

大概在这以后不久,我通过文化界救国会以及通过有关刊物的宣传出版工作的活动,认识了一位新交的好朋友,他名叫徐步,南方口音,年纪比我小几岁,他当时的具体职业关系,我现在已记不清了。他有一天对我说,他已联系好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自编一个小型杂志,已勉强找到出版的地方,但因每千字的稿费最多不过2元上下,希望能够有几个能写文章的朋友帮忙写点义务性的文稿;他希望我有空抽点时间参加他们的编辑会,并设法协助他们拉一点义务稿子。我说:“万事开头难,我1934年初同姜君辰、钱俊瑞承包中华经济情报副刊时的情况略好一点,但是起步时也是很难的。但是只要不怕苦,路子总是越走越宽的,我以后一定抽空参加你们的编辑会,并且努力拉义务性的文稿。”徐步战友办的这个刊物我大致记得名叫《新知识杂志》,出了几期后,就站稳脚跟(当时上海文艺界闲谈时把4个作者的名字凑成了一副对联,上联:胡风沙千里,下联:徐步骆耕漠)。

再者,上海英租界四川路有个基督教青年会,内有好几个进步爱国的人士。其中有一个名叫刘良模,年龄同我差不多,他爱好唱歌,为了救国就以基督教青年会为依托,联系一批课余的中学男女学生学唱救亡歌曲,他为领唱人,逐渐形成一个经常性的救亡歌咏队。他们常唱《打回老家去》、《大路歌》等歌曲来宣传。我不大爱唱歌,刘良模注意到这一点,在看到 I 发表的



文章有生动的内容时,就约我到他的歌咏队里去做点时事宣传。这样我们就互相成为至交的朋友。

这里我扼要附记一下“何梅协定”,这个协定大概是5、6月间秘密签订的。我是从事后的传闻中得知一些零星的消息。即1935年6月初,在北平的军事长官何应钦和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的协定,迫使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这是近4年前蒋介石下令张学良退让出东北三省的又一次卖国行为,来贯彻他所采取的“攘外必先安内”(即一定要先剿灭工农红军,才能谈到所谓如何对付日本的问题的反革命策略)计划。所以,上海刚兴起的救国会运动就开始遇到南京政府的种种阻挠。不仅如此,日寇即步步向河北省以南(即当时黄河以南的山东境内)扩大走私经济的侵略活动,造成惊动全球的华北走私问题。南京政府则仍视而不见。

## 第二节 关于 X 团体和更社团体的特殊历史作用

据我的记忆,从1935年以后,上海文救、妇救、职救以及沪西小沙渡一带的团体的救国浪潮,连续增长起来,北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刘良模等所组织的爱国歌唱会也开展起来。从这时起我们中国农村月刊、中国经济情报社、新知书店较多参加文救、妇救和职救的战友在参加以上活动中常遇到一些有关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问题,觉得最好有一个临时碰头商量的机会。我对雪寒老友说:“我们现在有中国经济情报社、中国农村月刊社和新知书店三个集体组织在一起工作的人员,约有三四十人分布在上海各救国会团体里,其中在各救国会团体里起重要作用的约有10余人。在遇到疑难和较复杂的问题时就感觉到需要有一个互相督促的组织。如果你有同感,我们主动向俊瑞、君辰、暮桥他们三个提出建议,由他们带头由上而下地组织十几个人为上述组织的成员。”雪寒表示同意,他认为不用另取名字就用X团体。最后,大家公推俊瑞同志为“龙头”,“X团体”对外不使用。新知书店、中国经济情报社、中国农村月刊社三四十人都互相知道。

大概是1935年冬,上海英租界四马路上办起一个小书店,名叫“光明书店”(它靠近中华日报馆),除经销一些普通的文教书籍外,就出版了一个中、小型月刊(名字我已记不清),由金则人主编。因为我在中国征信所有公开



和较优越的职业关系,所以他就约我参加编辑。我说:“我可以帮助你约稿子。”这样我们就结成常来往的朋友。随后,我向钱俊瑞探询是否可对金再深交一步,钱说可以向他多接近(因为潘念之老友已在上海澄中中学任教与金则人有来往),于是我们两人有时就到北四川路金则人家中谈谈关于救国会的事情。不久,我从潘念之那里得知金则人 1927 年参加北伐革命,1927 年去日本留学,我们应该帮助他办好杂志。稍后,因为著名的文学家王任叔常来金则人家中,我们四人就有较多见面的机会,在目前的形式下大家有相互见面的要求。随后,王在一次谈话中提到在明朝末年的政治形式,民间有很大的不满,并议论如何反对,便组成一个名叫“更社”的组织来进行改革,为了使我们的碰头会能经常化和更有力量,也可在内部称为“更社”小组。我能明白他的意思,也立即表示赞成。我们常到北四川路一条弄堂里金则人家中交谈。有时,我们在互相谈话中,为了彼此的了解也交谈到自己的一些往事。没有其他人参加。金的妻子就在外间的小屋里照顾,金在开会、工作时,爱喝一点绍兴酒,在需要时,他的妻子就让他 13 岁的胞弟去买。

当时我完全不知道金的夫人过去的情形,如果知道我会在“更社”活动中受到更多的教导。

一个重要的附记:为阐明本书前面第三篇第八章所提到的张秋人同志如何被捕的情形问题和上面所提到金则人的夫人和他的胞弟徐桑楚的经历等问题,下面着重附记 1999 年才访问清楚的情况。我记得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5 周年,中央组织部邀请中央机关退休的男女老同志几十人和各省市得到落实政策的老同志约几十人,前来参加庆祝会,在组织部招待所聚会谈心,在一桌共餐,有时也谈些开会的事。有一次有一位女同志就问我你是不是骆耕漠同志?我说是。从而我才得知她名叫徐镜平,并记起在金则人家中相见的一点点情况。因此,彼此都很高兴,我们在国庆节观礼后,我曾请她到我家中聚餐,她谈到这次是代表上海妇女界前来参加纪念会的,等等。但还没有谈到张秋人同志被捕的事(我当时只知道他和金则人同志的关系,根本不知道她在 1928 年前就同张秋人结成亲密战友的事。)到 1999 年我开始准备写本书时,才又联想到徐镜平大姐。老友卜三同志偶尔有事前来北京时,我就向他讲到请他回沪通过妇联向徐桑楚了解一下我想



知道的事情,结果他就把先后了解到的情况写了一封长信告诉我说:

骆老、翠英同志:

这次赴京参观太匆匆,虽然见到二老身体康健,谈了两次话,心里很高兴,但语犹未尽,甚以为憾。

我10月14日上午返抵上海,15日休息一天,16日即开始寻访徐镜平有关同志和亲属。经过两天连续访问,找到了上海市解放初期两任市妇联主任赵先(女)和关键同志,接着又找到徐镜平同志嫡亲弟弟徐桑楚同志(原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老厂长,他今年已84岁。徐桑楚同志说,他曾在四马路光明书店当过校对,认识骆老,现已离休在家)。

10月18日上午9时,我和亚仁一起到徐镜平的弟弟徐桑楚家里访谈了约一个半小时,桑楚同志所回忆的情况,完全验证了骆老与徐镜平同志相处的一段经历是相符合的。也看到了1930年徐镜平弟弟珍藏的徐镜平同志全家的合影,还有徐镜平本人80岁时的留影。可以说,基本上顺利地完成了骆老希望了解的关于徐镜平的情况。

现将徐镜平的嫡亲弟弟徐桑楚的访谈纪要综述如下:

(一)徐桑楚(宁波人),比姐姐徐镜平小11岁,现年84岁。小时候,姐姐很喜欢他,跟姐姐住在一起,他曾见过张秋人同志。徐镜平大约在1927年前和张秋人同志结婚,那时候,正当浙江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时,党派张秋人(当时张在党内很有名气,号称广东三杰)到浙江出任省委书记,重建浙江党组织。1927年9月9日这一天,张秋人和徐镜平走到西湖边,突然发现四五个黄浦军校的学生和反动军官跟踪他们,张秋人和徐镜平两人走到汪庄附近,看见后面继续有人尾随盯梢,张即对徐镜平说:“来者不善。”要徐镜平立即赶快回去,到火车站附近住宿的旅馆里将他的秘密文件弄掉。徐镜平说:“我走了,你怎么办?”张回答:“你马上走,我来对付他们。”徐即转身离开,刚走不久,就看到四五个盯梢的黄浦的反动的同学,上前包围张秋人同志,扭住张秋人,拉来推去。秋人同志擅长游泳,被推到靠近湖边时,立即纵身跳入湖中。据徐镜平生前告诉徐桑楚说,张秋人原以为西湖水很深,可以潜水脱逃,不料下水后,水很浅,淤泥很厚,无法潜逃,旋即被捕。张秋人同志是1898年生,1927年9月被捕,1928年2月牺牲,就义时,只有30岁,



徐镜平当时是23岁。

(二)徐桑楚说,夏衍在一篇文章中写的回忆张秋人同志被捕情况,与徐镜平亲自告诉他的情况是有出入的。在夏衍的一篇回忆中说,张秋人同志跳入湖中即将密件埋入土中,徐镜平也同时被捕。但徐桑楚说,徐镜平并没有讲过她也被捕过,也没有讲过张秋人跳入湖中后把密件埋入土中。

(三)张秋人被捕后,徐镜平曾去探过监,积极设法营救张秋人同志。那时,徐镜平住在吴淞路一号,朝敦电器公司老板蔡叔厚的家里。夏衍同志也曾住过蔡家。蔡叔厚留学日本,交际广阔,与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的一个厅长有亲戚关系,徐镜平曾通过蔡叔厚托这个厅长设法营救张秋人同志,据说,张的案情严重,难以相助,结果没有成功。这时,徐镜平已有身孕,不久就小产了。蔡叔厚思想追求进步,张秋人被捕后,使他深受感动,积极要求入党,后来蔡叔厚的家被党正式指定为党的工作联络据点。

(四)徐镜平同志,宁波人,1904年生,原名徐诚梅,1924年入党,张秋人同志牺牲后,徐诚梅来到上海改名为徐镜平。1929年徐镜平和金则人(原名金泽人)结婚,是徐镜平的第二丈夫。1930年,徐镜平和金则人在上海创办成城中学,徐镜平任校长。当时茅盾和陈望道的夫人都在成城中学当教师,成城中学是党的工作联络据点。解放后,徐镜平在上海市妇联任秘书长,金则人在复旦大学任秘书长。三十年代,金则人曾在上海四马路光明书店办过杂志,也会翻译,因杂志名称经常变换,叫什么名称,徐桑楚已记不清。徐说,骆老在金办的杂志上写过文章,他读过骆老的文章。

(五)在上海救国会期间,徐桑楚年纪还小(大约十三四岁),但对当时王任叔(巴人)、潘念之、骆耕漠、金则人(徐镜平的第二丈夫)在徐镜平家开会的情况,他还记得,他说,那时他已有些感觉到,当时党中央有人来参加会议。王任叔(巴人)、潘念之、骆耕漠,他都见过,都认识。他记得在徐镜平家开会的地址是:上海虹口北四川路老靶子路,那时徐桑楚也住在姐姐徐镜平家。1928年至1929年,这里是党的工作联络据点。那时,我地下党闸北区委书记陈德辉和徐镜平、金则人和徐桑楚都住在前楼。至于骆老在徐镜平家开会谈些什么,因为徐桑楚那时年纪小,不清楚。他记得李平心当时搞“自修大学”,他与李平心很熟识。

(六)徐镜平与李鹏同志的妈妈是同学,他们常常通讯来往,徐桑楚也曾



看到过李鹏妈妈写给徐镜平的信，字体写得很端正。

(七)1984年徐镜平任上海市妇联秘书长时，曾被邀请参加北京天安门观礼。经与上海市妇联主任赵先同志和徐镜平的弟弟徐桑楚验证属实。

(八)徐镜平1929年与金则人结婚后，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金同稷在大连，任大连大学校长，二儿子在杭州，任话剧团团长，三儿子是解放军旗手，于1955年参加解放一江山岛战役中光荣牺牲。

(九)1957年左右，徐镜平同志因为讲了两句话，被划成右派，到1978年才纠正平反。1986年，徐镜平一家都回宁波家乡游玩，回来时她说要到诸暨去看看张秋人同志的衣冠冢(在诸暨城里)，返沪后，感到很累，后来住进华东医院，于1986年下半年病逝。徐桑楚同志家里，现在还保存着一张1930年拍摄的很珍贵的照片，是徐境年同志全家合影，上面有徐镜平和徐镜平的第二丈夫金则人，以及徐镜平的妈妈、弟弟徐桑楚、二弟、二姐和妹夫等。我已托徐桑楚同志把这张全家合影设法冲洗出来，赠送给骆老留念。徐桑楚很热情，马上答应，日内交上海电影制片厂复制好，由我转寄给骆老。

先此奉达，关于史之华同志的情况，容再续陈。敬祝健康长寿。之华同志的情况，重点需要了解些什么？请告。

卜三

1999年10月20日

2001年3月我到杭州与党史办同志参加拍摄《红色囚徒》的电视片后，曾到上海拜访徐桑楚老同志得知：当年在北四川路开“更社”团体会的那座楼房已早改建高楼，幸亏留下了那座旧楼房。留下了一张全家人的照片。我说：“这是很宝贵的，要谢谢你的周密考虑。”

### 第三节 撰文反对日寇经济侵略

对以上宣传工作我分三点来回忆。

一、在上述新形势下，我根据中国经济情报社所剪贴的全国报纸上的有关资料，在报刊上写了一篇揭露文章，题为《惊动全球的华北走私问题》(本



文在1936年第4卷第6期的《世界知识》半月刊上发表后，收编在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经济论文集》第三集。（附注：1987年东北财经出版社还将上文收录在《骆耕漠早年文录》，第122—131页中。）

申报馆内一部分记者同事，约我去做一个座谈性的发言，当时石西民老友已由经济情报社转到申报馆当记者，座谈会就由他主持。我在会上做了专门的发言之后，大家又做了讨论互相都得到帮助，我从而深刻体会到：同为记者，常有各自的主题，平时来往，以至有类似的座谈机会，是会把读者工作做得更好，所以我在这次会上也交了几个新战友。

二、过了几天，陶行知先生在闸北所办的山海工学团，约我去作华北走私的事实报告。我对他的声誉和这个山海工学团的社会作用已开始有所闻，由于听讲的人不多，我就贸然答应前去，所讲的内容也就是我文中所写的那一点内容，效果还过得去，那个学校的地点我已忘记。最近（2000年3月下旬）我已从胡晓枫老同志那里得悉，她当时是那个山海工学团的学员之一，她告诉我说，那个山海工学团的地点是：上海宝山县大场南面孟家木桥。

为便于下面回忆，我做一附记如下：有一位中农会友名叫孙冶方（我完全陌生），1935年9月的一天下午，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暂借住在中农会。他带有一箱书，需要人帮助把书抬到楼上，暮桥因为我当时上午也在会里，就顺便邀我一起去帮忙。过了几天钱俊瑞、孙冶方等几位知己（我也在内）一起到南市一个学校里开座谈会，安排的人名叫方与岩，是中农会员并推行陶行知学说。在会上我发现孙冶方讲了一番与钱俊瑞不同的观点，使我注意到孙是有一些救国理论根底的人，我当时虽然不能一下就吃透，但可以从而得知他们两个都很有理论根底，应该向他们俩多学习。

三、大概是8、9月间，我应邀去公会礼堂向听众做一次演讲，我原以为是比较方便的。但我一当进会场看见听演讲的听众约有300人，出我意外，心里有点慌，想必须好好对待。他们的座位是离讲台一丈处，一排一排的向后高上去，坐着等候。我走上讲台后向听众表示敬意时恭敬地鞠了一个躬。演讲会是宣布开一个半小时上下，我就按我的准备来进行。这时我主观上是有节奏的，实际上是为了怕讲错，就变成背文稿的样子——这自然会使得听众觉得较快和有些难以听懂的地方。另一方面觉得语音没有高低的调子，容易使人疲乏，于是，听众间渐渐有了穿插说话的声音，幸亏我感到有点紧





张时,前半段时间已到。

在暂休的一刻钟内,负责当时中华书店主编工作的钱一石老前辈,他是那天大会的背后主事人。约我到会场旁边的一个房间内谈话,像老师教学生一样,要我不要着急,要把下半段的话讲得慢些,扼要一些,就可以使听的人多懂一些……。我就按照他的嘱咐立即回到会场,全场就变得安静些。下半场的结果比上半场略好一些。

大会结束后,钱一石先生又同我谈了一些话。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你对今天演讲的主题是很了解的,本可以讲得更好一些,大概是由于你过去不常接触今天这样的场面,于是,一开始心里就有一点紧张,越想讲好时,就变成有单背文稿的倾向,不能多兼顾会场听众的情形。所以钱先生虔诚地向我建议,以后如遇到向公众做演说的任务时,要沉着冷静。我向钱先生报告说:“我是生平第一次做今天这样的演说。幸亏有钱先生在后面做及时的指点,下半场才摆脱了尴尬的场面,非常感谢。”接着,他还恳切地对我说:“你以后,如有机会多到工厂走走,多接近实际的工作。可以丰富你的演讲内容,还可以使你的演讲变得通俗一些。”我觉得他的这番话是很有政治意义的,就上去紧紧握住钱先生的手。

### 第四节 参加上海救国联合会发起的两次大游行

“9·18”六周年纪念到来前几天,上海各救国会联合小组(徐雪寒、王纪华都参加该小组)组织纪念“9·18”大游行活动。我记得那天的游行队伍由史良带头的妇救会会员排在第一行列。职救会会员排在第二行列,参加的人数最多。中国征信所有10个人参加(我和姚士彦也在其内),学校学生、工人群众等等在后,大概有好几百人,从上海北火车站向英租界河南路南一段集中起来沿法租界的南市地界的大马路游行。当队伍走到南京路的时候,就从附近的大陆商场的高楼上向下散发游行队伍的纪念传单(这个传单就是由中国征信所小排印间于晚上秘密印刷成的),传单飞向满街,引起群众的极大关注,影响很大。游行队伍接着前进到与南市地界相隔的一条大马路时,队伍向西行,快到目的地,当带队人史良准备演讲时,法租界巡捕房的巡警们就出来干扰,用木棍打伤了游行队员。史良也被打破了头皮,由



于我在职救会带头的行列里。把我的帽子打落在地,把我的后脑打破流血。游行队伍不得不分散开来,整个游行队伍就不能到目的地前举行纪念大会。游行队伍中的一位同志和我的五弟丁浩雇黄包车,把我送到一个法租界内靠近美滩工业附近的一个大医院,去医治后脑袋的创伤,同我先后去这家医院医治创伤的人先后大概有 10 多个人。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都很关心治好我们的伤痛。过了不久,上海还出了一个简报,这次大游行队伍被法租界寻捕房打破头皮的有史良、李百蒙(我当时用这个名字)等等,游行人员共约 100 人上下,这次大游行虽然没有在目的地开成游行大会,未得全胜,但是大大鼓动了全上海老百姓的爱国热情。

参加鲁迅葬礼大游行:

1936 年 10 月 19 日,我从朱楚辛(他当时同徐雪寒一起参加上海各界救国会的专干内部工作的干事会,并当干事)那里得知鲁迅先生已经病故在医院,心中十分难过。

第二天早晨,朱还告诉我说,妇救会和职救会领导人已指示理事会如何兴办鲁迅的葬礼。第二天晚上王纪华(他是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下的干事会成员之一)召集五六位职救理事开会,说这次为鲁迅送葬要比上月动员更多的群众来参加游行,但是特别注意游行队伍要有严密的组织性,只为鲁迅默哀送葬,保证做到鲁迅的遗体从万国殡仪馆畅通运到万国公墓,开个追悼大会,由上海各界救国会群众代表把鲁迅的棺木连同送葬的大旗庄重地抬到墓位。在上述职救理事会开完后,纪华还告诉我说:“明天干事会,一定还要开一个更具体的碰头会。其中一定会商谈到职救会会员参加 22 号早晨游行的人员,在万国殡仪馆到万国公墓的路上应起如何的作用等问题。我会再关照你的。”于是,我就在 22 号早晨饭后在万国殡仪馆外的人行道上来回行走,碰到了许多约好的职救会成员。我还遇到至交徐步,他对我说了 2 件事:1、他听说胡风曾不同意用民族魂的旗号尊崇鲁迅,现在也表示同意;2、文化界救国会要求由文化界代表人员将鲁迅的棺木抬上灵车,仍要由文化界救国会的代表将鲁迅的棺木抬上规定好的公墓。由上海各界救国会所选派的群众代表来护卫安葬,这还待说服。他听说孙夫人宋庆龄和沈钧儒等老前辈还在做顾全大局的工作。他问我:“你今天是否也参加一下向鲁迅遗体告别的仪式。”我说:“我已被通知在内。”由于时间关系没有交代其他事



情。

接着,相隔不久,我就从万国殡仪馆的一个侧门进入殡仪厅,向安睡在朵朵鲜花丛中的鲁迅鞠躬,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鲁迅大师,绕灵堂一周,同时,我还看见鲁迅的老母亲静坐在右侧透明的玻璃窗外,紧紧地盯着自己儿子的遗容。我绕灵堂一周后,就回到殡仪馆前大马路的人行道上,等待由上海竹木业的救国会会员亲自做的“民族魂”大旗到来(纪华着重告诉我这件事)。过了不久,我看见姚士彦从一辆运货小汽车下来,带了一面旗子到了殡仪馆内。随后我看见殡仪馆附近大马路上的人都做了准备,使送葬能平静地进行。接着不久,我看见一面白缎子做底,黑丝绒做成的“民族魂”三个大字的大旗竖立在大灵车上。接着我就看见有10个文化界救国会知名人士,将鲁迅的棺木沿着殡仪馆前台阶缓慢地抬上竖着“民族魂”大旗的灵车。然后,宋庆龄、沈钧儒以及国际友人先步行后坐车,接着是上海各救国会的代表,先是妇救会的代表(她们是一开始从道旁就全跟上),接着其他救国会成员先是上一小部分,然后再按总计划步骤进行。然后大部分是在若干段指定的马路两侧分段插上自己的送葬行列,使租界内的巡警无法上前干扰。这次还注意到沿途送葬中群众自然唱悼念的哀歌和喊口号,来不及编出新歌曲,为了合拍就规定要唱大家都熟悉的《打回老家去》歌曲。所以当天老百姓一面观看送葬的游行队伍(大概五六千人),一面也有不少人跟着唱《打回老家去》。

为鲁迅送葬的游行队伍中绝大多数老百姓都送到指定的公墓——万国公墓。各界救国会代表人物及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将奉献的花圈、题字及纪念品都汇集在墓地附近;孙夫人宋庆龄、沈钧儒等知名老同志已在休息室内准备去举行公祭大会上,一起上主席台进行公祭的事宜;在殡仪馆外面的妇救会和其他救国会的一小部分会员在主席台下站着,我记得为时不久,主席台上就有一个专人示意今天的大会由青年团学者王源主持。这样我们站在台下的人就立在万国公墓附近的广大的送葬的行列,望见选派的群众代表把覆盖着大旗的鲁迅棺木,从灵车上抬下来,缓慢抬入指定的公墓中,这时路旁送葬的群众又陆续唱起了《打回老家去》,此时已是午时。

这次参加鲁迅葬礼大游行比起一个月前纪念“9·18”大游行,是顺利的开始又到胜利结束。我受到更大的教育;虽然我的接触很有限,但受到启发



特别多。

下面我专门做一个重要的附记：

10月23日，我到征信所后，一连几天都没有见到姚士彦来上班，也没有打电话来请假。我觉得有点奇怪，我想是不是因为劳累而得了什么疾病，到了第5天他的妻子带了一封信由收发转交给我，我拆开来一看，大为意外，十分惊奇，短信的大意是，我在征信所对他很照顾而他却在背地里做了很对不起我的事情，很懊悔，完全是不得已的，受人牵连；让我打开他办公桌的抽屉，有一封庄启国的来信。请我原谅。

我平时也注意考察姚的为人如何，但我不会去开别人的抽屉去查阅什么资料，反而弄巧成拙。这次，我于下班后，就一个人去查阅庄的寄信：其中扼要写道：“你说，你工作比较忙，而只能对李百蒙的行动做点工作。我只要你注意考察他有什么特别活动，同什么人常来往就可以了。”我看了后觉得吃惊，幸亏我平时对这方面的行动是一直谨慎从事的，一面又觉得真凑巧，我就这样不费劲地得到“国特”内部的秘密。于是，当晚我立即打电话告诉徐雪寒、朱楚辛说，我碰巧得知姚士彦是国民党内对我们做特务工作的，他装作迫不得已的样子。同时，我对纪华说：“请你也告诉王翰一下。”纪华说：“王翰已不在上海，如再来，当即转告。”

过了两天，姚来上班时对我说：“当天晚上他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抓住送到南市的牢房内，经庄启国营救才出来的”（后已了解得知姚是南市副市长潘公展 C. C 派，被另一派互不相知的特务抓去）。接着，他又对我说：“我是不得已，表示对你那样，实际也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以后我更可有解脱的机会。”我说：“我们参加一些救国会的活动，平时你写了一些反帝反封建的文章，那都是为救国卫国。你以后要好好帮助我工作。”至于以后，我该如何对付姚的问题，自然会心中有数和做好准备。

以上两次游行引起上海广大人民的称赞，影响很大，特别是引起当时参加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张学良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同情。蒋介石是很害怕的。

## 第五节 “七君子”被捕和另一个小风波

1936年11月23日深夜，南京政府下令逮捕上海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



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史良、沙千里，送往苏州监狱关押。这件事，不仅轰动了全上海，还震惊了全中国。社会各界对国民党的反动行为议论纷纷，难道抗日救亡也有罪吗？对这方面的重大政治反映，我这里不做一一介绍，而只介绍一下中国征信所董事会内的一个特别反映。

中国征信所是由各华商银行派一个理事组成的一个理事会，共推一个董事长来领导。章乃器当时是上海中国实业银行派的襄理，并被推选为征信所的董事长。章乃器因救国会关系被捕后，征信所理事会，虽没有提出改选董事长的问题，但中国银行派往征信所参加理事会的一位中级职员，他当时是征信所一位副秘书长的后台，指使这位副秘书长与当时的葛师良秘书长（他是中国实业银行通过章乃器安排的）争夺征信所资料室日常工作的管理权。于是有一天早饭后上班时，趁葛师良请假一两天未来上班的机会直接向我说，所内人士将略有变动，资料室外的钥匙应于下班时交给他收管，上班时再向他取用。我与室内同事商量一下后，我回答他说：“钥匙交给哪一位秘书长管理，在我都是一样的，不过一年半前，我来征信所资料室内担任现职时，为便于我们下面工作是把钥匙直接交给我使用。因此，我希望由葛秘书长和您俩人一起做指示。”对方很不满意地表示，必须照办，当时室内同事都不以为然，我们就在室内静止工作。哪知这个小风波立即传出所外，下午上海新闻报馆有名记者陆诒就前来征信所访问我，他怀疑事情是否与章乃器被捕有关，我将以上实情一一相告。他第二天上午一早在新闻报上是否做了报道和做了什么样报道，我现在已记不清了。

第二天早餐后，我仍到征信所上班，但只在资料室办公桌看一下日报，但大部分时间到大办公室总务科长杨家仑和何绍章两同事的座位旁边漫谈漫谈。杨告诉我说：今天上午，上海中国实业银行孙大老板可能派他年轻的亲胞弟（该行的第一位副行长）亲来征信所做一些调节的工作。过了不久，我看见一位身穿华丽绸衣的大老板走进秘书长办公室，与那位副秘书长谈了近一个小时。他们谈了什么我们自然全不知道，不过，当天下午下班前那位副秘书长就将资料室外的钥匙交给我，要我带领全室同事照常安心工作。我说：“我们自然会这样做，请你放心。”

经过以上曲折，我觉得，不论以后是否会再发生怎样波折，我认为我们以后为掩护各方面的活动，除了征信所资料室这个社会活动外，有必要利用



#### 第四篇 出狱后进行反帝、反封建和参加救国会斗争的经过

---

中国经济情报社资料室三年来所积累的经济剪报资料,另成立一个上海资料供应所作为后备。稍后,我和徐雪寒商量,他认为有必要,于是我们两个就向钱俊瑞、姜君辰反映以上意见。他们认为可以,不过至于什么时候成立要再加考虑,由你们去办理。



## 第十四章 西安事变发生后 我所遇到的几件事

西安事变自然是震动全国的一件大事，它近一周内有如何的周折，我们是难以从报上弄清眉目的，但社会各阶层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猜想。比如金则人和我得知后，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认为蒋介石这次会得到这样或那样的报复和处置。稍后，我们得到一些小道消息说，由延安党中央居中调解，他才可以释放回南京。当时，我们不很理解，后来我们才慢慢理解了其中的一些曲折的道理。下面，我仅按自己所遇到的五件事分别说明如下：

### 第一节 上海资料供应所的正式成立问题

上海经济资料供应所，是由我于西安事变后 1937 年 1 月设立的。我在这里将它扼要记述一下，我们成立资料供应所，把原先设在马浪路居民的一个堂屋内的资料室，迁移到蒲柏路耕余里靠马路的 1 号楼房下面。它直接朝马路，比原先的资料室约大 1 倍。不过对一个对外营业的资料供应所来说是很小的，在屋子外挂上一个招牌，屋子内 2/3 的地方摆放三四个木柜子和三四个办公人员的小座位（其中一位名叫蒋治，他是由朱楚辛同志介绍进来的，据说他在过去上海党中央机关领导下做过工作，认识罗章龙负责同志……）。外面的 1/3 放着一个长桌子，供借阅资料的人在桌面上阅览。我们因为很穷，我们只能这样布置场面，但是不明底细的人，以为我们资料室的楼上也是我们的（这时我是住在耕余里一家居民饭店楼上的一间小楼里，来去相互照顾也很便利）。这个供应所是 1937 年 1 月间成立的。用我的李百蒙名字，在申报右上角上登了一个数十字的广告。这个广告地位是很显著的，收费相当大。我们所以能登出这样的广告，是由于当时石西民同志已在申报馆当记者，由他设法向报馆商量而得到免费刊登的照顾。由于上述等



等关系,供应所成立后直到“七·七”事变后供应所还有些服务,收入足以维持门面,掩护我们的工作。我记得由王纪华向我介绍说:“有位朋友名叫胡乔木,他是太平洋学会会员来作些调查,想向我了解情报社资料室是如何收集全国报纸的经济资料的,并请他代为约我到租界拉费特路的夜景下会见。”王介绍后就离开,我向他说明,我们是如何得以收集全国报纸的资料和写救国宣传文章的等等,只向他表示以后请多指教。我当时不知道太平洋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也不便相问,我感觉到这位新交是很有学问的。大概过了近一个多月,这位新交曾亲自到供应所,拿着借阅证来借阅资料。当我从供应所后门进办公室时,他已准备拿资料要走,主要是因为有好几个人在旁,我就失去同他谈话的机会,哪知我随后问纪华时,方知他已离开上海,不知去向。因为我当时不识盐城口音,这些都是遗憾的事。

## 第二节 反省院院长来函约我去杭谈话

1937年3月初,我所写的《中日经济提携》发表在钱俊瑞主编的《黑白丛书》第二册中,引起社会上出版界的注意。这之后,杭州吉祥巷反省院长牟震西来信约我,有空时到杭州同他谈话。我当时认为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新形势下,暂且不去也可,立即去也可,不过我认为还是去为好。因为,我近几年在沪的活动张启国和姚士彦一定有报告给其特务上级,我随即将以上想法向徐雪寒、钱俊瑞同志商量。他俩同意我的想法,不过要周密考虑,谨慎对付。于是我就于3月11日(星期六)晚上,乘火车回到杭州,住在父亲的家中。

第二天上午,即前往反省院接待室外,有一位办事人员前来问我看什么人,办什么事,我就把来意扼要相告。他离开接待室不久就带我去见管理院内教务的负责人娄子匡。娄对我前去有点意外,他说:“牟院长有事,请你下午前去省党部谈话。”

我下午到省党部时接待我的仍然是娄子匡,他说牟院长还有事在身。于是,他就一面带我到另一个办公室。另一方面就介绍一位管人事的科长同我认识。他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他看了我最近发表的《中日经济提携》,觉得收入资料很多,内容充实。接着,他又问我对目前的时局有何看法,我说:





“我是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对汪精卫行政院长对日的外交政策是不满意的。”接着他又说:“目前舆论界有以下看法,即西安事变延安方面会另有图谋。”我说:“对这样的大问题和复杂问题我是会重视的,请放心。”然后,他又把话头转向,问我平时常一起写文章的朋友有哪几位,文章常发表在哪些刊物,我说:“有姜君辰、钱俊瑞、薛暮桥等几位朋友,文章大都发表在《中华日报》、《中国农村月刊》、《申报副刊》、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刊物等。”他说:“我们想常常看到这些作家和发表他们作品的刊物。”希望我把这些作者和这些刊物的名称写个纸条。我觉得难以推脱,也无须推脱,也就写了一个纸条。最后,他对我说:“今天晚上请你吃饭,明天陪你去西湖玩玩。”我说:“谢谢。”并相告:“我家中已备好了晚餐与弟妹共乐。同时,我因为有工作在身,已托家中为我买好回上海的车票,使我明天可以到中国征信所上班。我希望你有空到上海时,我会请你们玩玩大世界。”于是,我就向他们告别,乘上省党部门外的黄包车安全地回到家中。当晚平安地回到了上海,继续工作。

### 第三节 我在上海与施复亮(原名施存统)的初次相见

第二天上午,我除照常到征信所上班外,主要是注意报刊方面有什么新反应以及职教方面有何工作布置。下班后,我即前往姜君辰家中,向他汇报我这次去杭州反省院前后谈话的详细经过。他听后说,这次前去对付一下,是比不去为好。同时他还告诉我,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蒋介石不得被迫地相应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过去近10年来流亡到日本、香港等地去的民主爱国人士有一些已回到上海想为抗战救国做些事,他们或者已参加救国会,或者参加救国团体所召集的临时座谈会。姜还对我说:“你以后有空要去听听上述座谈会有什么应注意的反应。”

大概是3月下旬初的一天,我到大世界附近一个中等餐馆楼上的会议室里,去参加文教救国会团体会议,到会人数约30人,年龄约40岁到50岁,谈话会约开了50分钟。

我对谈话会是从头听到尾的,觉得其中一个年约40岁的先生发言虽短,但感染力相当大,他扼要讲到:会上议论到时局变化的次数相当多,有些讲



得很好。可能有一二个发言,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恕我直说,是否含有国家主义的倾向。他自己讲到近8年多来只读了一些历史书,本是来向大家学习的。散会后,我打听到这位发言人名叫施复亮,大概是浙江浦江口音。当天晚上我就将谈话会的概况告诉姜君辰同志。他听了之后,认为我说的情况很有用,要我最近时期内多注意一下这方面的动态。

相隔约一周,姜君辰告诉我,施复亮原名施存统,并约我当晚8点钟到他家中谈话,地点是在法租界的法国公园附近的一座中等的二层洋房。姜领我进大门后就扣门,施先生就来开门,他一面引我们进会客室内,一面说他有一个客人就要谈完话了,你们在旁坐一下。于是,我们就在会客室内的空椅上休息。过了片刻,那位客人就向施先生告别。

接着,姜就将我的姓名和中国征信所资料室主任的职务关系介绍给他。主人表示欢迎,然后,君辰就按所约的需要,将中华日报所出版的中国经济情报周刊以及情报的稿源问题,少数编写同志以及有何困难等问题较详细地一一相告,稍后,施先生还顺带问我在中国征信所的工作情况。我也一一相告,这次谈话就到此为止。

出门后,君辰告诉我——那位先来谈话和先退出的较高个子是一位大文学家,名叫冯雪峰。

又过了一周,施先生于晚饭前约我到他家中谈谈上海经济资料供应所的情况和有无困难问题,我即按时前往。他带我进他的餐室,吃点家常便饭,这反映出他平时的日常生活是简朴的,我大致就按前面第13章第5节所写的情节(除了有关胡乔木和蒋治)一一相告。并表示供应所虽然是一个穷小的机构,但能自己维持下去,对外有相当的影响。施听了以后,称赞我们苦干得有成绩,希望对社会更能影响。我表示谢谢。接着,施先生还说到我听你的口音是浙江同乡,你在上海各救国会里是否有浦江口音人的知己。我答说:“有,参加文救工作的朱楚辛老友,另一位是现在申报当记者的石西民老友。”当天,我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

这以后,不知道他是否找过浦江老乡谈话,我没有再同他来往来往,不知他是否已去汉口或去别的地方。经过一个月同施先生的三次接触,我认为他是一位反帝反封建和不满蒋介石统治,并寄希望于我党的革命进步人士。



## 第四节 郭沫若经过 10 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上海

这里我先扼要介绍一点 10 年前的往事。

记得我在浙江商专中学读书时，只看了一点郭沫若先生的一些小说，略知他是上海创造社的社长。到我 1927 年 5 月间流亡到武汉时，才知道郭沫若先生是北伐军总政治部的副主任之一，当时我住在总政招待所里等候分配工作。一天晚上，招待所通知我们到附近的一个空广场上听郭沫若的报告，因为在晚间开会灯光阴暗，坐的距离又较远，所以只闻其声，看不见其人。但当时他那激昂的声音，报告的内容鼓动力很大，我们备受鼓舞，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郭沫若时的印象。在这之后不久，我被分配到许昌工作。总政治部分配我在组织科民运股任股员，随部队到了郑州，我们同总政治部的领导住在一个很大的院子里，我们当时的心情很兴奋。有一天清晨我在院内随便散步，走到大院的一个小庭院门前，看到一个人趿着拖鞋，穿着一条短裤和一件便上衣，在若有所思地来回散步，我认出他就是郭沫若副主任。

住郑州的日子不多，总政治科得到通知，暂不过黄河而回武汉，在回武汉的途中，传达了邓寅达主任的信，他说：“我暂离你们去西北一下，不久我会回来的。”这时我意识到，武汉政局可能变化，并联想到郭副主任那天清晨在院内散步时若有所思的神情可能与此有关。

大约 6、7 月间回武汉后，见到党代表周邦彩股长告诉我，汪精卫的亲信陈公博来接替邓寅达为代理主任，并说要把政治部及其所属的青年干部编成一个教导总队，由季方任参谋长兼总队负责人，附属中央军政学校。你是不是去参加教导总队受军政训练。我当即接收了他的指引，参加了军训。七月底前几日得到通知去武昌郊外大广场听报告，这次是由新编国民军第四方面军张发奎司令召开，由党代表郭沫若报告，动员东征（我们队的队员大部分都已经知道，第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是贺龙、叶挺所率领的精锐主力，东征实际就是南下，回到广州重建革命根据地），讨伐蒋介石，保住革命成果。这是我第三次接触到郭沫若先生。

动员会不久，教导总队奉命坐船离开武汉到九江，上岸时，看到街道墙壁上已贴满了红绿标语，祝贺南昌起义胜利，傍晚宿营后第四方面军副司令



黄琪翔通知教导总队到一个学校前的空地上集合，下令缴枪，虽然第二天又将枪发还给我们，当时我意识到军内又有不妙的变化，我则决定开了小差离开九江，准备筹点路费去广州找总政，后改为在杭州加入共青团参加地下工作。

当时，郭沫若党代表随张发奎东征部队向我们作动员报告之后，一到九江（8月2日）已赶不上在南昌举行“八一”起义的贺龙、叶挺等，他自然了解政治形势不妙，就立即设法流亡日本，过苦难生活达10年之久（附记——不久张发奎也流亡日本）。

郭沫若老前辈如何从日本回到祖国，我没有听到什么小道消息，但不难推知南京政府迫于当时的形势的变化，不得不请这位老人回国。他回到上海后，除各界救国会举行隆重的欢迎会外，南市市政府特推潘公展副市长（国民党 C. C 派头目之一）为代表，在南市北门一个大会场里召开热烈欢迎郭老的大会。大会场里挤了400—500人，我当时是上海职业救国会理事成员之一，也先赶到参加。第一次看到南市副市长潘公展走上主席台，讲了表示欢迎的话之后，就恭请郭沫若先生讲话。流亡日本的坎坷艰难的岁月，使郭沫若老先生比10年前更衰老得多，但是他讲话的声气和精神仍如往年，对他的长篇激情的演说，至今我记忆犹新。他讲话的大意是：10多年前的北伐中途出有差错，这已是往事。当前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武装侵略，一步步扩大，国难当头，所幸国共两党合作，上下军民亦携起手来为救亡图存。在这次更艰巨的抗日战车上，总驾驶手如有一些偏差，我们要以国家民族为重，上去搀扶一把，我这次从日本兼程返回祖国，也想尽一点绵薄之力。这段话，引起全场掌声雷动，坐在主席台上的潘公展也举手鼓掌。

会后，我得知这个大会场是陶行知先生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的总课堂。两年前我随同钱俊瑞、孙冶方按方与岩中农会会员的安排，到他任教的南市补习学校里开座谈会，也有可能是上述职业学校的一个部分。

大概过了一天或两天，王纪华同志告诉我，上海海关总俱乐部负责人，已邀请郭沫若老先生到海关总俱乐部的一个客厅里，向他表示热诚的欢迎。到会总人数约30~40人，都是高级职员，其中也有几位职救会的代表，我是其中之一。王对我说：“海关俱乐部采用十几个圆桌围坐的形式，上方有个方桌，请郭老正坐，你坐在旁边，一方面作为贵宾之一，另一方面受大会主席



委托照顾郭老。”最后,王还要我见机对郭做点工作。

次日上午,纪华同志就带我到会场与主持欢迎会的主席相见,我就坐在方桌旁的座位上等候。不久,欢迎会主席就迎接郭老到方桌旁座位上就座,就将我向郭老做了介绍。接着,大会主席就宣布开会。一是向到会的同志传达郭老在南市北门所作的那一番重要指示。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实行。二是回国几天内不知劳困,开了几个欢迎会,特别是今天又不嫌我们是个小团体,亲自前来做指示,我们要热烈欢迎。这时郭老就起立扶桌,讲一段短话,赞扬了海关总俱乐部为抗日救亡做了许多工作,希望以后不断努力,全场又鼓起了热烈的掌声。

最后,当大会主席迈步前来准备欢送郭老的时候,我趁机靠近郭老的耳朵,向他简单说起10年前我曾在武昌郊外大空场上总政教导团队内,恭听他向大会作“东征”的动员报告,我希望以后能有类似的机会。他若有所思地说“总会有机会的”。

过了几天,郭老就到武汉做新的战斗准备。

## 第五节 宋庆龄带头发起自愿入狱签名的抗议

大概是1937年6月下旬,姜君辰同志转告我,孙夫人认为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应该由她带头发动各界有职业的社会人士签名入狱,现在正在起草一个状子,向苏州高等法院提出申诉和抗议。过了一两天,胡愈之先生在上海的一家大饭店里通知救国理事代表,孙夫人带头发起自愿入狱的签名运动已做好准备,大家可做规定范围内的动员,有些人(我也在内)就当场签了名。

7月初的一天,姜君辰同志又来通知我:明天,苏州高等法院要公开审判七君子,要我明天做两手准备。一是明晨写好状纸他就送来给我,我就立即乘从上海到苏州的火车,赶到苏州法院收发室外,做点政治工作,请他们立即把状纸呈送给法庭上的主审法官。二是抗议的状纸要迟一点,才能交给我,我就要先雇好一辆出租的小汽车,对司机同志做点政治工作,在火车到站前赶到苏州把状纸送到法院;还告诉我新闻报馆的名记者陆诒已先一天去苏州做准备,要我赶到法院时就同他互相取得联系。”于是,我就做了两手



准备,主要是立即找供应所隔壁的临时出租汽车站,请对方派好汽车和熟练的司机师傅。我第二天早饭后,先于火车赶到苏州,我当时就顺利地回到上海,上海各救国会和进步人士则仍接着设法施展压力,促使南京政府尽数释放“七君子”。我于1996年写的一篇文章附录如下:

### 孙夫人发起自愿入狱运动

60年前的往事——自愿入狱签名运动,在我的脑海里,还留下大概的记忆。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全国各界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分别被国民党逮捕送往苏州监狱关押。这一事件,不仅轰动了全上海,还震惊了全中国,社会各界对国民党的反动行为议论纷纷,难道抗日救亡还有罪吗?而且国民党凭空关押了“七君子”达几个月之久,社会上更有责难。与上案同时,蒋介石又亲临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加紧讨伐延安。这些就是国民党反动派所称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实质,引起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不满,造成“双十二”西安事变。幸亏共产党居中调解才得和平解决,但当时国民党内何应钦等亲日极右派还是另有图谋的。以上情节在60年前是有传闻的,本文有叙述一下的必要。

1937年7月初的一天,孙夫人闻知苏州法院即将开庭审问“七君子”案件,即约胡愈之先生商量,由她带头发起自愿入狱签名运动。于是胡愈之先生在上海南京路上的一个大茶楼房间里,召集救国会的代表,布置“自愿入狱签名运动”的事宜。我代表职业界救国会理事会出席,我个人在会上签了名。

苏州要开庭审问“七君子”的前一天,救国会的姜君辰同志对我说:“骆耕漠同志,今天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明天苏州开审前,一定要设法将状纸送到苏州法院收发室。而现在状纸还未写好,你明天要作好两手准备,如果状纸能按时交给你送去,你就乘火车到苏州,如果来不及,那你就自雇一辆汽车走,并一定要赶在火车前到达。”

当日上午,我耐心地等待着。火车已开走了,状纸还未送到,我就到住处弄堂口的出租汽车站预订了一辆车,不久,状纸送到了,我立刻就坐上汽车驰向苏州。



一路上,我对司机做了些政治工作,请他帮助一定要赶在火车进站前到达。司机一口承诺,加速行车,我们终于先到了火车站。我向司机表示了深深的感谢!

我利用间隙,一方面雇好一辆去法院的三轮车,另一方面买了一张站台票,我进站恭候着孙夫人的到来。

孙夫人下车时,撑开了她带来的一把阳伞,这时月台前已经有许多记者(一部分记者是从上海乘火车赶来的,另一部分是苏州当地记者)。他们都拿着照相机在抢镜头,给孙夫人拍照,这时孙夫人在随意地对着相机挪动阳伞,以免报纸上都登出她的照片。我看到孙夫人下车时的以上情景之后,因任务在身,我就走出站台,坐上预订好的三轮车迅速地到达了法院。在法院旁边的收发室,我向值班收发人说:“我是受救国会的委派呈递状纸的,有劳帮助立即把状纸直送法庭。”他满口答应,并开给我收到状纸的收条之后,他立即就去送状纸了。

接着,我就按在上海的约定到法院检察官接待室找陆诒(上海《新闻报》的名记者)。

在我去接待室的路上? 隐隐约约听到沈钧儒先生时断时续的答辩声,我现在还记得他说的一句话:“难道抗日救国也有罪吗?”

转瞬间我就到了接待室,见到了陆诒和另三位记者。这间接待室并不大。但当天是我们与法院对垒的地方。接待室被一屏风隔成前后部分,都各有一门,前面用作接待室,我和陆诒等为保证孙夫人的安全,就都自动担负起警卫任务,注视着前后门口来人。后面用作休息室,里面放了三张沙发,两个沙发背靠着屏风,孙夫人坐在靠近后门的沙发上,胡先生坐在孙夫人旁边的沙发上。孙夫人和胡先生已在那儿坐等了一个多小时。约下午四点左右,有位检察官从后门进入,他仓促入座,他故意侧身向胡先生打招呼说:“你们递的状纸关系重大,我们做不了主,待向上级请示后方能回答,你们暂且回去……。”胡先生说:“此次我们到苏州,是为全国各界救国会向法院提出申诉,希望今天会有答复,我们可以在此等待。”这位检察官就含糊其词地退出去了(以上是我还记得的大意)。

我们在孙夫人的带领下,仍然坚持坐等答复。审问结束了,约五点左右,法院的工作人员前来说,刚接到张一麐、李根源两位老先生(他俩在同盟



#### 第四篇 出狱后进行反帝、反封建和参加救国会斗争的经过

会时就追随孙中山革命活动)的电话,说他们不知道孙夫人和胡愈之先生来到苏州,真对不起,现在二老派专车来接孙夫人和胡愈之先生,到已安排好的地方先休息一下。他们两位被接走后,我们方才离开。我当晚即返回了上海。

西安事变的发生、孙夫人的多次出面交涉以及各界救国会的声援,使国民政府不得不于7月31日将沈钧儒等“七君子”释放。

这一往事,如今回忆起来,真令人感叹!胜利总是属于正义的一方。





## 第十五章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上海的新武装抗日战斗及其演化

1937年7月7日晚,在北平西南郊外卢沟桥附近,日本侵略军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通称“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在上海方面,我跟随各救国会团体所接触到的变化情况是,日寇为侵占大上海在“七七”事变前已在长江口外,由海军陆战队做准备,特别是在闸北宝汕有别动队骚扰,这时就立即猖獗起来。南京政府对保卫大上海是不会轻易派出其嫡系主力的一兵一卒来应战的,而是利用临时新编凑起来的义勇救国队到上海去对付。因此,像张发奎、蔡廷锴过去同蒋介石有矛盾的将军,就把他们的老部下组织起来,开到上海前线与日寇作战,老百姓和救国会都热烈欢迎和加以支持。我按我自己记忆的情节分两节来回忆。

### 第一节 张发奎、蔡廷锴部队在上海宝汕、闸北和沪西铁路外大片战场上英勇作战

蔡廷锴将军所率领的军队是针对闸北、宝汕一带的日寇,对方虽然兵占优势,但我们深得民心,仍能英勇作战。后来蔡廷锴将军主要依靠一个团的主力坚持苏州河北一个大仓库的有利地形坚持抵抗。日寇向他们炮击。他们的人就由上而下射击和投手榴弹,他们坚守阵地达10多天。在这期间,上海各救国会团体和老百姓纷纷送饭送菜到阵地去。同时,抢救伤员到附近医院治疗,这种场面当时全上海都传闻知道,受到他们的极大教育。

当时张发奎将军率领将士保卫上海抗击进犯日寇。他的驻地是在上海铁路的外围一大片长江三角洲富饶的地段上,其中的一个要害是跨越淞江的沪杭铁路大铁桥;另一个要害是苏南的太湖和湖附近的湖州市。当时,原



在中华书店当总编的钱一石先生,已离职前来担任张发奎随军政工队的总负责人,同上海各救国会和社会进步人士保持联系。我记得上海英租界有个煤业工会,它是各实业工会中最有财力者之一,较关心保家卫国的事情。在煤业工会内我有两个熟人一个叫杨梦燕,一个叫陈昌吉。他们告诉我煤业工会常随从上海救国会组织爱国青年到西站外的驻军做些慰问、医疗服务工作。这表明张发奎部队是很得民心的,同时我是因此而得知钱一石革命前辈与张发奎有密切的关系。

与此同时,我还知道:陶行知先生原在南京郊外所创立的小庄师范学校的师生员工,有的在上海参加救国会运动。有一天大概是文教界和妇女界救国会代表在一个小会场里,一个代表向大家宣告郊外抗战的伤病员比较多,要大家回去分头组织医疗队去抢救。我代表职救会,当时也在坐听讲。当时,我只知道他名叫张劲夫,很推崇小庄师范的教学精神,他当天的动员传达报告很有动员力量,听众都很称道。

## 第二节 从简补记一下“八·一三”淞沪大会战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第469页中写道:

1937年8月13日开始的中国军民在上海地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战争,又称“八·一三”上海事变。同年7月29日,日本参谋本部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大纲》中就规定,要“以一部兵力在青岛、上海附近作战”。为此,日军撤退和转移侨民,调动军队,迅速完成了进攻上海的准备工。8月9日,日军特别陆战队第一中队大山勇夫中尉等企图强行闯入虹桥机场侦察情况,被中国警卫部队击毙。为此,日方向中国提了向日方道歉、处罚当事者、撤退停战协定以外的中国保安队、正规军和防御设施,否则,将诉诸武力。11日,日本国内派遣的海军陆战队到达上海。与此同时,中国也向上海增兵,加强吴淞和江湾一带的防务。8月13日上午,日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驻闸北八字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同时,炮击上海市区。中国守军在闸北一带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在各个阵地展开全面防御作战,辅之以局部出击,阻敌于闸北、江湾、杨树浦等阵地之外,“八·一



三”上海抗战爆发。8月14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声称要对中国政府和军队“采取断然措施”。同时在全国抗日怒潮推动下，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15日，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自任陆海军总司令，并将全国划分为四个战区：平汉、津浦路以西为第一战区，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晋察绥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江浙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闽粤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15日，日本以天皇的名义，下达了编组中国上海派遣军的命令，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以第三、第十一师团为基干，组成上海派遣军，迅速派往上海，协同海军作战。17日，日本政府决定放弃所谓“不扩大”的方针，向中国发动全面军事进攻。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上海工人阶级和各界爱国群众纷纷行动起来，展开宣传、募捐、慰劳前线士兵等抗日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上海办事处，组织革命青年，成立了三个战地服务团，负责宣传、救护工作。全国各地爱国群众组成了声援上海抗战的各种抗日救国组织，以不同方式支持上海抗战。从此，全国掀起了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怒潮，中国革命进入了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我1937年在上海参加各界救国会时，是完全不知道“八·一三”淞沪大会战的本身内容，而张发奎、蔡廷锴部队机构自然知道该做什么样的布署和具体行动，上海各界救国会成员也会从而得到一些新情况。

我记得，大概是1937年8月上旬末，英法租界靠大世界和跑马厅的交界处发生一架飞机落下一颗炸弹的惊人大事。当时，我正在资料供应所门前，自然不知其究竟，稍后即得知这架飞机并非敌机，而是驻在西火车站外的我军战斗机，因到长江口处的近海滨上袭击日寇而受创，机上还带有几颗炸弹，因为嫌重了一点而影响飞速，因此万不得已需要在上海市的围城中卸下一颗炸弹，才能按时回到驻地。于是驾驶员选择在跑马厅上的大空地上卸这颗炸弹，因为它凑巧落到跑马厅空地上马路边的几棵树枝上，只砸了所停的小汽车和伤了几个行人。至于靠近的一带居民和行人自然受了非常大的惊慌，对上述偶发情节，上海老百姓仍称赞我军战斗机和驾驶员是英勇抗战的，并加以理解。

从张发奎部队驻地起飞，到长江口外去作战的海军陆战队是“八一三淞



沪大会战”的开始。由于上海城市的形势紧张化,各界人士各自考虑到下一步该做什么样的相应准备问题,主要由同济大学、暨南大学等准备向西南大后方迁移;一些富裕家庭迁回他们僻静的老家,稍后,例如我们的新知书店准备迁移到汉口去开业;中国农村研究会和中国农村月刊编辑部,先由暮桥带几个同志,从上海北站乘火车,到杭州后即改乘浙赣铁路到南昌去筹备会址和出版月刊的工作。到8、9月间中国农村月刊社其他工作人员从上海到南昌时,是到上海西站乘火车到杭州,转乘浙赣路到南昌(因为这时淞江火车站跨淞江河的火车路轨和桥基已被拆毁)。然后,文教界和救国会人士,如我所熟悉的中国经济情报社钱俊瑞、姜君辰以及徐步、刘良模的歌咏队都先后转移到武汉,大家都是为了开辟新的战场。张发奎的随军政工队是通过太湖旁的湖州城和杭州市,一直转到浙赣路靠近江西的衢州县城。

我对金则人一家是很记挂的,问他一家将如何,他说:“我们还在考虑,以后必要时,你我再设法联系。”

### 第三节 我参加组织浙江旅沪 同乡回乡服务团的经过

下面,我着重说一下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的成立。我和留下来的上海经济资料供应所的同仁,从徐洁身老友那里得知,徐在杭州东南日报馆印刷间有了可靠关系,于是我和所外的何绍章就倾向于回浙江工作。于是我就同职救会的两位理事王纪华和李少甫交换意见。王纪华说,他家在上海,目前不会离沪,你到浙江、上海,如有难民流亡到宁波一带就可得到帮助。李少甫还具体说,他在杭州闸口和绍兴有开火柴厂的老朋友,必要时他可提供帮助。

到11月初,潘念之老同志向我说起,北伐革命军打到浙江时,被推选为第一任省长的褚辅成老先生认为上海很快将会沦为孤岛,如他不设法离开会被日寇欺凌的,可能出现要他充当上海市伪维持会长的危险。因此,他想参加发起组织一个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潘有协助褚老一下的意思。问我的看法,我想了一下就向潘表示,愿随他一起协助褚老做点筹备工作。同时,我还认为有了这样的回乡服务团组织,对浙江的发展是有很大帮助



的。于是，我一面决定回浙江，一面尽力同潘一起做筹备工作。

其中有两件事，其一是把上海资料供应所收了摊子，即把资料室内4年来的剪报资料搬到耕余里那饭店楼上我住的那间小前屋里，封存在资料架上。工作人员只剩四个，两个去武汉，一个留在上海家中，还有一个就是蒋治，我帮他一点路费提早回浙江甬江县老家。供应所的招牌是在十一月底卸下的，同时，另一件事是协助褚老组织成立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因为潘对我说，他不易回浙江，决定于必要时去武汉，要我多做一点筹备工作。我一直记得清的有以下二点。

一、褚老要我们起草一个发起的文稿，除他为发起人外，并由他邀请潘公展为副发起人；另外，他还让我们在筹备中动员几个想回浙江的同志加入到我们的行列（未来得及做到）。

二、褚老告诉我们说，他在温州特别是在丽水、缙云、永康一带有些老朋友可以推进保家爱国运动。他还讲到，丽水有个遂昌火柴公司老板会，在经济上给他帮助，所以他决定从上海坐船到温州。随后，我还将於潜老家的通信处告诉褚，并互相约定褚老先到遂昌火柴公司就先写信给我，我先到老家就先写信给丽水遂昌火柴公司。

我一并做完以上事情，已经12月底，上海英法租界已经成为日寇控制下的孤岛。沪、杭铁路已不通车，我只能乘英商轮船经长江口，先到海门码头上岸，改乘用一个小轮渡拖的一长条小木船经如皋到泰州县。第二天早晨，又到长江口岸码头乘坐那边有关英商等候着的大轮船（因为当时设在江阴附近的我军炮台，已禁止江阴南北两岸间的通道行任何轮船），开往南京码头时方知已停止靠岸（我本拟定再次上岸后乘长途汽车到杭州）。于是，我只好改道九江上岸，旅客人数不多，这时火车已停止运行。这时有少数旅客要到南昌，车站利用平时使用的工作车（它近10平方米，用半人力在轨道上推，没有车篷，用来检查路轨）把旅客逐站送到南昌。我到南昌后因为所带的一箱重书，无力再携带。同时已得知，南昌有一家银行暂设的信托部附有一个为旅客短期寄存行李的小仓库，我就将那一箱书委托暂时保管。然后，我先到暮桥的中国农村月刊办事处休息一阵，并告诉暮桥说：我这次绕道杭州后，先与徐洁身老难友（狱内名叫徐天人）接上头，接着就用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的名义开展抗战救国的工作，以后我还会同他通信联系。说完



#### 第四篇 出狱后进行反帝、反封建和参加救国会斗争的经过

---

后,我即乘浙赣铁路火车回到杭州。但到杭州时,洁身同志已跟随东南日报馆印刷厂迁移到金华,我就改乘杭州至余杭的小木板客船到余杭,再步行回到老家於潜县潜杨镇。



## 第十六章 在浙江丽水参加 抗战救亡工作

我在於潜县老家，逗留了10天上下。在这期间，我先从於潜上层人士那里得知，黄绍竑奉命第二次到浙江任省政府主席，并正在商议颁布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另外收到两封来信：一是张锡昌函告，刘端生、伍廷飏已随黄绍竑到达浙江金华；二是褚辅成老先生告诉我，在上海发起成立的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已到丽水，现正与遂昌火柴公司老板郑楚成商定回乡服务团在丽水的住房问题，要我即去丽水。

我随即绕道，于1938年2月2日到达金华。第二天，我去寻找东南日报馆徐洁身老友。

我找到洁身后，他就叫我搬到他家附近的空房子里住，我就把组织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以及我要去丽水之事告诉了他。他说：“你去丽水不用买票，搭报馆的车即可。”同时他还介绍一位来自北平的朋友（他名叫张贵卿）与我谈话。这位朋友问我，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是什么机关团体，我都一一相告。我对洁身说：“这位是个好朋友。”他点点头，下午，洁身来告诉我，明天有车到丽水，要我做好准备。

接着，我告诉洁身说：“浙江有一藤箱书籍，暂时寄存在南昌一家银行的信托部所附设的仓库，不知你是否能托便人帮我去取回来。”洁身就说，他自己过两天就有事到南昌，能很快为我取出带回。于是，我就把存书的凭证交给他。然后，我又向洁身打招呼说：“我这次到丽水后，可能比在沪的设想方便一些，因此，请你多打听一下永康县的老难友（如童友三、姜挺、余坚等）的政治情况，以便互相联系。”



## 第一节 1938年2月至3月的斗争

1938年2月4日上午,我即乘东南日报运货汽车到丽水城。随即,去找浙江建设厅会见正在筹备战时物产调整处的张锡昌、刘端生两位同志。向他们俩谈了经过金华时与徐洁身老友交谈的情况,并说明我这次来丽水是按照浙江褚辅成的嘱咐,向遂昌火柴公司老板郑楚成商量,把两座仓库房子布置成为回乡服务团的办事处。他们也告诉我,战时物产调整处的筹备已有眉目,派往龙泉等县的新县长和随行的干部即将去上任,协助省建设厅伍廷颺筹备以上事宜人之一是冯紫岗。冯是中国农村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他知道你的来由后,一定会很高兴,并会请你到物产调整处工作,可住在物产调整处,以便互相帮助工作。他俩并派一个助手陪我去看望遂昌火柴公司的老板郑楚成先生。郑楚成先生告诉我,他已经答应褚辅成老先生腾出两栋仓库的空房,供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使用。该房屋在丽水城外长途车站的附近,交通方便也比较僻静,只要稍许准备就可挂出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办事处的牌子。这样,下午办事处就有了一点眉目。不久,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办事处正式成立。

我随即与张、刘两位同志商量好,出一个8页或12页的《动员周刊》,由市内商务印书馆代销处帮助在市内发行。经过两天的努力,第一期《动员周刊》就同市民见面了。宣传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丽水办事处以及抗日救国的几篇短文章,引起了全市的注意。这时,王绍云的随身秘书严北溟也为《动员周刊》写点短文,对我们很有帮助。

由于我有了视察员工作职务关系(可以到各县视察工作和下去调查时可利用机关小汽车交通工具),有时可以一天办两天的事。我就于2月6日早晨到永康去看望褚老,向他汇报工作,他听了很高兴,鼓励我加紧干。随即我抓紧时间就到金华看洁身同志。他已把我那箱书籍取回交给我,并告诉我一些有关浙赣路时局形势的小道消息。我在金华的一家店铺里准备买些糕点带回丽水时,碰巧与来金华购买制作火柴原料的钟鼎祥老难友(详见本书第三篇第十四章)相遇。我简要告诉他,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已在丽水挂牌办公,希望他前来参加。他很高兴,满口答应。我即乘车于当晚回





到丽水的战时物产调整处。

第二天,原定到遂昌、龙泉、云和、瑞安四县调查的同志就可出发。这时,俞坚老难友在去龙泉负责政工队工作的途中来看我,并带来洁身同志的口信,说我有什么事可就近托他去代办。我说:“知道。”又顺便告诉他说,“我有一个小弟弟名叫丁浩,已随刘保罗集团前往龙泉,请你多指导。”

下午,冯紫岗来通知我,要我准备出差到武汉,代表物产调整处向有关部门商量有关茶叶、桐油、猪鬃等物产的出口的事宜。我同张锡昌、刘端生两位同志商量,想到武汉动员一批准备到延安的青年学生到浙南来工作。这时,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主任吴毓来回乡服务团办事处找我,询问回乡服务团的情况。我如实相告,并希望他以后多加指教。次日一早,他来告诉我说:“省委刘英同志听说你利用出差机会,把要去延安的同志动员到浙江丽水来工作;他已与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联系过了,请他们帮助你解决以上问题。你到汉口后即可直接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他们会积极帮助你的。”

大概是1938年2月10号前后,我先到金华乘上浙赣铁路火车抵达长沙(当时暮桥已经迁到长沙市内),就顺便下车到他的住处住了一夜,知道月刊的发行量比在南昌时大有增加。第二天,我就乘湘汉铁路到汉口,住在新知书店招待室内,我一面代表战时物产调整处,向全国有关茶叶出口总公司商谈好浙江茶叶、桐油、猪鬃等物产的出口问题;一面到八路军办事处接待室说明来意,加上潘念之老友在汉口帮助,在一家报纸上刊登一则“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的启事”,欢迎在汉口的浙江青年回乡为抗战服务。这样,在近一周内,动员50多个想去延安的进步青年转到浙南新战线上来,由潘念之同志负责拟订谁先谁后走和按何路线到浙江丽水;潘还临时商定由一位年约二十五六岁,名叫古柏的江苏无锡人,来带路到丽水,由回乡服务团统一接待;并议定分两批分散到达。当时,潘还介绍古柏同志同我见面。

我这次在汉口期间还抓紧时间做了以下事情:1、有一天上午,在一大旅馆会议室里举行中外学生代表宣传性的招待会(我也得到机会参加),除听到我党长江局代表博谷同志讲话外,还趁机向到会的潘公展先生为《动员周刊》募了100元捐款。另外,我还向在路上相遇的史良、胡子婴、沈兹九三位女士为《动员周刊》募了捐款。随后,我抽空去看已在武昌的徐步同志,他当时已参加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陈诚为政治部主任)工作,因而已穿



上一套黄呢子的中山新军装,很神气的样子,我们都互相好笑起来,因为谈话时间有限,我们简叙了别后的经过。他带我去看望了一下杨翰笙同志,因为三厅机关当时设在武昌一个斜山坡的密林下名叫昙花林。这些都是值得纪念的事。最后,我同徐雪寒同志还相谈了一下两件事:我说这次想从新知书店带回一部分书籍,到浙江丽水办一个战时书刊供应区,满足丽水城内市民的迫切需要,但不挂新知书店的招牌,雪寒同志完全同意。第二天早饭前后,他就把书送到从汉口开到九江的船上交给我。2、雪寒还告诉我,新知书店搬到汉口后,党组织多加照顾,印书数量增加。如果我们能设法在金华、丽水租到适合开设新知书店分店的小屋平房,他就可以设法在三月初派朱执成同志等带一批书刊运到金华火车站,开设分店。我听了很高兴,表示他要我办的事我一定能做到。

这样,我就牢牢记住回到金华丽水后,要在二月下旬、三月上旬期间,同时做以下两方面的事情:

#### 第一方面的任务——在金华和丽水成立新知书店的分店。

第二天,雪寒派一位同志送我到汉口江边开往九江的轮船旁,并把几箱子书刊搬上轮船。我两天后就又乘火车到南昌,到金华。下车后,前来接我的同志把我带回来的几箱子书刊搬到站外的专车上等我。前来接站的洁身同志接我到外边的小餐馆里,一边吃饭一边告诉我,雪寒将派两位同志(其中一位是朱执成)带一大批书刊,在本月底或下月初到达金华。在金华开设分店,必须设法在马路旁的小弄堂内租到三四间廉价的小平房,洁身他们可以办到。当天傍晚,我把书刊带回到丽水,搬进回乡服务团办事处的空房间内。

由于这时钟鼎祥同志已来丽水,蒋洽同志也由他的家乡来到丽水,暂时被安排住在办事处内,等我由汉口回来后分配他们的工作。我布置蒋洽同志利用推销《动员周刊》的关系,稍加扩大,作为战时的书刊临时推销处,使丽水的居民都能买到我从汉口带回来的一小部分书刊。全市居民争相购买,我十分高兴。

到三月初,朱执成等两位同志把他们所带的一大批书刊运到了金华火车站。洁身同志和一位名叫顾启的同志,到车站帮助把书刊运进新知书店金华分店的四间小平房的空店堂内。第二天,朱执成等两位同志就带着一



小部分书刊乘运货的大卡车到达丽水。这时,蒋治同志已经在丽水城内一条小街旁租到三四间平房,面朝街,租金还很便宜。蒋治同志请了几个临时工,一面把朱执成同志带来的书刊搬进安排好的店堂内,一面把战时书刊临时推销处的书刊全部搬过来。把两部分书刊分类摆在店堂内的书架上。第二天就在店堂内外挂出新知书店丽水分店的招牌,开始对外营业,来往行人都很注意,购买书刊的人日益增加,并向丽水附近各县区批发。开始时新知书店丽水分店由朱执成同志担任经理,蒋治同志担任副经理,到三月初后,朱执成同志要回到金华,届时新知书店金华分店正式挂牌营业,丽水分店就由蒋治同志担任经理,鼎祥同志帮助他办理书刊保管和调运的工作。

随后不久,我从严北溟那里得知,暂时留在衢州的随军(张发奎部队)政工队有一部分人员回到金华做社会政治宣传工作。于是,我就抽空前去访问。接见我的负责人名叫林柏修,我向他询问了钱一石老先生有关情况。他沉痛地告诉我说:钱老因去年在沪西外领队工作中过于紧张,过于疲劳而病故。我听了很难过。这时,他还介绍一位随军政工队的年轻同志,名叫林默涵,与我认识。我将我的姓名和在丽水的职务关系告诉林柏修队长,因为我当时有公事在身不能多待,只好相约以后有事、有机会再来向他们请教(附注:大概到16年后,即1954年,我当时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同时兼做一些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院长郭沫若同志兼做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主任,他推荐我为该学部的学部委员。记得有一天,我被邀请到中国科学院会议室里去参加学部委员一级的会议。在会上我碰见林柏修同志,这时我才知道林柏修是他的化名,原名是杜国庠——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刊《通讯》1992年11月第30期第34页。他是著名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和革命老同志)。

**第二方面的任务——协助50多名进步青年,立即走上浙南抗战救亡的工作岗位。**

大概是在1938年2月下旬和三月上旬期间,我要同时交叉做的第一件事,即我与锡昌、端生、王海叔等同志,要按照黄绍竑的浙江抗战纲领和战时物产调整处的工作安排,把进步青年尽快分配到浙南各县去做抗战救亡的工作。

第一批先后来到丽水回乡服务团办事处的青年同志,大约有30多名



(我现在还能记得的有古柏、曾涛、徐进、查民愈、杨源时等)。我和端生先向他们介绍浙南缙云、龙泉、云和、遂昌等县的新情况(例如,各县区宣传抗战救亡政工队员的情况,专门调查乡村经济情况的队员情况,供他们参考),随即就鼓励他们登上新的革命工作岗位。我记得古柏同志是在2月底被分配到云和县的。

第二批先后来到丽水回乡服务团办事处的青年同志有近20名,也是经过上述过程,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另外在3月初,还有浙江嘉兴一带的青年学生流亡到丽水,自愿参加丽水回乡服务团工作。我记得其中有一位带队的青年名叫史之华。我们向他们介绍了浙江的抗战救亡形势,以及浙西湖州临县、特别是安吉一带,广大的军民群众风起云涌的抗战情形,并鼓励他们去参加。在他们下定决心后,我们就用回乡服务团的名义和战时物产调整处的关系,决定由史之华带队,乘坐丽水到金华的长途汽车,然后按指定的路线到安吉县。他们在丽水城外乘车时,我亲自前往送别,并与史之华同志握手,约定以后有事可随时联系。

有一个晚上10点钟,我被通知到城外王大律师事务所去听报告。大约有50多位党员分别在楼上楼下听报告。其中大部分坐在楼下,我是其中之一。由于房内没有灯光,互相看不清。台上有人说:今晚省委派来一位同志作专题报告,大约一小时,不要做笔记,要保密,回去听候指示。当晚的报告我大约记得的内容有三点:1、关于浙江当前时局的变化,有一种认为,日寇将侵占宁波、大通,沿浙赣路到南昌;另一种是黄绍竑的看法,认为可坚守钱塘江南口宁绍一带,坚持以金华为全省的政治中心。2、浙江丽水等十几个县要作为浙江抗战的后方来建设,并将建设厅设在丽水;再设立一个浙江省战时物产调整处。这第二点意见是黄绍竑浙江政治纲要的要点之一。3、强调要我们好好学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我对最后的这一点特别注意,牢牢记住。

有一天,张锡昌通知我和刘端生一起到城内浙南特委的一个联络点,到联络点后,才知道是先前洁身介绍我认识的朋友张贵卿。他告诉我们俩人说:“今天,约你们两位前来就是要你们两位补办入党手续,重新填入党表格,各填两个介绍人。”于是,我就在表上填了两个介绍人:徐洁身和张锡昌。



最后,他对我们说:“你们都是老同志,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你们以后的党支部生活,就直接参加设在物产调整处内的特别支部,书记为汪海粟,其他工作仍与吴毓联系。”

还有一件事,需要在这里写一下:民办的浙江杭州地方银行在杭州撤退时,是从杭州撤到丽水市一条较偏的大路旁。我1931年间关到陆军监狱丙监时所相识的那位陈庆亨同志早我出狱,后在杭州地方银行工作。该行撤退时,他也随行撤到丽水。我得知后,就彼此有来往。虽然他当时政治活动不多,有时向我问问战时物产调整处的一般情况,他顺便讲到在丽水曾见到朱镜时,显出很深的感情(当时我在刘端生家中,是第一次知道朱镜在新四军东南局组织部担任负责工作)。

这次大会以后不久,刘英同志就让吴毓通知张锡昌、刘端生和我根据省委的决定,任命我们成立一个省委统战委员会,有事可同吴毓联系。同时吴还传达了刘英同志两条谈话的大意:1、黄绍竑在晋西南娘子关战役中,曾遭到日寇的包围,幸亏八路军及时从四面开枪相助,才得到解围。事后他来浙南办事时,还向周副主席请教如何抗战和打游击战的方法。所以,刘英同志要我们特别注意;2、对黄绍竑强行通过的战时政治纲领及我们统一战线法宝,我们要正确运用。

再者,对本章第一节,还另有一些往事,我分三条将它们记述如下:

1、大概是3月间,我得知褚老在做离浙去汉口的准备的消息,就立即前往永康探望。经褚老相告,我得知国民党上层人士借口他年老请他到武汉过安静的生活,他只能前去。但褚老很关怀回乡服务团工作,除了已经关照郑楚成老板把办事处的房子仍让我使用,另外他还对丽水之外的其他几个县的老知己、老同事做了关照,如我工作上遇到困难也可用他的名义同这些老前辈去商量。我表示感谢。同时,我向褚老表明,回乡服务团丽水办事处机关在他去汉口后,回乡服务团丽水办事处的名义就停止下来,他的工作则仍可设法进行下去,以后我如有机会再到汉口一定会到他府上汇报工作。

这天下午,我到了永康市内一个大中药铺子的一个老难友童友三那里(我从洁身老友那里知道他的地点)。他当年在狱中的表现是好的,相见后他扼要告诉我,为摆脱国民党的控制,就利用大中药铺子的主要批发业务做点事情。主要是自修阅读中国文史知识书籍,近几个月略知我在丽水办事



处工作的零星消息,他有一些想法,是否可以介绍他到黄绍竑新派县长的县里,先当个县政府文教科长或副科长,使他能为党贡献力量。我认为他说话态度认真诚恳,我答应他回丽水后再告诉他……

当晚我就向张锡昌、刘端生、汪海粟汇报与褚老谈话的情形;又将我在永康会见老难友童友三的谈话经过相告,并提出我的以下意见——即是否可以将他推荐给瑞安县的陆县长,让他在县教育科担任副科长或科长的职务。他们听后,锡昌表示可由他们向陆县长说明,这个意见是我提出的,在文教科里担任什么职务则请陆县长试用后决定。刘、汪两位同志也表示同意。这样我就通知老难友做准备,他是3月中旬去瑞安的。以后我得知他先任副科长,后即任科长。

大概3月下旬末,童友三老同志从遂昌来看我,他除了简单向我反映他的工作很顺利,特别是陆县长分配他任教育科长的情况之外,主要是向我提出以下问题:他昨天向县府内党支部提出解决党籍问题,对方要他接着努力工作争取入党。至于过去已经入过党的党龄,按当前的情形一般都要按重新入党来计算,待以后再看工作情况如何来定。他问我该如何看待。我对他说:“你应尊重组织,组织上如何办你就先照办,我目前也是这样。即先入党以利为党做更多工作,不要把党龄问题看得很重。党组织是不会把它看得很重的。”这样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就高兴而回。

2、大概是3月20日早晨,锡昌、海粟二位同志要我立即到吴毓同志那里去,他有一件事情要我去办。我到后,吴毓同志向我交代:驻扎在浙闽边区平阳山区老根据地的主力部队,已按照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由粟裕将军带领几百名主力部队深夜急行军开过丽水城外,向瑞安前进。只留下几十名随军的政治宣传员在丽水城外,向居民做半天的宣传工作。吴毓同志要我立即前往港子口伍廷颺厅长的临时休息处,看望伍厅长和配合市调整处的工作(实际是要我前去帮助伍厅长把100条步枪和所属的子弹,赠送给粟裕将军带往前线,抗击日寇),要我到后见机行事。我即要了一部小汽车,开到港子口伍廷颺厅长的临时休息处。伍厅长正在办公,他在谈话中就直接对我说,他这次是按照上级的指示,专门在港子口河道南几十里处新建竣工的工厂,忠实地送给粟裕将军100条步枪和所属的子弹。他说我来得正巧,如他人手不够要我也参加。伍厅长的安排是很周到的,我没有忙什么。



傍晚我回到丽水，就听见老百姓齐声称赞，部队宣传员的宣传很有力量，群众受到很大的教育。

3、我担任视察员工作后，曾出过几次公差，其中有一次是陪同冯副处长到皖南屯溪做考察，接着又陪他访问驻扎在我老家淤潜县城内的浙西行政公署的某主任。当时从杭州到歙县（又称徽州府），杭徽汽车公路从淤潜县城到歙县后面的一段路还没有被拆毁，而军政公用的专车暂还可通行，因此我就随冯副处长坐专车很快到了行政公署。他同行政公署主任（他的老友）住下，冯副处长照顾我，让我可以自由访问亲友。他同行政公署主任是共过事的老友，要谈的事不多，两天后就到了丽水。碰巧这时郎玉麟队长也来到行政公署请示工作，我们俩虽未见过面，但彼此都互相知道一些底细，他就利用这个机会谈他在湖州城外、安吉县一带城乡活动的情况，我谈了一些黄绍竑和武廷阳现在的政治情况。之后我们就成了相互信赖的战友。

在这两天内，我也利用一些时间回家去看望我的亲生父亲和李家过继母亲、个别亲友，到第三天上午，我就同冯副处长乘专车回到了丽水。

## 第二节 1938年4月至5月的斗争

大概是1938年4月初的一天，我在丽水城内的街上遇到了李友邦。李友邦祖籍福建，是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后因不满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杭州进行革命活动遭逮捕。在8年前我与他同关在陆军监狱，我把自己的情况介绍了一下，告诉他我当时叫李政，现在叫骆耕漠。在丽水城内战时物产调整处工作，问他现在的生活情况。他说他出狱后，对时局不满，回台湾又有不便，现借住在丽水经商的台胞家里，也不是永久之法。最后，我约他谈谈。

第二次相聚，李友邦告诉我说：“想组建台湾义勇队。”号召散居在各地的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战。他说：“闽北崇安县有不少从台湾被迫流亡回祖国的台胞，……有医生、有教中、小学生的教员，有些很能经商，我想把他们召集起来，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如果你们需要具体了解，我可以前去跑一趟。”接着，我就把上述情况告诉张锡昌、刘端生，并通过吴毓向刘英汇报。不久，就得到答复：派一个干部带上路费，随李友邦去崇安县调查一下，是否



真有能够在必要时为难民和从前线上下来的伤病员治病的医生，是否有二三十人做此事。我同张锡昌、刘端生商量后，就从通阳县民教馆调出一位浙大学生，名叫张启权，改名张一之，陪李友邦到崇安做第一次访问。这次为时不过一周，我根据张的汇报将所知道的零星情况再次通过吴毓向刘英汇报，得到的答复为：1、派李友邦和他的助手去崇安，动员和组织成立台湾义勇（服务）队。并指示，要筹足二三十人的路费，做好充分准备。2、台湾义勇队由李友邦为首，设在金华，不要在丽水，建立完后再向社会宣布。因为，丽水有战时物产调整处，还有附近委派了好几个新县长，设有政工队和农村工作队，目标相当大。另外，台湾义勇队在金华可以接近宁波、绍兴、严州一带，这里的难民和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员较多，可以为他们服务。由于经费的限制，从崇安到金华基本上都要靠步行，估计要到9月才能抵达金华，省委明确台胞到金华后由金衢特委负责台胞居住问题。我们得知以上批示后，认为这是很有远见的。

大概4月初旬末，各领导人士在方岩开联席会议时，国民党的右派提问到：战时物产调整处是调整物产还是共产呢？这就说明国民党右派对黄绍竑的《浙江战时政治纲领》有不满。黄绍竑一方面坚持贯彻他的《政治纲领》，同时也关照伍廷颺要加以注意。伍廷颺与冯紫岗商量后，采取一点通常性的人员调整如下：武汉大学来信请冯紫岗到武汉大学任教，他要请假去一下武汉，同时他也想看望一下留住在武汉的陈仲明同事，如果得到对方同意前来丽水协助伍厅长工作，他就辞去副处长的职务。

过了若干日，物产调整处派我再次出差到汉口，向中国茶叶总公司商议浙江茶叶（包括皖南的一部分红、绿茶）如何出口的问题。我到汉口后仍住在新知书店，一面尽快办好公差义务，一面就去看望冯紫岗先生。他就介绍我与陈仲明先生认识，并说，冯紫岗决定不回浙江，而由陈仲明去浙，协助伍廷颺工作。

办好以上两件事后，我就到褚辅成老先生家中问好，并汇报他离永康后，由于有他的资望和过去两个月的回乡服务团工作的影响，我们随后的工作仍接着开展。同时，我说：“《动员周刊》仍在接着发行。”他身体尚好，他要我多同潘念之通信，对浙江的政治环境要好自对付。最后褚老拿出100元勉励要我带回去补助一下《动员周刊》的困难，我深为感动。





我这次到武汉时,正是发生以下事件不久,即对延安我党中央不满的张国焘借故来到长江局,潜机住进太平洋大旅馆,另搞反党活动,当时武汉各界进步人士有不少人把他比做中国的托洛斯基。

我1934年4、5月间曾去看老难友徐迈进同志。这次到汉口,得知他在汉口新华社工作,我特前去看望他,互相谈了各自的目前工作情况,我觉得他比4年前的情绪好得多。

还有一个狱中老难友名叫邵林书,出狱后改名崔晓立,现为苏俄援华空军(在汉口一带)当专门翻译,他打算回浙江宁绍一带参加地下党的抗战救国斗争。我说:“你如住回老家可随时到金华丽水新知书店找我。”

我这次在汉口时,也同金华新知书店总负责人徐雪寒商定以下关系:即我于工作必要时作为新知书店的代表人,帮助解决金华新知书店分店和丽水支店调剂从温州到金华再到皖南岩市兵站来往运送书籍的困难。我把上述消息通过吴毓转知刘英同志。不久,就得到刘英同志的以下指示:1、要我借口到金华去管理丽水金华新知书店和丽水支店的一部分业务,向伍廷飏提出辞职;2、台湾义勇队按原设想到金华先筹备和成立事宜由我先去金华帮助;3、金华现在是浙江全省的文化中心,到金华开展的文化救亡运动,要我多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查明金华的一些情况,工作可以一步步慢慢来,不要太急。到金华后,进入丽水后要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去做。

我体会到刘英的指示是很周密的。过了几天,同时我又与张、刘、汪三位同志商定把《动员周刊》停下来,同时与三位同志商定在某期《动员周刊》上登个停刊的启示。大概是5月底,我就向伍厅长提出辞职,他诚恳地说“你在金华也好,在丽水也好,来去都是一样的,你有什么事找我,我都愿望帮助。”我表示感谢。接着,我又到遂昌火柴公司郑楚成先生那里告别,他说:褚老曾交代过回乡服务团停止后,仍要关心这方面的事情,他并说到金华后有困难仍加以帮助。我向他表示感谢。

接着,我就加快做好离开丽水的交接工作,于5月31日晚上10点前后乘物产调节处的公车,于深夜——6月1日凌晨2时多到金华。由新知书店金华分店的一位青年顾启陪同,我住进预先租好的名叫柏树巷第一号大楼客堂房较宽的一间大房间内。因为我很疲劳,就向顾启同志约定,明天



早饭后来谈一下住房附近的环境状况。

### 第三节 抓住时机，逐步开展金华文教界的抗日救亡活动

对如何推动、发起金华文教各界抗日救国团体的问题，经过联合会的讨论之后，总算有了一个“大同小异”的眉目，现在可以把它放在旁边。我们这里要加以回忆和记叙的主要往事是，本书第二节所立的三个项目。

第一个项目——协助办《浙江潮》。

1938年8、9两月间，我主要是参加《浙江潮》和《战时生活》编辑部的一些活动，其中《浙江潮》主编严北溟，是我在丽水时就很熟悉的：瞿毅、林一心（他一直只露面帮助做一些杂志发行工作，实际是金衢特委成员之一，这是我以后很久才知道的）、刘异云（他是严所重视培养的青年）……，都是我转到金华来工作后才认识。由于《浙江潮》是黄绍竑做后盾，用了金华一名著名大绅士王人望大空房子，除了十多间空房可供编辑部和少数有关来往人员使用和居住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客厅可供开会讨论文稿和时事。所以金华市内进步的文教人士及其朋友常来这个大厅参加活动，几乎每周总有一个晚上举行大小不等的时事讨论会。

金华市外（我已记不清它的具体地名），大概是城西十多里外的一个有名的风景区，有一道天然的瀑龙泉水，由山坡顶上沿较直的山坡急流下来，到地面后又在该山坡的低区转了一个方向形成一个平水池，平水池的池口门约有一两丈高，游客可躺在水池周围的空地上观赏，吸引力很大。当时黄绍竑有个别墅就离这个风景区不远。

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大概是在8月底），严北溟的编辑部和黄绍竑的夫人蔡凤珍、金华儿童保育会的一部分工作人员以及为《浙江潮》写专稿的作者、文教界进步人士（我是其中之一）合计总人数约有30—40人，内有几人带点饮食品和服务人员，各自分头出发，名义是前往上述那个有名的游泳的环境欣赏风景，避一点晚秋白天的余热。这个旅游活动当然是公开的，名正言顺的。

大概有近10人到达会场的所在地。会场正面在开会和演节目时可容



30 余人,会场右角较低一层的不露天的空场内,晚上也可供近 10 位游客休息,必要时也可供游客靠睡一下。大概是上午 10 点钟,有近 10 人由严北溟带头到黄绍竑别墅门前的空地上(男女不固定分站,大家自由)向黄主席问好。此刻黄向大家说了一段短话,主要内容是:大家趁晚秋季节,利用空余时间前来旅游一下,这是必要的(黄同时还顺带提到《史记》作者司马迁,曾在书中讲到关于旅游的方法,黄在讲到这点时有摇头摆尾的样子,念出原文,我因《史记》读得很少,记不住他的引文,但我还记得他摇头摆尾的样子),接着黄还命令他的警卫员从他的住处抬出一大箱好的蜜枣,一面要大家坐着休息,尝尝和互相谈谈话,然后就到瀑龙泉去游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黄绍竑。

接着,我们近 30 人就走近瀑龙泉。它从顶上喷下来,分成几条泉水沟流向农民的庄稼地里去。我们走进瀑龙泉后面的“会场”和旁边的右角的一层休息室里,休息了十几分钟。然后,一小部分人(汪光焕在内)就先后躺坐在小木船上,划进洞内的小水池,或在岸旁的平地上游玩,大家称它有点像小西湖。玩后,就到右角边第一层小休息室里休息一阵,大部分人在“大会议厅”,由严北溟和我主持讨论如何把《浙江潮》办得更好一些,商议后一、二期主要文稿的题目并约定写稿人,以免临时抱佛脚。因为环境清静,大家也不感疲劳。

原定今晚不回城内,在“大会场”旁边临时布置了一个小舞台演节目,所以晚饭后大家接着欣赏节目。由于洞内较凉一些,大家都把带来的单衣披在身上。今晚的话剧演的是“9·18”后,东北三省某一县小村庄内我国同胞的苦难和奋斗精神。

话剧内容是由杜麦青和三位演员合作的。舞台布景是一个日伪占领的小村庄(由保甲长管理),它一头为一个小木亭,中间是一大块空地,另一头是一个小树林,树林旁是一个小祠堂的大门,树林的远处是小村镇,是保甲长居住的地方。

现将我当时观后还记得的情形扼要记述如下:两位男教师,缓步走上一头的空木亭子里,一面抬头观望,互相谈到“9·18”后几年来苦难生活的情景和唱起纪念“9·18”的歌曲,歌声响亮,观众就鼓起热烈的掌声。接着,他们两人就在台上所布置的空地上,为锻炼体力和便于教练,做体操、翻跟斗



的表演，满头大汗。观众又给以热烈的掌声。最后，又走出一位年老的女老师，坐在台上的空地上谈起话来。主要内容是，女老师向他们说：“村内有一位副保长是两面派，同保甲长为讨好日寇下面的小头头，有时要各村庄献出好吃的东西，如鸡、鸭、糖果……经他向那位两面派做工作，不要做这种引起老百姓不高兴的事，以免日后遭到恶报，他答应了。”最后，他们三人都认为，在目前的困难生活中，一面不怕困难，一面设法做些有利于救国的事，配合全东北全国抗战运动，最后是会打倒日寇，取得伟大胜利的！全场鼓起热烈的掌声，台上的帷幕徐徐降下，台下还在鼓掌，帷幕又上升起来，我们看见三位演员（其中女老师已卸下她的面部的一部分化装，现出她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员）出来再次谢幕，观众更加感到高兴，热烈鼓掌，帷幕全部落下。

晚剧结束后，约近9点，大部分人都去睡觉了。我们下午参加讲座会的、没有游过“小西湖”的人，还是不知疲劳争取去游一下（严北溟和我等人也在内）。“小西湖”起了消除疲劳的积极作用。第二天早晨后，我们各自回到了金华，接着工作。

第二个项目——回忆老难友沈子球的一件事。

当时，我在《浙江潮》编辑部那座大楼房里参加的活动是较多的。在临安县，陆军监狱的老难友沈子球（狱中名叫朱荻，他迟我入狱约三年，同狱一年多，表现是好的），是临安小地主家庭出身，本身是学生和老师成分，有社会地位，1938年为保家卫国同群众一起组织起一个近100人的自卫队伍，做编印战报工作，得到浙西行政公署（该署设在於潜）的认可，并给适当的经济补助。

8、9月间他为便于开展工作，特亲自前来金华，同黄绍竑谈起抗日自卫团有关的人员关系，自然也前来与我联系，向我表明已同洁身同志有了组织联系。因此，我就介绍他与《浙江潮》主编严北溟相认识。严为照顾他生活方便，安排他住在编辑部一间客房里，为时约一周。在这期间的一个晚上，由瞿毅安排，由严主持欢迎沈子球先生。在欢迎大会上，沈先生讲了近一年多来浙江临安的发展情况，大家听了很兴奋很有帮助。

在上述期间，我还同子球同志谈了几次话。我记得其中他同我谈到：他在杭州未沦陷前的一次社会活动中，遇到一位从东北流亡来的老妇人，是高中教员（姓名我已记不起），带有两个女儿。小女儿还未成人，说话声音响



亮,她母亲有时爱称她“小钢炮”。沈还告诉我,在杭州快沦陷前,他对她们的困难情景深表同情,于是,就把她们三个人照顾到临安暂住;过了几个月,就同“小钢炮”的姐姐互相有了感情。他还对我说,如果以后在金华能遇到参加受教育的机会,他就把“小钢炮”送来。我说到10月后,李友邦的台湾义勇队开始在金华有了为医治前线伤员或者有了为难民儿女服务的小学校,你就把“小钢炮”送来吧……

### 第三个项目——关于王闻识和《战时生活》

8月前,我在丽水时还知道金华有个《战时生活》刊物,因为它一般是不对社会发行的,虽然它开始出版的时间比《浙江潮》还早一些。我到金华后才有阅读的机会。这个刊物是黄绍竑浙江省抗日自卫军(实际是该军团的第三支队,另两个支队是以后才编成的。这方面的情形,是我当时的工作范围内了解的)训练处负责主编的,主要是对连队士兵进行政治思想和时事的宣传教育。篇幅不过《浙江潮》的一半,连队爱看,由政训处处长兼主编负责。主要编写的人员有陈叔时(他的父亲是陈布雷)、翁泽永等等,对这方面的情况我只按到金华后所接触到的来回忆;到1992年才知道的情况自然不必夹带进来。本书会在以后适当处做补充。

我到金华后同王闻识同志的接触是渐渐密切起来的。他对我很热情,随即认识了陈、翁两位同志。同《浙江潮》一样,我也为《战时生活》(对以前出版的共十期的《战时生活》我没有印象)写文章,都是按改刊的特点来起稿。

经过一段时间,我知道他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对李宗仁、白崇禧在台儿庄参加了台儿庄战斗,打败了日寇表示称赞。因为他是广西人,与桂系有关系,他通过《战时生活》编辑部与翁泽永、陈叔时的密切关系,认识了翁泽永的亲妹妹翁小雅,交了朋友。在成婚的那天,翁同他母亲、翁小雅到王闻识家中同吃了一餐便饭式的喜餐,大家彼此都知抗战时期应该如何节省,陈叔时和我及其他同志也都不去凑热闹。

这以后,王闻识曾向我(包括后来的那位林同志)说:组织上同意他重新入党,而他在上海时已经是党员,问我们有何意见。我就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说明。他就立即表示同意先为党努力工作。

随后,他还保密地告诉我,有个年岁比他大好几岁,穿便服和军服的人,